



列宁主义问题

斯大林著

解放社出版

列甯主義問題

一九三八年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著 者 斯 太 林

出 版 者 陝 西 延 安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部

代 售 處 各 地 代 銷 處

列 甯 主 義 問 題

目 錄

十月革命與聯邦共產黨人的策略

(一)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二)十月革命的兩個特點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個

(三)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布爾塞維克策略上的幾論
特點

(四)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開端和前提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再論民族問題

與美國第一批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代表團的問題與斯大林同志的答覆

(二)斯大林同志的問題與代表團的答覆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答楊同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工人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答潘同志)

列甯和聯合中農問題(答覆袁史同志)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農業區黨的工作的任務

應當把集體農民變成小康者

斯大林與霍瓦爾德底談話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 人底策略

一、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三種外界的情形。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够比較容易地打毀了帝國主義在俄羅斯的鐵鍊和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

第一種情形：十月革命的暴發，正在世界帝國主義兩個基本集團——英與法，德與奧——作決死戰的時期，因為這時候兩個基本集團的鬪爭，正在生死關鍵上，所以使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方法來嚴重地顧及和十月革命鬥爭，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很大的意義，它使十月革命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內部激烈的衝突，以鞏固及組織其本身的力量。

第二種情形：十月革命的產生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底過程中，勞動羣衆對於戰爭的怨恨及渴望和平的情緒在事物的邏輯上引進了他們走上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是從戰爭走出的唯一的出路。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很重大的意義，它給了十月革命一種很有力量的解決和平的工具，給十月革命最容易地有可能把蘇維埃的革命與可恨的大

戰的終結互相綜合起來，而且因此造成了使它得到了西方無產階級及東方被壓迫民族之同情與援助。

第三種情形：持久的帝國主義的大戰造成了歐洲強有力的工人運動，同時也使西方及東方革命的危機日趨成熟。這種情形對於俄國革命也有非常寶貴的意義，它使俄國革命在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得到了許多外部的可靠的同盟者。

但是除了這些外界的情形以外，在十月革命中還有許多內部很順利的條件，促進革命的勝利。

這些條件中之最主要者可說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本身有俄國大多數無產階級非常積極的援助。

第二、得到了正渴望着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及大部份兵士堅決的帮助。

第三、有經驗富豐的政黨——布爾塞維克的政黨——為革命的首領，成爲一種領導的力量，它之所以有力不僅是因爲有多年的經驗與森嚴的紀律，而且是因爲和勞動羣衆有廣大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前面的敵人，是比較易於征服的，俄國資產階級的力量本來較爲薄弱，地主階級的威勢也早被不斷的農民「騷動」所推殘淨盡，而妥協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勢力在大戰的過程中，也完全破產了。

第五、十月革命有很廣大的青年國家的面積，所以在其環境要求的時候，革命可以自由地調動、退守、遷移、及集中其力量等。

第六、國內具有很充足的糧食、燃料、及各種富源，使十月革命能够從容地與反革命鬥爭。

這種種內外的情形綜合起來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環境

，使十月革命易於取勝。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沒有相當不利的地方。例如：十月革命是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因為它的周圍及近傍缺少一個蘇維埃的國家可以依靠。無疑的。將來的革命，例如在德國，在這點上，情形要就好得多，因為在它的近傍已有如此強大的蘇維埃國家，我們蘇聯。至如國內無產階級還不是佔大多數，這種十月革命的缺點我已用不着說了。

但這些缺點正好反映出上述十月革命內外環境底特殊狀態的重大意義。

關於這特殊狀態。我們什麼時候都不應當忘記，當我們分析德國一九二三年秋季的事變時，尤其使我們不應忘記這些特殊狀態。托洛斯基當他籠統的把俄國十月革命與德國革命相比擬，并痛責德國共產黨真正的或虛偽的錯誤時，更不能不記到這一點。

列寧說：

「俄羅斯在一九一七年之各種具體的在歷史上非常特別的形勢之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比較容易，但要繼續這革命，把革命進行到底，則俄國比其餘歐洲的國家要難得多。我在一九一八年初已把這種情形指出來了，兩年的經驗，把這種斷論完全證實了。這種特殊的條件，如：一，蘇維埃的革命與為工農所深惡痛絕的帝國主義大戰之終結相綜合的可能；二，在相當時期內有利用帝國主義強盜世界兩個強有力的集團之決死戰爭，而不能聯合以反對蘇維埃的可能；三，比較常期的國內戰爭支持下去的可能，部份是因為國內廣大的面積與交通的不便；四，農民中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存在，無產階級政黨能拿到農民政黨（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仇視布爾克塞維

主義。○) 的革命要求，因無產階級的獲得政權，使其即刻能够實現——這些種種特殊的條件，現在在西歐是沒有的，要這種條件或者是相似的條件，復演一次是不很容易的。○ 所以(除掉其他許多原因)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較我們困難得多。」(列甯全集第一七卷第一五三頁) 列甯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

二、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 與托洛斯基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把這兩個特點加以明白解釋，是爲了解這革命底內部的及其歷史上的意義，首先所必需要的。

究竟是怎樣的特點呢？

第一，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在工農聯合而無產階級佔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第二，就是，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還保留着資本主義的時候，而社會主義却在一個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國家內得到勝利了，這勝利的結果，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沒有別的特點了。不過在我們現在，這兩個特點却是最重要的，這不僅由於他們能明顯表示出十月革命的本質，並且由於他們將『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的性質非常鮮明的揭露出來了。

我們現在把這兩個特點來簡單地分析一下：

關於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的問題，關於奪取這些羣衆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這個問題，却是無產階級革命中最主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與否及革命的命運，完全要看當時城市及農村的勞動羣衆

，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究竟幫助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就是要看他們是做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還是做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決定。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農民的後備軍是站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也正因為他能從資產階級手裏把農民後備軍奪取過來，使農民走到無產階級方面，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表現他是城市與農村數百萬勞動羣衆唯一領導力量。

如果誰不明白這點，那末十月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及無產階級政權內部政策之特殊狀態，也永遠是不會了解的。

照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那種簡單的「巧選」有經驗的「軍師」和「很乖覺地依靠在」人民中某一階層的政府上層組織。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推翻資本主義以獲得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勞動羣衆的階級聯合，而無產階級是這個聯合的領導力量。

所以要說的並不是像那班「不斷革命論」外交式的擁護者所愛說的「少微」估計不充分或「少微」估計太過農民運動的革命作用，而是關於十月革命的結果所產生的新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要說的是關於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及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之基礎問題。

列甯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階級的先鋒隊的無產階級和無數的非無產階級階層的勞動羣衆（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農民及智識份子等。）或其中的大多數之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聯盟，其目的在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完全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及復辟的企圖，及得完全的建設與鞏固社會主義。」

列甯全集第一六卷第二四一頁)

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把他的這種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哲學的術語翻成比較簡單的話就是：只有一定的階級——城市的及一般工廠的產業工人——能够指導一切廣大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爲推翻資本主義底壓迫而鬥爭，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在爲保持與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并根本消滅階級」（列甯全集第一六卷第二四八頁）

這就是列甯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十月革命是列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標本式的實現，這也是十月革命中特點之一。

有些同志認爲這個理論是純粹「俄羅斯」的理論，只能實用於俄國的實際情形。這是不對的，這完全是不對的。列甯所說的爲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所謂勞動羣衆，不僅是指俄國的農民，而且是指在蘇聯邊疆地方（舊俄羅斯的殖民地）的勞動羣衆。列甯曾不倦地決斷說：如果不與這些其他民族的民衆聯合，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獲得勝利。列甯在民族問題的文章上及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演講中，曾屢次說，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各殖民地被壓迫民衆的革命的聯合革命的同盟，世界革命決無勝利之可能。

所謂殖民地是什麼，難道這不是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難道首先不是農民的勞動羣衆嗎？誰不知道殖民地的解放問題其本質就是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脫離財政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的問題呢？

所以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并不是純粹「俄羅

斯」的理論，而是爲全世界所必須的理論。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甯說：「布爾塞維克主義乃是各國模範底策畧」。（列甯全集第一五卷第五〇三頁）

這是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的要點。

站在十月革命這個特點底觀點上看來，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對於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主張，我們現在不用着去多講它。那時候，他「簡單地」忘記了農民是一種革命力量，提出「沒有沙皇，而政府就是工人的。」的口號，就是革命不須要農民的口號。就是「不斷革命論」底外交式的擁護者，拉狹克，現在也不得不承認，在一九〇五年的「不斷革命論」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了。現在大概大家都承認此種空中樓閣，已沒有再存在的價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報）。

關於托洛斯基在大戰時期的主張，我們現在也不用來贅述。他在一九一五年因政權而鬥爭的一篇著作中說：「我們生存於帝國主義的時候」帝國主義「并不是把資產階級的國民與舊制度對立，而是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國民對立。」，因此他的結論就認爲農民的革命作用必要減少，並且他認爲沒收土地的口號，也沒有像從前那樣有意義了（論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九至二九二頁）。列甯當時檢閱了這篇文章，就責備他是「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他說，「托洛斯基在事實上是幫助了俄國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因爲這派人的「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實在因爲他們不願農民來起參加革命。（列甯全集第三卷第二四頁）

我們還是來分析一下托洛斯基對於這問題較近的著

作罷，就是來分析一下當無產階級專政業已成就和固，托洛斯基有了可能在事實上檢查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和糾正自己錯誤的時候。現在就拿在一九二二年托洛斯基所寫的論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言來看；下面就是托洛斯基在序言中講到「不斷革命論」的地方：

「就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與同年十月罷工的時期中組成了著者對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底觀點，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這巧妙名稱的命意就是說，俄國的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資產階級的，然而革命并不能停止在這個資產階級的目的範圍內

。無產階級不能獲得政權，則革命就不能解決其最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然而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它也就不能在革命中把自己只限制於資產階級的範圍內了，恰是相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為保障基己得之勝利計，在他開始統治的第一步就不僅要深刻的破壞封建的私有財產，而且也要深刻的侵犯到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因此，無產階級不僅對於一切革命初期曾幫助過它的資產階級各種集團要取敵視衝突，就是與幫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廣大的農民群眾，亦要取敵視衝突。在落後的國家中工人政府與農民間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的範圍內，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獲得的解決。」（托洛斯基論一九〇五年書中之序言）

托洛斯基對於他的「不斷革命論」就是這麼講的。

只要把這個引証和上面從列甯全集中摘出來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引証相比較一下，那麼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分離的鴻溝，也就顯而易見了。

列甯認爲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群衆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斯基却認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與「廣大的農民群衆」是「敵視的衝突」。列甯說以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衆及被剝削群衆，而托洛斯基却認爲「在落後國家中的工人政府底地位與大多數的農民間的矛盾」。

據列甯的意見，解決俄國的革命，首先需要依靠本國的工農力量。而托洛斯基却認爲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有力量解決。

但是世界革命如果較遲才爆發，却怎樣辦呢？我們的革命究竟有沒有一綫光明呢？托洛斯基簡直沒有給以一綫光明，因爲「工人政府地位……的矛盾，只礙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獲得解決」。根有這種計劃，那末我們的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就是在自己內部的矛盾中的死下去，和在世界革命的等待中崩潰下去。

照列甯的意見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倚靠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群衆的聯盟，以「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和「完成建設與鞏固社會主義」的一種政權。

照托洛斯基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與「廣大的農民群衆」有「敵視的衝突」的一種政權，它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的舞台上」得到「矛盾」的解決。

這種「不斷革命論」在孟塞維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照事情的本質上看來，毫無區別。

無可能疑的，「不斷革命論」並不是那般簡單的看

動了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不斷革命論」的看輕農民運動，使他走到否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只是變相的少數派的理論而已。

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個特點。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的要點是什麼呢？

列寧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中，他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及突變性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說，各國的企業，托拉斯，及各種工業部門之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按先後的秩序的；不是某一個托拉斯，某一個工業部門，或者某一個國家，總是在前面走，而其餘的托拉斯或國家一個一個的跟着後面走的——而是突變的，某一國的發展中斷，而別一個發展突進。同時正趨於落後的國家努力去保持其舊有的地位，這「完全是合法的」，同樣地是「合法的」，那正在跳躍前進的國家的努力去獲得新的地位，因此遂至於使帝國主義國家間軍事上的衝突成爲不可避免。這種事實也已經發生過了。例如德國它在全世紀前和英、法比較起來，還算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同樣地關於日本也應說是遠遜於俄國的，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竟飛躍得很遠，德國一躍而超過法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日本則趕過於俄羅斯。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是由這些矛盾中發生出來的。

這規律是由於下列數點出發的：

一，「資本主義已經發達轉成爲由「先進」國家少數人對於地球上大多數人底殖民化的壓迫和財政上的窒息之全世界的系統了」（見列寧帝國主義發文版序言第一七卷第二四六頁）。

二，「在兩三個世界強大的全副武裝的強盜間（英，美，日）發生分「贓物」的戰爭，因此把全球都牽到分贓物戰爭中去了」（同上）。

三，被財政資本壓迫的世界系統內部矛盾之發展與武裝衝突的必然性，使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綫易為革命所攻破，某個國家有衝破這戰綫的可能。

四，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戰綫比較不牢固的地方，洵容易發生這稱破裂；這就是說，在帝國主義的鐵蹄比較薄弱的地方，革命就是比較易於發展。

五，因此，即使在生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還保留着資本主義時候，而在資本主義不很發展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有完成的可能。

這幾句話，就是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之基礎。

十月革命的算第二個特點究竟是什麼呢？

十月革命的算第二個特點就是這個革命是在實際應用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模範。

若是請不明了十月革命的這一個特點，那末爭這個革命的國際性，它的國際的龐大的力量，及其特點的對外政策，也就不能明白了。

列甯說：

「經濟在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因此，在幾個或一個國家，隨便那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有單獨獲得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在這個國家內已經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剝奪資本家，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起來反對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其餘各國的被壓迫階級，幫助他們起來暴動，反抗資本階級，如果在必要時，就應用武力去反抗剝削階級和他們的政府」，因為：

「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與其餘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沒有長期的，激烈的爭鬪，也就決不能使各個國家、能很堅固的聯合在社會主義的旗幟的下。」（參考列甯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頁）

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斷定開始無產階級的革命（假若依他們的理論是應該開始的話）只有在工業發展的國家，因為工農愈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比較有希望，所以社會主義在一門國家內尤其是資本主義不大發展的國家內，獲得勝利，完全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而完全不可能的。列甯在大戰的時期時根據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就很激烈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論調，堅持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誑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那怕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的發展。獲勝利之可能。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十月革命就完全證明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的正確。

由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觀點上看來，托洛斯基的「不斷的革命論」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所以托洛斯基，在他的著作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上面所寫的來看吧：

「沒有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直接的幫助，俄國人階級，就不能維持他的政權，同時也就不使他臨時統治，變成永久的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是毫無疑義的。」（參看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這一段講的是什麼呢？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地一個國家內他例如俄國，」沒有歐西無產階級國家的直接幫助，就無勝利之可能，「這也就，說不在歐洲無產階級尚未獲得改正之前，社會主義就沒有勝利的可能。

這種「理論」和列甯的主張「在一個國家內，隨便

那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有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有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很顯的，沒有一點相同的。

我們就第他造本書因爲出版在一九〇六年，那時候還很難決定我們革命的性質，所以不免有無意的錯誤，和托洛斯基最近的觀點有不相合的地方。我那末，我們來看一看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出版的小冊子的後來編入論一九一七年（在一九二四年）一書中的「和平的綱領」吧。托洛斯基在這本書上批評列甯在一國家內能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提出他的歐羅巴合衆國的口號與之對立，他看定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決無勝利的可能。社會主義只有在歐洲各主要的國家——要國，俄國，德國——獲得了勝利，組成歐洲合衆國之後，才能完全獲得勝利，不然就毫無一點可能性。他很直捷的說：「如果德國的革命，還沒有成功，英國或俄國的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相反的也是一樣。」（參閱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八十九頁）

托洛斯基說：

「在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是從前多數黨中央機關報）反對歐羅巴合衆國的口號，唯一的多少帶着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就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規律」。因此，社會民主黨就作了這樣的結論，認爲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有獲得勝利的可能，所以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成立，不必以建設歐羅巴合衆國爲先決條件。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當然是毫無爭論的。但是這不平衡的規律的本身也就是完全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是法國，也是

不在同一資本主義的水平綫上的。但是這幾個國家，和非洲。亞洲比較起來，他們是社會革命已經成熟的資本主義的「歐洲」。至於說來每個國家在他的爭鬥中不應去「等待」別國的爭鬥，——這是最初步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有益的，必須把他緊記，以便國際的共同行動，不要為「等待的」的國際的不行動的思想來代替。不等待別國的行動，我們完全站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與繼續我們的鬥爭，並且深信，我們的鬥爭是可以推動別國的鬥爭向前發展的。但是如果別的國家沒有發生這種鬥爭——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的考察已這樣確實的證明了——那就沒有希望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羅巴面前站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上單獨地生存下去。」（參考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八九頁至九十頁）

由此可見托洛斯基的歐洲各主要國家同時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老調，和列寧的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可以單獨獲得勝利的理論，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用說的要獲得社會主義之完全的勝利，與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必須要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不用說的，我們的革命，如果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幫助，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抵抗它的共同的敵人；同樣的，西方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俄國革命的幫助，也不能發展到像現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後——這樣高漲的程度。不用說的我們很需要幫助；但究竟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於我們革命的幫助呢？他們對於我們的同情。他們破壞他們本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計劃的準備，——這一切不是幫助？是否是重大的幫助呢？當然是的。如果

沒有西歐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的這一種積極的幫助和同情，俄國無產階級的專政，也許要困難得多。但直到現在，這種同情和幫助，再連本國紅軍的力量和俄國工農拚命的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否已經足夠，——爲打退帝國主義者底進攻，造成一種爲嚴重的建設的工作的環境，是否足夠呢？當然，已經很夠了。這種同情現在是發展呢，還是低落呢？無條件的，是發展的。

現在蘇聯有沒有良好的條件，不但可以發展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事業，同時還可以幫助西歐的無產階級及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呢？有的！關於這點，無產階級專政七年的歷史已經都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了。我們能不能否認我們已經開始了勞動力的發展嗎？當然是不能否認的。

既如上述，那末，托洛斯基說俄國的革命決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起來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它祇有一個意義：第一，托洛斯基沒有感覺到我們革命內部的力量，第二，托洛斯基沒有瞭解西方無產階級及東方農民對於我們革命的精神上的幫助之無限寶貴的意義；第三，托洛斯基沒有發現到帝國主義內部力量的分裂。

托洛斯基在他的和平的綱領（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〇年再版）中對於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的批評，結果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但也許這本書中的主張，和托洛斯基近來的主張又不一致吧。我們現在就拿他的最近著作——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俄羅斯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後寫的——來看一看例如一九二二年在他新出版的和平綱領一書中所寫的書後中說：

『我在和平綱領中已屢次說過，無產階級的革

命，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決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的話，蘇聯共和國五年的經驗，似乎使讀者不能承認這一點。但是這樣的結論似乎是沒有根據的。

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尤其是在落後的國家裏，能這樣的反抗全世界，這證明無產階級力量的偉大，這樣力量如其發生在比較更先進的文明的國家，那它更是驚天動地了。但在軍事上，政治上講來，算是一個國家了，講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我們現在不但不能開始建設，而且簡直是望塵莫及哩。……在歐洲其他各國的政權，還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我們爲避免經濟的孤立起見，就不得不和資本主義的國家妥協，雖然我們可以深信，這種妥協對於我們的經濟上的瘡傷有相當的補救，在某一部門可有相當的進步，但是要使俄國社會主義的經濟能真正發展起來，只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參考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第九二一一九三頁）

托洛斯基這種話，完全是爲了還想維持他那將要根本破壞的「不斷革命論」而發的一種牽強的附會，不切實際的論調。

他的意見就是說，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僅還沒有「開始建設而且簡直還是望塵莫及」。曾經有人希望「與資本主義國家妥協」，實於事實無補的，因爲在「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沒有獲得勝利之前，「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提高」是得不到的。

但是現在西歐無產階級沒有獲得勝利，所以我們革命的前面，就只有兩條路聽我們「選擇」，或是根本歸於滅亡；或是脫化成爲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

無怪乎托洛斯基在兩年前就已經說我們黨的蜕化了。

無怪乎托洛斯基在去年就預言過我們國家的「滅亡」了。

試問這種奇怪的「理論」怎能和列寧「在一個國家內，能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相融洽呢？

試問他這種奇怪的「前途」怎樣能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使我們能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的前途相融洽呢？

如何能使這種「不斷的」失望，同列寧下列的幾句話相融洽呢？

『社會主義現在已不是一個很遠的將來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渺茫的，不可捉摸的東西。這種渺茫的東西現在已經成了一種陳舊的，腐敗的思想了。我們已經把社會主義拉進了日常生活中，這是我們應該看到的。這就是我們現下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在現時期中的任務。讓我再把這種可以斷定的話結束一工吧；這種任務，較之我們以前的任務，並沒有什麼困難，並沒有什麼新奇，也不會使我們有很多的困難——我們大家合在一起，不是明天或後天，而是要在幾年的中間，用所有一切的力量來解決這任務，使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參考第一八卷下冊第一〇八頁）

如何能使這種「不斷的」黑暗與列寧的下列幾句話相融洽呢？

「在實際上，一切大生產手段均歸國有，國家政權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數百萬的小

農貧農群衆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等等——所有這些條件難道還不夠使我們靠着合作社，僅僅的靠着我們一向所輕視，而今日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於某種意義上亦可對之輕視的合作社，還不是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須要的一切麼？有了這些，社會主義並不是已經建設完成了，但這一切已經是必需品與足夠完成這個建設了。」（第一八卷第二部第一四〇頁）

當然是很明顯的，這兩方面是毫無一點相同，而且決不能融洽的。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完全否認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同樣，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也根本是否認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

不信任我們的革命的力量和能力，不信任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根源。

一直到現在，我們只指出了「不斷革命論」的一方面——就是不信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現在爲了公平起見，尚須補充另一方面——就是不信任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能力。

但托洛斯基的理論與一般少數派的理論——說在「西歐各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未獲勝利之前，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尤其是在落後的國家，決無可能——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實際上完全沒有絲毫區別。

所以托洛斯基底「不斷革命論」，祇是少數派的理論的變相而已。這是毫無疑義的。

近來在報章，載着些很有外交手腕的各種污穢的調，竭力想證明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列甯主義是不相衝突的，他們說：托洛斯基的理論，在一九〇五年，

當然是要不得的。他們說：托洛斯基主要的錯誤是因爲跑得太快，跑到時代的前面，所以把那時還不可採用的方法，硬想應用於一九〇五年實際的環境。但到一九一七年的時候，革命已完全成熟，托洛斯基的理論也就很切實際了。大家都很容易知道這班外交家中間最能幹的自然要推拉狄克了。試聽一下他的話，就可明瞭了。他說：

「戰爭使要土地與和平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連繫宣告破裂，戰爭也把農民引到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多數黨——的領導之下了。因此，可以不要工農專政，而只要依靠着農民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了。盧森堡和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反對列甯的主張（就是「不斷革命論」——斯大林註）實際上却成了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引自真理報一九二四年二月二一日第四二期）這種話裏，其實已經露出破綻來了。

在戰爭時期，「可以不必工農專政，而只要依靠着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很錯誤的。在事實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在資產階級專政同時并存的特殊的環境中，已經實現了工農專政了。

關於「不斷革命論」——拉狄克可恥的默認爲——盧森堡和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的也是不對的。其實這個理論完全是帕爾武斯和托洛斯基兩人提出來的。

現在，經過了十個月之後，拉狄克却又來聲明，痛罵帕爾武斯不應當贊成「不斷革命論」（參閱他在真理報上論帕爾武斯的文章）；但是我們應當要求拉狄克公道一點，既罵了帕爾武斯，就也應當罵帕爾武斯的同黨——托洛斯基。

認爲一九〇五年革命拋棄的「不斷革命論」是在]

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上，就是說十月革的時候，是正確的，切實的，這也是錯誤到極點的話。在十月革命發展的整個的過程中，切實的證明了「不斷革命論」完全是不合事實的，而且與列甯主義的原則，根本不相容的。

甜蜜的話，圓滑的外交手腕，也決遮不住「不斷革命論」與列甯主義間不可超越的鴻溝。

三、論十月革命準備期間多數 黨策略上的幾個特點

要瞭解在十月革命準備期間多數黨的策略，我們至少必須把這種策略的幾個最主要的特點來解釋一下，而且在許多關於多數黨策略的問題的書中，恰巧時常忽畧這些特點。因此，我們更有解釋的必要。

究竟是甚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 聽了托洛斯基的話，也許會想到，在十月革命歷史中有兩個時期；一為偵察時期，一為暴動時期。此外都是杜撰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宣言究竟是甚麼呢？「四月宣言，若把他說「左」一點，是一種偵察的突擊，用來試驗群眾的情緒及他們與蘇維埃間的互相關係的。」（參考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第二七頁）一九一七年，七月的示威運動是甚麼呢？據托洛斯基的意見認為「實際上在這次也祇是在運動的新的更高漲的階段上一種新的更廣大偵察」（同上第三二頁）。一九一七年七月示威運動，是按着我們黨的要求而舉行的，自然據托洛斯基的意見，更應該稱作「偵察」了。

這樣看來，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已經有了現存的工農政治軍隊，其所以在五、六、七月中間他們沒有去

暴動，而只是『偵察』，是因爲，僅是因爲「這個偵察」當時沒有給很順利的『報告』。

不用說，托洛斯基對於多數黨的政治策略這種簡單化的觀念，實是由於他把普通簡單的軍事策略與多數黨的革命策略混淆而生的。

實際上，這些示威運動，完全是民衆自發的進攻的結果，也就是各地民衆反對戰爭而引起的結果，實際上，那時黨的作用，正在設法領導群衆的自發運動向多數黨底革命口號的方向走去。

實際上，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並沒有也不能有甚麼現成的政治軍隊。多數黨是在爭鬪和階級的衝突的過程中——從四月至十月，才組織起來這樣一支軍隊。多數黨經過了四月的宣言，經過了六七月的示威運動，經過了與哥尼洛夫的鬥爭，經過了各區和城市的選舉和議會，最後經過蘇維埃選舉勝利之後，這種軍隊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才組織起來。政治軍隊並不是那種普通的軍事上的軍隊，軍事的指揮官，出發去戰爭的時候，在他麾下已先預備好了一支完整的軍隊；但是黨的軍隊，只有在爭鬥的過程中，階級的衝突中，才能組織起來，這完全要靠民衆由本身的經驗認識了黨的口號及其政策的正確之後而定。

當然 每種運動相當的啓發向來大家所看不到的各階級力量的關係，給以相當的偵察作用；但這裏偵察並不是運動的動機，而是運動的自然的結果。

列甯對於十月暴動前各種事變加以分折，及將它們與四月，七月，事變相比較時，曾這樣說；

『在四月二十，二一日，六月九日，七月三日以前，情形完全不同，那時候只是些自發的覺醒，我們及我們的黨，或者還沒有抓住（如像四月二十日）或者阻攔了

，只把他們形成一種和平的示威運動（六月九日及七月三日）。因為那時候我們很明白，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那時候農民所信仰的還是利培爾，唐諾夫，切爾諾夫的主張，而並不是多數黨的主張（暴動），因此在我們後面還沒有多數的群眾，所以當時暴動太早。』（第一四卷下冊第二八四頁）

很明顯的，只說是一種『偵察』當然是不行的，事情并不在乎『偵察』，而在乎：

一、黨在整個的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的鬥爭，堅決地依靠在民衆自發革運動的高漲；

二、黨一方面依靠在自發的運動的高漲，而同時又能對於各種運動保持着統一的領導作用；

三、這種運動的領導使他能比較很快的形成了一支群眾的政治軍隊，準備十月革命的暴動；

四、這種政策，使十月革命全部工作準備不得不都於一個政黨——多數黨的領導；

五、這種準備又使得十月革命暴動的結果，政權完全落到一個政黨（多數黨）的手中；

這樣看來，共產黨，一個政黨的統一的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中一個最主要的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點，也就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多數黨策畧上的第一個特點。

不用說，多數黨的策畧，如果沒有這一個特點，它在帝國主義的環境中，無產階級的專政就無勝利的可能。

因此，十月革命和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區別，也就是因為當時法國革命的領導，是操在兩個政黨的手中，而且這兩個政黨，沒有一個，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了。十月革命的準備，完全是在多數黨一個政黨領導之下。但這政黨究竟用甚麼方法去領導，它究竟根據甚麼路線呢？領導的根本路線，就是在孤立妥協黨，在革命將告終結的時期最危險的黨派，如孤立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

列寧主義戰略上的根本規律是甚麼？

列寧主義戰略上根本規律，就是在承認；

一、在革命將獲最終勝利的時期中。最危險的革命底敵人的社會柱石就是妥協的政黨。

二、要推翻我們的敵人（沙皇及資產階級），首先必須設法使這些政黨陷於孤立。

三、在革命準備期中，我們的槍鋒，應注射在這些政黨上面，首先必需把它們孤立并和勞動群眾隔離。

在攻擊沙皇，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中（一九〇五——〇六年）最危險的勁敵——沙皇的社會憑障——就是自由君主黨，即民主立憲黨。爲甚麼呢？因爲它們是沙皇與大多數民衆（整個的農民）間的一個妥協的政黨，所以我們的黨在這時候就竭力攻擊立憲民主黨，因爲如果不使這種政黨陷於孤立，就不能使農民與沙皇的聯繫破裂，不能使他們的聯繫破裂——也就不能使革命獲得勝利。那時候有很多的人不了解這種多數黨的戰略上的特點，責斥多數黨過於「忌恨民主立憲黨」與民主立憲黨去鬥爭，反減弱了多數黨與其主要敵人——沙皇，鬥爭的力量。這種主張完全因爲根本不懂多數黨的戰略——孤立妥協的政黨，爲的是易於獲得對於其主要敵人（沙皇）之勝利的戰略。

用不着說，如果不採取這種戰略，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想獲得指導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各種鬥爭力量的重心，轉到了另一方面，沙皇已經沒有了。民主立憲黨已由妥協的力量而變為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力量了。這時候的鬥爭，已不是沙皇與民衆間的鬥爭，而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了。在這時期中，我們的勁敵——帝國主義底社會屏障，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的政權——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爲什麼呢？因爲這時候，這種政黨是妥協的政黨，是帝國主義和勞動群衆間妥協的政黨。所以當時多數黨就竭力攻擊這種政黨，因爲如果不孤立這種政黨，帝國主義和勞動群衆間的聯繫，也就不會破裂，如果聯繫不破裂，蘇維埃的革命也就不能獲得勝利。

那時候也有許多人，認爲多數黨「過於仇視」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而反「忘記」了自己主要的目的。但是整個的十月革命的過程，已經充分的證明，只有這種多數黨的策畧，才能保障十月革命的勝利。

這個時期主要的特點，就是；農民群衆的繼續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失望，他們退出這些政黨轉變到無產階級裏面，團結到唯一革命到底，能給俄國以和平的無產階級底周圍。這一個時期的歷史，就是社會民主黨與少數派和多數黨各自爲了要獲得農民群衆而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的革命運動在混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時期，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根本反對沒收地主的土地，少數派與社會革命黨極端主張繼續戰爭，在前綫六月的進攻，對兵士的死刑，與哥尼洛夫的暴動中間決定了。同時這革命運動的決定。是絕對有利於多數黨的戰畧。因爲如果不使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陷於孤立，是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政府，也就不能停止戰爭。所以使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陷於孤立的政策，是

唯一的實確的。

因此，孤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的策畧，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期中，黨的領導之主要的路綫——這就是多數黨策畧上的第二個特點。

不用說，多數黨的策畧，如果沒有這一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群眾的聯合，也就根本是懸空的。

很可以令人注意的，關於多數黨的這個特點，托洛斯基在他的十月革命之教訓一書中絕對沒有提起或者差不多沒有提起。

第三個特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了，黨在十月革命準備期中的領導，是根據孤立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的路綫。使他們與廣大的工農群眾隔離。但是黨究竟在怎樣的形式和口號之下，才能具體的實現這種孤立的政策呢？它的實現，是在奪取蘇維埃政權的群眾革命運動的形勢中，是在『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是在把蘇維埃由動員群眾的機關變為暴動的機關，變為政權的機關，變為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

爲什麼多數黨認爲蘇維埃是：組織上最主要的棟樑，能够易於孤立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善於促進無產階級革命及引導數萬萬勞動群眾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呢？

什麼是蘇維埃？

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說：

『蘇維埃是一種新的國家的機關，第一，它組織工農武裝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不像過去的常備軍脫離民衆，而且與民衆間有極密切的聯繫，這種力量在軍事方面比舊的軍隊要強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沒有任何別的力量可以代替的；第二，

這個機關與群眾：與大多數的民衆有密切而不可間斷的，容易監察，更新的聯繫，這種聯繫爲過去一切國家機關中所沒有的。第三，這種機關的職員的選舉和更換是完全根據人民的意志，沒有那種官場的形式；所以它比一切過去的國家機關民主得多。第四，它與各種不同的職業都有很堅固的聯繫，使各種極不相同的改良，都能很澈底的消滅官僚制度；第五，它是一種先鋒隊的組織，這就是說；是被壓迫階級工農最覺悟的，最努力的，最先進分子的組織形式，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經過這種組織去喚起訓練，教育并領導這些階級向來站在政治生活和歷史範圍以外的廣大的群眾。第六。它使國會主義的好處，和直接德謨克拉西的好處有聯合的可能；就是當選爲代表的人同時有立憲權和司法權。這種德謨克拉西的發展的進步，和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比較起來實有很重大的歷史的意義……如果各革命階級的人民的創造能力，沒有建成蘇維埃，那末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簡直可以說沒有希望，因爲無產階級如果仍用舊的機關，當然不能維持他的政權，要即刻建設新的又不是馬上可以做到的事。」（參考列甯全集第十四卷，二二八至二二〇頁）

所以多數黨認爲蘇維埃是一個基本的組織的鍊環，它能促進十月革命的組織與建設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

「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由它內部發展的觀點上看來，實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多數黨七月失敗以前，即兩重政權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在哥尼洛夫暴動失敗之後。



在第一個階段中，這口號的作用是破裂少數黨，社會革命黨與民主立憲黨的聯合，由少數黨和社會革命黨組織的蘇維埃政府（因為那時候是社會革命黨和少數黨的蘇維埃）使在野黨（多數黨）有宣傳自由權和蘇維埃內部黨的爭鬪自由權，因為多數黨那時相信祇有用這種鬪爭的方法。然後多數黨在革命和平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奪取蘇維埃，變更蘇維埃的成分。這個計劃，當然，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却是幫助準備那些保障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條件。因為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握得政權之後，不得已定要執行他們的反革命的政綱，同時他們的真正面目，也就立刻揭露出來。使他們很快的陷於孤立，與群眾脫離了關係。但多數黨七月的失敗，使這種發展中斷。使民主立憲及反一切反革命勢力佔了優勢，同時使少數黨和社會革命黨也投到反革命的懷抱中去了。在這種環境之下使黨不得不把「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暫時取消，以便在革命新高漲的條件之下，再提出來。

哥尼洛夫暴動失敗後，第二個階段就此開始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重新提出來了，但是現在這口號的意義，就完全和在第一個階段中不同，它的內容已根本變更了。現在這口號表示出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完全破裂；一方面將政權移交多數黨，因為現在蘇維埃中的成分，已大多數屬於多數黨了。這時候，這口號就是表示要用暴動方法，來做直接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此外，現在這口號並表示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和國家的形成。

把蘇維埃變成國家政權機關的政策，其意義之所以無限偉大，就是因為只有它才能使勞動群眾脫離了帝國主義的羈絆，使帝國主義的工具少數黨和社會革命黨尚於孤

立的地位，引導群眾直接走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路上。

所以由蘇維埃變成國家機關的政策，實為孤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及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條件——這也就是多數黨在十月革命準備期中命策畧上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怎樣，與爲什麼多數黨能把黨的口號變成廣大的群眾口號以致使革命前進？怎樣，與爲什麼黨能使它的正確的政策不僅爲先鋒隊及多數工人階級所採納而且亦爲大多數民衆所採納？如果我們對於上列的問題，不加以研究，那末對於多數黨的策畧還不能得到一個整個的概念。

如果這個革命是一個真正民衆的，含有廣大群眾的革命，那末它的勝利，只靠一個黨的正確的口號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個必須的條件，才能使革命真正獲得勝利，這就是說：必須要群眾根據自己的經驗，去相信這些口號之正確。只有那時候，黨的口號，才能成爲群眾的口號，只有到那時，革命才成爲真正的民衆的革命。多數黨在十月革命準備期中，其策略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能正確的決定那種路綫和關鍵，能很自然的使群眾跟着黨的口號走去，使他們能根據其本身的經驗，很自覺的去瞭解和承認這種口號正確。換句話說：多數黨政策上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它能把黨的領導和群眾的領導不相混淆，它很了解從第一種領導和第二種領導的根本區別，所以他們不僅是一種黨的領導之科學同時他也是群眾的領導之科學。

國民會議之召集與解散，就是多數黨策畧上的這一個特點的很明顯的例子。

大家知道的，多數黨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還是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來的。同時，大家都知道，國民會議

完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國會，根本與蘇維埃共和國的原則是衝突的。爲什麼多數黨一方面主張蘇維埃共和國，而同時却又要求臨時政府立憲召集國民會議呢？爲什麼多數黨不但去參加了選舉，而且親自去召集國民會議呢？爲什麼多數黨認爲在暴動的一日，新舊交替的時期中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有暫時結合的可能呢？

這所以「發生」是因爲：

一、國民會議這個思想，是在廣大的民衆一個最流行通俗的思想；

二、立刻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使我們更容易揭穿臨時政府的反革命的天性；

三、爲要在民衆眼前，揭破這種國民會議的思想，就必須要引導民衆親身到國民會議裏，提出和平，土地和蘇維埃政權的要求，使他們認識國民會議到底實際上是什麼東西；

四、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真正根據其自身的經驗，認識了國民會議的反革命性，并覺得有解散它的必要；

五、自然，預定國民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的臨時結合，只有一種消滅國民會議的方法。

六、這種結合，在一切政權轉變爲蘇維埃的條件之下，如若能夠實現，也不過是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變成蘇維埃管轄之下的附屬品，使它自然的死亡而已。

不用說，如果多數黨沒有這種政策，立憲會的解散也就決不能有這樣容易，同時社會革命黨和少數派在「一切政權歸國民會議」的口號之下的活動，後來也就決不會遭受這樣嚴重的失敗了。

列甯說：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曾參加

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的選舉，國民會議。我們這種政策，研究對不對的呢？……我們——俄國的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時候，有沒有比西歐任何一國的共產黨更有權力把俄國國會主義當作政治上，已經陳腐的東西了呢？當然有的。但事情並不在乎資產階級國會的歷史長久或不長久，而完全在乎廣大的勞動群眾對於接受蘇維埃的制度與解散或允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準備（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及實際上的）到什麼程度，由於種種特別的條件和環境，俄國城市中無產階級，農民和兵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還很少準備着去接受蘇維埃的制度，和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這完全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上的事實。但多數黨無論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前或後，不僅不抵制和反對國民會議，而反親自去參加他們的選舉』（參考十七卷，一四八，一四九頁）

爲什麼多數黨不抵制立憲會議呢？列寧說，因爲：

「甚至於在獲得蘇維埃共和國勝利的幾天以前，甚至於在獲得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不但不妨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反使他最容易證明給落後的民衆看。爲什麼這樣的國會應當解散。同時也使我們解散牠更容易得着成效。更容易在政治上撲滅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同上）

很足以令人注意的，托洛斯基不明白多數黨這一個策畧的特點，以爲國民會議和蘇維埃結合理論，完全是希弗亭式主張。

但他不明白在暴動的口號之下，和蘇維埃將必勝利

的條件下，這種與國民會議的召集配合的方法，是唯一革命的策略，與希弗亭的變蘇維埃爲立憲會議的附屬品的政策，完全沒有一點相同的。至於有幾個同志在這問題中的錯誤，也并不能因此非難列甯和黨關於在相當條件之下「混合的國家」之十分正確的主張。（參考列甯全集第十四卷下冊二七五頁）

他不知道，如果多數黨對於國民會議沒有這種特殊的政策，他們就決不能攫取千百萬群眾到自己方面來，如果不能攫取千百萬群眾，他們也就不能把十月暴動，變爲深入民衆的革命。

很有興趣的托洛斯基甚至把多數黨人的文章中「國民」，「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等等話，竟認爲對馬克思主義是不體面的。

托洛斯基很明顯的忘記了列甯，一個公認的馬克斯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前一月，還寫到：「必須把一切政權即刻轉入在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手中」（參看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下冊第一三九頁）。

托洛斯基大概忘記了列甯，一個公認的馬克斯主義者，曾引證馬克斯給枯格爾曼信中（一八七一年四月）的一段話，說：破壞官僚的軍事的國家機關是大陸上一切真正的國民革命的先決條件。他的話是黑字寫在白紙上的。

「應特別注意馬克斯最深刻的一句話；破壞官僚的，軍事的國家機關是「一切真正的國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馬克斯口裏說國民革命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派和少數派這班斯脫魯甫的信徒，願意自命爲馬克斯主義者，或者要宣布

這種措辭是馬克斯的失言。他們用可憐的自由主義的眼光把馬克斯主義曲解，則這樣，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互相對立外，中間就無所有了。他們何等的死板板地了解這種對立啊！……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邊沒有一個國家無產階級是佔人口的多數，實際上吸收多數群眾參加運動的「國民」革命，只有包括工農羣衆才可以名符其實。這兩個階級組成了那時候的「國民」。這兩個階級因共同受着「官僚的軍事的國家機關」之壓迫，虐待與剝削而聯合了起來，打碎這種機關，破壞它，這也就是人民——大多數的工農——真正的共同的利益，這也是就是資產與無產階級自由聯合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種的聯合，德謨克拉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參考列甯全集第一四卷第二部第三三七頁）

列甯的這些話是絕對不能忘記的。

所以，能够使群眾以其自身的經驗，相信黨的口號的正確，并領導這些羣衆走向革命的地位，是黨奪取廣大的勞動群眾最主要的條件——也就是多數黨在十月革命準備期中策略上的第四個特點。

我想上面所說的，已經十分的充足把這種策略的一切特點，解釋出來了。

四、歷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開端與前提

毫無疑義的西歐各主要國同時獲得革命勝利的理論，和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不能獲得勝利的理論——完全是一種矯揉造作的，不自然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的歷史已證明這種理論的荒謬與錯誤。這種理論不

僅不能爲世界革命的發展的系統，因爲它完全是違反事實的。而且更不能當作一種口號，因爲它只是的約束各國的自動性，而並不是發展在某種歷史條件之下去攻破資本主義戰綫的單獨行動，因爲他并不能推動各國積極的去攻擊資本，而反主張消極的等待「全體瓦解」，因爲他在各國無產階級中不能培養革命的堅決的精神，而只以猶疑的畏縮的色彩去薰染，他們說，「忽然人家不起幫助，我們怎樣辦」：列寧很正確的說過，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獲得勝利是很「普通的事實」，但「各主要國家同時獲得勝利」却只是一件「罕見的例外的事」（參考第一五卷第四六六頁）。

但列寧的革命的理論并不只限於一方面的。他同時也是一個世界革命發展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內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并不是一件自足的任務。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國家不應當把自己看作一個自足的個體，而應當看作一個促進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的動力和工具。因爲在一國家內獲得革命的勝利，例如目下的俄羅斯并不只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及其逐漸的崩壞的產物，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的開端與前提。

當然，世界革命的發展的道路不是這樣簡單的，不是像從前在一個國家內尙未獲得勝利及帝國主義尙未發展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時代那樣簡單。因爲現在出現了種種新的要素，如在帝國主義發展的條件之下，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之不平衡規律的行動，這種規律說明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戰綫一般的減弱與個別國家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又如這種新的要素，如廣大的蘇維埃國家，已存在於西方與東方之間，世界財政資本剝削的中心與殖民地壓迫的舞台之間，因此種因素的存

在已足使全世界革命化。

這一切要素，在研究世界革命的道路時，都是不能不估計到的（我關於別的，次要的要素，已不必講了）。將由社會主義原素平均的成熟的發展，從前一航人往往認為革命而首先開始於比較「發展的」先進的國家。但是，現在這種觀念，必須要根本變更一下。

列甯說：

「現在國際關係的系統已成為下列的形勢：歐洲有一個國家，現在已成為一個被其他國家奴役的國家了，這就是德國。一些許多最老的國家在勝利的條件之下，利用了這種勝利對其本國的被壓迫階級做一點無關緊要的讓步，以緩和他們的革命運動，而且他們在這一方面竟有相當的成功，竟建立了相當的「社會和平」。

「同時有許多國家：東方印度，中國等等，由於最近帝國主義的戰爭，完全跑出了他們的圈子。他們的發展已完全按照歐洲資本主義的格式前進了，他們已開始了歐羅巴式的騷動了。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很明瞭的，他們的發展必然要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

因此，「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他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并不能像我們從前所說的那樣進行了。

他的完成並不是由於他們內部社會主義原素平衡的成熟而完全由於甲國對於乙國的剝削，由於對帝國主義大戰中第一個戰敗國的剝削與對於全部東方的剝削。同時東方在另一方面也由於這一次帝國主義的大戰走進了革命運動，完全捲入世界革命運動的漩渦中去了。」（參考第十八卷下冊一三五——

一三六頁)

如果我們再加上下面的事實，就是不僅戰敗國和殖民地被戰勝國所剝削，甚至於一部分戰勝國也陷入最強大的戰勝國英和美的財政剝削的輪軌中去了；這些國家間的一切矛盾，就是世界帝國主義瓦解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且除了這些矛盾之外，在每個國家的內部也有各種劇烈的矛盾，這一切矛盾更因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而更形加深與緊張，——如果關於這些一切都能加以注意，那末對於國際形勢的特殊現象，多少總可以有一個整個的概念了。

很明顯的，世界革命的發展，必然有幾個國家在本國無產階級得着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之下，以革命的方法由帝國主義的系統崩潰下來。我們已經看到，第一個由帝國主義系統崩潰下來的國家，第一個勝利的國家已經得到了其餘各國的工農勞動群眾的幫助了。沒有這種幫助，它就不能鞏固與堅持下去。這種幫助將要強大和緊張，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同時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由帝國主義系統崩潰下來的過程，必將因某一個勝利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日趨鞏固，日漸加速地變為世界革命向前發展的根據地，變為瓦解帝國主義的槓桿，而愈是急速，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事。

在某個解放的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底「最後」勝利，沒有其餘幾個無產階級的幫助，就決沒有獲得最終勝利的可能，如果這句話認為對的，那末，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其他各國的工農群眾的幫助愈實際，則世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就愈快亦愈澈底，這話也是對的。

但這種幫助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

它應當這樣表現出來：

第一，就是已獲得勝利的國家「應當盡一國所有的

力量來發展，幫助及喚醒其他各國的革命。」（參看列甯全集第十五卷，五〇二頁）

第二，「無產階級已獲得勝利的國家，剝奪了資本家，自己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起來反對一切資本主義的世界，吸引其餘各國的一切被壓迫階級，引導他們起來暴動反抗資本家，在必要的時候，甚至於以武力去反抗剝削階級及其政府。」（參考第十三卷，一三三頁）

這種第一個勝利國家的幫助之特點，不僅促進了別國無產階級的勝利，而且保障了社會主義在某一個勝利國內的最後勝利。

當然的，在世界革命發展的過程中，與資本主義國家平的帝國主義的柱石。與它在全世界的系統并立的，還要造成各蘇維埃國家的柱石，與全世界此等柱石的系統，這兩個系統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內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史。

列甯說：

「因為沒有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餘國家長久的，堅決的鬥爭，就不能把各國家自由的聯合在社會主義中。」（同上）

十月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的意義。不僅因為它是一個破壞帝國主義系統的偉大的發端；在帝國主義海洋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柱石，而同時亦因為它開闢了世界革命的第一個新紀元，建設了一個發展世界革命的有力的根據地。

因此，不僅那般忘記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性，而認為在一個國家內獲得革命的勝利純粹是民族的現象。僅僅是民族的現象，是不對的。同時，即那般沒有忘記十月革命的國際性，并把這個革命完全看作一個消極的，只會接受外界幫助的革命，也是很錯誤的。實際上，不僅是十

月革命須要別國革命的幫助，同時這些國家的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幫助，以求促進和加速他們顛覆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號在共產國際執委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

同志們！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認清了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從來沒有把民族問題與一般的革命問題分開過。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態度就是：布爾塞維克歷來都把民族問題當作與革命前途秘密聯繫着的一個問題。

舍米契同志引證了列甯的話，說列甯曾經主張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中去解決。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意思就是想說列甯曾認爲民族問題是憲法問題，也就是說，不是革命的問題，而是改良的問題。這完全是不對的。

列甯從來沒有作過（而且也決不會作）這種憲法的幻夢。只要把他的著作看一下就可以相信這點。即使列甯曾經說過憲法，但是也並不是說主張用憲法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他所主張的是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就是說，他把憲法只是看作革命勝利的一種結果。我們蘇聯也有憲法，而且這個憲法確實也反映到民族問題的解決。可是，這個憲法並不是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結果，而完全是革命勝利的結果。

此外，舍米契同志又引證我在一九一二年所著的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極力想在那裏找出間接的論據以證明他自己的正確。但這種引證却絲毫沒有得到一點結果。

因爲他不僅沒有找到，而且也不能找到一個引證或半點的含糊理論來證明他對民族問題的那種「憲法主張」。

爲了證實我這一句話起見，我可以從那本書上引一段話給舍米契同志看，在那一段話中我把奧大利式的解決民族問題方法（憲法的手段）完全與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解決方法（革命的手段）對立起來的。

那本書上是這樣說的。

「奧大利人想用小的改革的方法和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自由」。把民族的自治當作了實際的辦法，他們并不打算起根本的變動，也并不想作民權的解放運動，這種運動在他們的前途上是沒有的。但是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是把「民族自由」的問題與根本的變動，與民生解放運動相聯繫着的，并不打算實行改良的方法。這也就根本的改變了俄國民族底命運」。

我想。這裏說得已經很明白了。

這并不是斯大林個人的觀點，而是俄國馬克斯主義者的共同的觀點，他們過去和現在觀察民族問題完全是與一般的革命問題密切地聯貫着的。

我可以毫不困難地說：在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民族問題的提法曾經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前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的時期。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問題完全當作了整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底一部份，也就是說，把他當作了整個的工農革命專政問題底一部份。及至第二個階段，民族問題已擴大起來，而變成了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已經由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這時候我們就已把民族問題看作了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底一部分，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但無論在這兩個階段的任何一個階段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都是絕對地革命的。

我想，舍米契同志對於這一切還是沒有完全明了的

○ 因此他企圖把民族問題降低到憲法的立場上，就是說，把民族問題當作了改良問題。

從這個錯誤中也就產生出了他的另一個錯誤：他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質上看作農民問題。這並不是土地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因為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至於說民族問題不能與農民問題混為一談，因為除了農民問題之外，民族問題還包括民族文化，民族國家等等問題，這是正確的。不過民族問題的基礎，它的內部的實際是農民問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我覺得舍米契同志之所以不願意接受這個公式，也就是因為他沒有估計到民族運動內部的力量，而且也沒有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民衆革命性。他沒有了解到這一點，而且也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在實際上就是沒有估計到運動（例如霍爾瓦特的民族解放運動）內部的潛力，這對於整個南斯拉夫的共產黨是一種非常嚴重的複雜問題。

這就是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企圖把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與國際的環境，與歐洲的整個前途分裂開來，毫無疑義地也是錯誤的。舍米契同志根據現時在霍爾瓦特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沒有甚麼重大的民衆運動，因此便說，民族自立權的問題，是學院式的問題，至少也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即使這個問題在現時並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但如果戰爭一開始，或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如果歐洲革命一爆發，或者在爆發的時候，這個問題馬上成了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但戰爭是必然要爆發的

，他們必然是要打起架來的，如果我們把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觀察一下，對於這一點是勿容懷疑的。

在一九一二年，當我們——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民族綱領的第一個草案的時候，在俄羅斯帝國的無論那一個地方都還沒有什麼大的民族獨立運動。可是，那時我們就已認為必須把民族自決權（每個民族的自立權和國家的獨立權）這一項包含到我們的綱領中去。爲什麼呢？

因爲我們不僅只根據了當時現有的事實，而且也根據了國際關係整個系統中所發展着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那時不僅只顧到現在，同時也顧及將來。而且我們知道，如果那一個民族要求自立，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努力的爲使每個民族都能獲得這種自立權而奮鬥。舍米契同志在他的演講中歷次引証斯太林論民族問題的那本書。

現在且看一看斯太林在這本書中關於民族自決和獨立的問題是怎樣說的：

『歐洲帝國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資本在歐洲已經感覺到太狹隘了，因此他就要向外發展，尋找新的市場，賤價的勞動，新的投資場所。

但這必然要引起外部的糾紛和戰爭。在這一種內外局勢的匯合之下，俄羅斯的某一個民族必然會起來提出和解決他們的民族獨立問題，這是非常可能的。阻制這種運動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

這還是在一九一二年寫的，你們知道，這幾句話到後來，在戰爭時和戰後，尤其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專政勝利之後，就已完全證實了。

我們更有理由的可以說，在歐洲各地，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特別是在現時，在被壓迫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業

己深入，俄國革命也業已取得勝利之後，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同樣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就是：南斯拉夫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他是與某種帝國主義的集團聯繫着的，因此他也就決不能逃出南斯拉夫之外所作的那一場惡戰。如果，你要替南斯拉夫共產黨規劃一個民題的綱領——現在所說的正就是這一點——那末，就必需要牢記着，這種綱領不僅要根據現時所有的事實，同時也一定要根據由於國際關係而發生的并且必然要發生的那種現象。

因此，我認爲民族自決權問題必須把他當作一個非常切於實際的迫切的問題。

現在再來講民族綱領吧。南斯拉夫必須起蘇維埃革命，不推翻資產階級，不獲得革命勝利，民族問題就不能有完滿的解決——這一種主張應成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當然，也有例外。例如在戰前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就是一個例外，關於這點列甯也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很詳細的講到過。但這件事是在戰前，在各種特別順利的環境的湊合之下發生的。在戰後，尤其是在俄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之後，這種機遇就很難得了。至少，這種機會的可能性已經少到幾等於零了。但如果這樣，那麼，我們當然就不能在這種「幾等於零」的立場上來建築綱領。因此，我們必須把革命的主張作爲民族綱領的出發點。

此外，也必須把民族自決直至國家自立的這一項放到民族綱領中去。何以在現時內部的和國際的形勢之下非加上這一項不可的理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最後，還有關於不需要脫離南斯拉夫的那些民族之疆土的自主這一項也必須特別列入民族綱領中。凡是認爲這一項可以不需要的，也是不對的。這完全是錯誤的。在某種條件之下，南斯拉夫的蘇維埃革命勝利之後，

有些民族不願脫離南斯拉夫，這是很可能的事，例如在俄國就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就必須把自主問題放到民族綱領中去，這意思就是說，將南斯拉夫改造成爲建築在蘇維埃制度之基礎上的民族自主國的聯邦。

因此，對於那些願意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必須予以自立權，對於那些不願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就必須予以自主權。

爲了免除誤會起見，我必須說明這點，就是切不可把自主權解作爲義務或責任。各民族可以享受這一種自立權，但如果他不願意的時候，亦可不享受這種權利——享受與否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這一點是必須認清的。有些同志把自立權變做了一種應盡的義務，他們要求霍爾瓦民族無論如何地要實行自立。這種主張是不正確的，我們必須放棄這種主張才對。我們決不可將權利與義務混爲一談。

再論民族問題

——關於舍米契的文章——

舍米契同志現在，在南斯拉夫委員會的討論之後，已完全同意共產國際中俄國共產黨代表的主張，這是很慶喜的事。但如果只根據這一點，便以為俄國共產黨的代表與舍米契同志之間，在討論前或討論時並沒有過爭論，這也是不對的。舍米契同志對於民族問題的爭論，似乎正是這樣想法的，他極力想把這種爭論歸咎於誤解。但可惜他完全錯了。他在他的文章中肯定地說，我們之間的爭論，完全是出於「誤會」，完全是由於他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一篇演講「沒有翻譯完全」而引起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把一切爭論完全歸咎於翻譯者，說他為什麼而沒有把他的話完全翻譯出來。爲了主張真理起見，我不得不申明，舍米契同志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事實的。如果舍米契同志能够把他在委員會上所講的話（現在保存在共產國際的文庫中）引證一段出來證明他的這個申明，當然比較是要好些。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他沒有這樣做。因此，我不得不再和舍米契同志作一次辯白，這種辯白雖然不很使人舒服，但是完全是必要的。

甚至在現在，當他已完全同意俄國共產黨代表的同意見時，在他的主張中也依舊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這一種辯白就更爲必要了。

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閱布爾塞維克第七期）已經說過，我們爭論的問題有三個：（一）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問題，（二）在現時歷史階段中之民族運動的內部的社會本質問題，（三）民族問題中之國際作用問題。

在第一個問題中，我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並沒有

完全明白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他把民族問題完全和一般的革命問題分裂開來，他把民族問題完全歸結於憲法問題。

這種主張究竟對不對的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號）所說的下面一段話拜讀一下後，自己去判斷罷。他說：

『可否把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呢？首先，我們有一個理論上的假設。假定，在X國家中共有A，B，C三個民族。這三個民族，都申明他們願意共同的相處在一個國家裏。在這種情形之下。問題是在於甚麼呢？當然，就在於調節這個國家的內部關係。就是說，完全是一種憲法問題。在這個理論上的假設中，民族問題是歸納在憲法問題中的……如果我們在這種理論上的假設中把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那時候我們就必須說——我一向是這樣主張的——，民族自決，直至民族自立，都是解決憲法問題的條件。我只是在這一種立場上提出我的憲法問題』。

我想，舍米契同志的這一段話用不到再做一番註解了。很明顯的，凡是把民族問題看作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一部分的人，就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反轉來說，只有把民族問題同整個的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完全分開來看的人，才會將民族問題歸到憲法問題中去。

在舍米契同志的演說中曾經說，不作革命的鬥爭，就決不能獲得民族自決權。舍米契同志說：『當然，祇有作革命的鬥爭纔能獲得這種權利。這種權利決不是用議會的方法可以獲得的，祇有羣衆的革命的行動才能獲得

』。但所謂『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究竟是什麼呢？可不可以將『革命的鬥爭』以及『革命的行動』與推翻統治階級，與奪取政權，與革命的勝利——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混為一談呢？當然是不可以的。把革命的勝利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條件，這是一回事，但如果把『革命的行動』『革命的鬥爭』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指出，在憲法的改良的道路上並不是完全丟開『革命的鬥爭』和『革命的行動的』。在決定某個政黨是改良的政黨抑是革命的政黨時，主要的標準不是他的『革命行動』的本身，而是它的革命行動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俄國的孟塞維克在一九〇六年，第一次國會解散之後，不僅主張組織『總同盟罷工』，而且甚至於主張『武裝暴動』。但他們總究還是孟塞維克。因為要知道，他們那時候主張這樣幹究竟是為什麼呢？當然並不是為了破壞沙皇制度，也不是為了造成革命的完全勝利，而只是為了『打動』沙皇政府以獲得相當改良，擴大憲法，及召集『完善』之國會而已。為了在舊的統治階級政權的保存之下改良舊制度而作『革命的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一種憲法的道路。為了破壞舊制度，為了推翻統治階級而作『革命的行動』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革命的道路，獲取革命之完全勝利的道路。這其間是有根本的區別的。

所以我認為，舍米契同志在主張將民族問題歸入憲法問題中的時候，雖也主張作『革命的鬥爭』，但不僅沒有推翻，反而更證實了我下面的這一句話：『舍米契同志並沒有完全了解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因為他不明白，民族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與革命勝利問題有密切聯系的，整個革命問題的一部分。

但我也并不想說，我關於舍米契同志在這一個問題中的錯誤所發表的意見是什麼的。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就已說過，曼奴依爾斯基同志說：

『舍米契同志在他所著的馬克思主義中之民族問題一書上以及他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上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把修改憲法的口號當作了共產黨的實際口號，這就是他實際上把民族自決問題全部歸到憲法的範圍中去說了。』（參看第五次大會記錄五九六頁）

季諾維夫同志在南斯拉夫的委員會上也說到了這個錯誤，他說：

『在舍米契同志的遠景中所缺少的只是革命這件東西，要知道，民族問題是革命的問題，而不是憲法的問題。』（參看真理報第八三期）

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中的這些代表們關於舍米契同志的錯誤所講的話，當然決不會是偶然的，毫無根據的。

○ 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舍米契同志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的其餘錯誤直接是從這個基本的錯誤中產生出來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在我的講演中（參看和爾塞維克雜誌第七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

這對不對呢？

請你們把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所說的下面一段話讀一下，而且請你自己去判斷罷。

舍米契同志問道：『南斯拉夫的民族運動之社會意

義是什麼呢』？他自己回答道：『這個社會的實質就在於塞爾維亞的資本與克羅阿脫及斯拉夫的資本之間的競爭』（參看舍米契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演說）。

當然，斯拉夫族和克羅阿脫族的資產階級與塞爾維亞資產階級間的競爭在這種民族運動中也能起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把各個民族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看作民族運動之社會實質的這樣人，就不會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族題——這也是一樣的毫無疑義的。現在，民間族題已從地方的國家內部的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問題，這時候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呢？現在民族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殖民地與附屬國反抗統治民族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財政剝削，政治壓迫，以及文化掠奪的鬥爭。在這一種民族問題的提法之下，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相互間競爭，能有何種意義呢？這種意義，當然不是最主要的，有的時候甚至是無關緊要的。很明顯的。這裏主要的並不是在於這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能在競爭中把另一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打倒的問題，這裏的問題是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群眾（首先是農民群眾），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引起了這些群眾與帝國主義鬥爭，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是在於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的競爭，那末也就不能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族問題反過來說，如果你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族問題，那麼，你也就不能把各種不同民族的資產階級間底競爭當作民族運動的社會實質。要在這兩個公式之間劃一個等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舍米契同志也引証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底所著

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句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就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他之所以引證這句話，就是想藉此來證明，他對於現時民族運動之社會實際所下的定義之正確。但這本書是在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現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完全國的它們當成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存果直到在還沒有看到國際的形勢已起了根本的變動，歐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列甯在他自己著的民族自決問題討論之總結一書中就已說過：民族問題的基本點——民族自決問題，現在已不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變成整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列甯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的代表關於民主問題還發表了許多深遠的著作，我在這裏也不多講了。現在，當我們已由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時候，舍米契同志却偏來引證斯達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意義就僅僅是這樣：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空間與時間，離開了活的歷史環境，破壞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不顧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中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中是可以變成不正確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的講演中已經說過，俄國布爾塞維克的民族問題底提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十月革命前的階段，這時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民族問題還是當作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第二個是十月革命的階段，這時候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民族

問題也已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區別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是用不到再加以證明的。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沒有明白這兩個階段間的這種區別之意義！

因此我認爲舍米契同志不願把民族問題在實際上看作是農民問題，而要把它看作是各種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間之競爭的問題，是由於『忽視民族運動底力量和不了解民族運動之深刻的民衆的，革命的性質』所致。

舍米契同志的第二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季諾維夫同志在南斯拉夫委員會上也同樣的說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這是很可注意的，季諾維夫說道：

『舍米契同志說南斯拉夫的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因此不是革命的運動，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這種異口同聲的說法，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的。

又是無風不會起浪的。

最後，關於第三個問題，我也已經說過，舍米契同志企圖『離開國際環境和歐洲的前途來觀察民族問題』。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是的，這是對的。因爲舍米契同志在他的說話中絲毫沒有講到國際環境在現時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對於南斯拉夫，是解決民族問題事業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南斯拉夫國家本身是帝國主義兩大集團間衝突的產物，南斯拉夫決不能逃出它周圍的帝國主義國家現時所要發生的那一場惡戰——這一切事實都是在舍米契同志的視線之外的。舍米契同志說他完全承認在國際環境相當的變動之後，民族自決問題能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但這種說法，在現時的國際環境之下，已經是不充分的了。現在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承認在遙遠的將來國際環境能起相當變動，而使民族自決問題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這一點，在現在，就是那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黨人，在必要的時候，也會承認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此，而是在於：不要使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南斯拉夫現有的疆界變成解決民族問題的出發點和立法根據。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民族自決問題，及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或者是描寫遙遠的未來的那種民族綱領的招牌，或者是民族綱領的基礎。一般看來，是很明顯的，民族自決這一條如果只是民族綱領的招牌，當然就決不能同時又說它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民族綱領的基礎。我恐怕舍米契同志還照舊地把民族自決問題看作民族綱領的一種未來的招牌。

所以，我認爲舍米契同志完全把民族問題與整個的國際環境問題分裂了開來，因此他把民族自決問題，即根本改變南斯拉夫疆界的問題，當作了一個學院式的不切實際的問題。

舍米契同志的第三個錯誤就是這麼一回事。

曼奴依爾斯基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的報告中，也同樣的講到了舍米契同志的這個錯誤：

『舍米契同志對民族問題的整個主張之基礎前提就是下面的這一個思想；無產階級應在許多戰爭和努力所造成的那種疆域中去奪取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一種異口同聲的說法難道是偶然的麼？當然，不是的。

再說一遍：無風是不會起浪的。

（此文登於布爾塞維裏雜誌第一一、一二號，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號。注重點是我加的——斯達林註。）

與美國第一批工人代表團 的 談 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一、代表團問題和同志的答覆

問題（一）：列甯和共產黨實際增加到馬克斯主義上去的是那些新的原則呢？有人說列甯相信『創造的革命』，而馬克斯則比較偏重於等待經濟力量發展的最高點之到來，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覆：我認爲列甯並沒有將什麼新的原則增加到馬克斯主義上去，同樣，馬克斯主義的一切『舊的』原則，列甯也一個都沒有刪去。列甯自始至終是馬克斯主義底斯最忠實的最澈底的信徒，他完全是依靠在馬克斯主義底原則上的。但列甯不僅只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學說的實行者。他同時也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學說的繼承者。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列甯更進一步地闡發了馬克斯和恩格斯學的說，使之適應於新的發展條件，適應於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適應於帝國主義。這就是說，列甯在新的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向前發展了馬克斯的學說，在馬克斯主義的寶庫中加添了一點新的東西（與馬克斯和恩格斯所已經賜給我們的東西比較起來，與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中所能賜給我們的東西比較起來，可則說這是新的。），而且，列甯加添到馬克斯主義寶庫中去的這一點新東西也完全是依據在馬克斯和恩格斯底原以上的。因此我們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

主義。列寧在闡發馬克思主義時所加添的新東西就包括在下列幾個問題中。

第一個問題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中對於資本主義的基礎已給了我們一個分析，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存在壟斷時期前的資本主義的統治時代，是生存在資本主義日漸演進及「和平」擴張於全世界的時期。這個舊的階段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始行告終，可是那時候馬克斯和恩格斯都已經去世了。因此，在新的階段，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代替了舊的階段以後的那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環境（這時候突變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代替了資本主義的逐漸演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劇烈地銳利化，為資本輸出和銷貨的市場而鬥爭的結果，在發展極不平衡的條件之下，必然的要引起帝國主義為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定期的戰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還不能親眼看見，只能自己憑空猜想。列寧的功績，也就是列寧所加添的新的東西，他根據資本論中的基本原則，給帝國主義以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揭穿了帝國主義的破綻，及其必然死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就產生了列寧關於在帝國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可以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的那一個著名的論點。

第二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就是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方法，這種基本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了我們。列寧在這一問題上所加添的東西就是：（甲）他利用了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經驗，發明了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乙）他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中的

無產階級之同盟者的問題，他認爲了無產階級專政是居領導地位的無產階級與居被領導地位的被剝削的非無產階級羣衆（農民等等）底一種特殊的聯合形式，他特別鄭重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之德謨克拉西底最要形式，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的）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底形式，它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利益的資本主義的德謨克拉西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就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在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四面被資本主義的國家所包圍的國家中，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之形式和方法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思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是一個比較長久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必然充滿了革命的鬥爭和國內戰鬥，無產階級在這時期中掌握着全部政權，他必須作種種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及組織上的設施，以便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無國家的新社會去代替資本主義的舊社會。列甯完全站在馬克思和恩格思的這種基本學說的立場上。列甯在這個問題上所加添的新的東西就是：（甲）他証明了在帝國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國家內（只要他不被四周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所撲滅）建設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乙）他指示出了經濟政策的具體道路（「新經濟政策」），在這種政策的幫助之下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交通，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將社會化的工業與農業聯繫起來（「工業與農業底聯合」），將全部國民經濟吸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丙）他指出了經過合作社逐漸吸引農民的基本羣衆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去的具體方法，指出合作社是無產階級專政手中改造小農經濟和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農民基本羣衆底莫大的工具

第四，就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一切民衆革命中（無論在推翻沙皇專制的革命中，或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中）底領導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底思想已經給我們起了一個基本草稿。列寧所加添的新的東西就是：他便向前闡發了這一個基本學說，把這個基本草稿闡發成了一個無產階級領導權底完整的系統，闡明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政體的事業中握有對城市和鄉村勞動群眾的領導權，同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也同樣地握有此種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因列寧及其政黨的緣故而得很巧妙的應用於俄國。因此俄國革命的結果使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前的革命照例是這樣的：工人們在革命時候作英勇的巷戰，他們流了很多的熱血，推翻了舊的政權，但政權結果仍落入資產階級的手中，讓他們來剝削和壓迫工人。法國和英國的革命就都是如此。德國所經過的革命也是這樣。

可是在俄國却全然不同。在我們俄國，工人不僅是革命的主力軍，他同時他極力使自己成了城市與鄉村一切被剝削群眾的政治領導者，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使他們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陷於孤立的地位。俄國無產階級既握取了一切被剝削群眾底領導權，他同時又時刻為奪取政權及以本階級的利益用此種政權去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而奮鬥。因此，俄國每一次強大的革命的發動（無論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運動或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運動）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推上了舞台，這種工人代表蘇維埃正就是用來壓制資產階級的那種新的政權機關底萌芽，他與專門用來壓制工人的那種舊的政權機關，資產階級的會議，是完全相反的。俄國的資產階級曾經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的國會和撲滅工人代表蘇維埃；第

一次是在布爾塞維克握取政權之前，一九一七年八月的「國會籌備會」的時期，第二次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一九一八年一月的『立憲會議』的時期；可是這兩次企圖都遭了失敗。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處在孤立的地位，廣大勞動群眾已把無產階級當作了唯一的革命領袖，群眾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已認清蘇維埃是他們自己的工人的政權，如果把蘇維埃換作資產階級的會議，就等於是無產階級自殺。因此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沒有在俄國實施，是毫不奇怪的。因此俄國的革命能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這就是實施列甯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領導權的學說系統所收到的效果。

第五，就民族殖民地問題。馬克斯和恩格斯分析了那時候在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波蘭，匈牙利所發生的一切事變，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中給了我們一個基本的觀念。列甯的一切著作是根據這些觀念的。列甯這個問題上所加添的新東西就是；（甲）他把這些基本的觀念匯合成了一個完整的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學說底系統；（乙）他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貫起來；（丙）他說明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

最後，就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馬克斯和恩格斯在政黨問題上已給了我們一個基礎，他們已經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隊伍，沒有黨，無產階級就決不能達到他的解放——既不能奪取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的社會。列甯在這個問題上所加添的東西就是：他更進一步地闡發了這個基本學說，使之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之新環境，他証明：（甲）與無產階級其他的組織形式（職工會。合作社，國家組織）比較起來，黨是

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乙）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黨才能實現，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指揮力量；（丙）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當他被一個政黨——共產黨領導着的時候，才能算爲完善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決不能并且不應該把這種領導權分給別的政黨；（丁）在黨內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撲滅剝削階級，把階級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底任務。

上面所說大致也就是列甯在他的著作中所告訴我們的那些新的東西，他把馬克斯的學說具體化了，并且更進一步地闡發了馬克斯的學說，使之適用於帝國主義時期的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

因此我們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

由此可見列甯主義是不能與馬克斯主義分開來的，更不能將他與馬克斯主義對立起來。

在代表們的問題中又提到：「有人說列甯相信『創造的革命』，而馬克則偏重於等待經濟力量發展的最高點之到來，此種說法是否正確呢？」我認爲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我認爲民衆的革命，如果他真正是民衆的革命，那末就必然是創造的革命，因爲他必然要破毀舊的制度，創造新的制度。當然，有一種「革命」，例如阿爾巴尼的那種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的鬧玩意兒似的「暴動」，是一點創造的意義也沒有的。但是這一種鬧玩意兒似的暴動，馬克斯主義者從來不把他當作「革命」的。

我們所說的革命當然並不是這一種「暴動」，而是廣大的民衆革命，被壓迫階級起來反抗壓迫階級的革命。可是這一種革命必然是一種創造的革命。馬克斯和列甯所主張的就是這一種革命，而且僅僅就是這一種革命。同

時也很明顯地，這一種革命決不是在任何條件之下都可以發生的，他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的優越條件之下才能爆發起來。

問題（二）：可不可以說共產黨監督着政府？

回答：這是要看怎樣瞭解這監督兩個字而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對監督兩個字的瞭解法是有些特別的。我知道，有許多資產階級政府是被最大的銀行監督着。雖然在外表上有「德謨克拉西的」議會存在着。議會也自以為他們監督着政府。但在實際上政府的成分完全由大的銀行團決定的，政府的行動也完全是受銀行團監督的。誰不知道，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的「列強」是決不能違反大財政資本家的意志而組織內閣的，財政資本家們祇要在財政上壓制一下，那些大臣總長倒更可以立刻應命而至。這就是議會監督政府的假名義之下的實際上的銀行對政府的監督。如果你們所說的是這一種監督，那我就應當申明，財主對政府的監督在我們這裏是完全沒有的，而且也絕對不可能的，銀行在我們國家內早已國有化了，財主們也早已起出了蘇聯的境界，因此更談不到什麼財主的監督了。

也許，代表們要問的並不是監督，而是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如果代表們所要問的是領導，那我的回答就是：不錯，我們的黨是領導政府的。黨之所以能享有此種領導權，就是因為他能夠取得大多數工農羣衆的信任，他有權力代表這大多數的工農羣衆去領導政府機關。

蘇聯的無產階級政黨，蘇聯的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共產黨努力的經過蘇維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吸收忠心於無產階級事業的，真正能忠誠地為無產階級服

務的最優異的工作人員去擔任國家機關的重要職務。而且共產黨常常能够做到這點，因為工農對共產黨都是很信任的。我們國家政權的領導者是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我們國家內有極大的威信，這決不是偶然的。

第二，黨精密的審查行政機關的一切工作，糾正行政機關工作上的各種可避免的錯誤和缺點，幫助他們實施政府的決議，極力保證他們能得群眾的幫助，凡是一切重要的決定，都是經過黨的相當的指示。

第三，政府機關在決定工業，農業，商業及文化事業方面的計劃當必須經過黨的指示。決定這種機關在實行這種計劃的工作底性質與方針。

資產階級的報章對於共產黨「干涉」國務的這件事情，常常表示他們的「驚奇」。但這種驚奇完全是虛偽的。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政黨也同樣是「干涉」國務和領導政府的，而且他們的領導是集中在極少數的幾個人手中的，這些人必然是與大的銀行有關係的，這些人也總是盡量使民衆不知道他們的作用。誰不知道英國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都有他們自己的秘密內閣，把政府的領導完全集中在他們少數幾個人的掌握中。路易喬治關於自由黨的秘密內閣的那篇演講你們大概總還記得吧。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的區別就是：（甲）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政黨是本着資產階級的利益領導政府去反對無產階級的，而在蘇聯，共產黨是本着無產階級的利益領導政府去反對資產階級的：（乙）資產階級的政黨用各種秘密內閣的方法，向民衆隱瞞他的領導作用，而蘇聯的共黨產則絲毫不用秘密內閣的方法，他反對一切秘密內閣的政策和實際，公開的向全國人民宣佈他對國家的領導責任。

有一個代表問道：黨是否以同樣的原則領導着職工會？

回答：在大致方面是這樣的。在形式上黨對職工會是不能發什麼指令的。但黨對在職工會中工作的共產黨員是可以發指令的。大家知道，在職工會中是有共產黨底黨團的，在蘇維埃，合作社等等的組織中也同樣有這種黨團的存在。這種黨團的任務就是在職工會，蘇維埃等等的組織中，用說服的方法使適合於黨的指令的一切決議得能實現。共產黨常常是能夠實現這點的，因為黨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且這些羣衆對黨也有極大的信任。這些可使各種不同的無產階級組織的行動一致的起來，如果沒有這種黨團，各種不同的無產階級組織就會成一種非常散漫的不一致的現象。

問題（三）：在俄國既只有一個合法的政黨，那麼你從何知道羣衆都是同情於共產主義地呢？

回答：不錯，在蘇聯沒有合法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合法的政黨只有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可是我們有沒有方法証明大多數工人羣衆和勞動羣衆是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呢？我們所說的羣衆，當然是指工農羣衆而言，而決不是新起的資產階級，決不是已被無產階級所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殘餘。是的，我們是有方法可以知道，可以證明——工農羣衆是否同情於共產黨員。我們只要在我們國家的幾個重要的關頭上來看一看，就可知道我們究竟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羣衆確實是同情於共產黨員的。

首先，我們是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的這一個重要的關頭來看，在這個關頭共產黨曾公開地號召工農去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共產黨曾得了工農兵大多數羣衆的擁護。那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局面呢？執掌政權的是

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即與資產階級勾結起來的少數派）。中央與地方的政權機關，以及一千二百萬軍隊的指揮機關都完全操在這些政黨的手中，操在政府的手中。

共產黨是處在半公開的狀態中。各國的資產階級都預言多數黨必將滅亡。協約國又完全站在克倫斯基政府方面。可是共產黨，多數黨還是繼續不斷地號召無產階級去推翻這個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結果怎麼樣呢？後方與前綫的大多數勞動群眾都非常堅決地擁護多數黨——結果，他們終於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多數黨竟能不應各國資產階級關於多數黨必須滅亡的預言而成了勝利者呢？這一點是否是能證明大多數勞苦羣衆是同情於多數黨呢？我認爲這一點是足能證明的。這便是共產黨在廣大的群眾中之威信與影響的第一個證據。

現在再拿另一個時期——武裝干涉，國內戰爭的時期來看，那時候英國的軍隊佔了俄羅斯的北部，阿爾漢格爾斯加和莫爾曼區，西伯利亞也已經被英美日法的軍隊所佔據，高察克的軍隊節節前進，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已實行佔『南俄』，作爲但尼金和佛浪格爾的保障。這就是協約國和俄國的反革命軍官一致向莫斯科的共產政府，向十月革命勝利進攻的時期。這是共產黨在廣大的工農群眾中間大大地審察它的力量與堅固性的時期。結果怎麼樣呢？誰不知道，國內戰爭的結果，這些佔據者都被趕出了俄羅斯的境界，一切反革命的軍官都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這證明戰爭底最終的命運，不是由技術來決定的（蘇聯的仇敵曾大批以軍火供給但尼金和高察克），而是由正確的政策，廣大的群眾之同情與擁護來決定的。多數黨的勝利是不是偶然的呢？當然不是的。這

是否證明廣大的勞動群眾是同情於共產黨的呢？我認爲是的。這就是蘇聯共產黨之力量與堅固性底第二個証據。

現在再來講最近的時期，戰後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和平的建設已成了一個主要的問題，經濟破壞的時期轉入了工業恢復的時期，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時期。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証明共產黨的力量和堅固性，可以判斷勞動群眾對共產黨的同情的程度呢？我以爲是的。

我們首先拿包含有一千萬工人左右的職工會及其領導機關的成分來看。這些機關的領導人物都是共產黨員，這是不是偶然的呢？如果有人以爲蘇聯的工人對方領導機關的成分底態度是淡然的，那是一種很愚蠢的觀念。

蘇聯的工人是三次革命的怒潮中生長出來，陶冶出來的。他們已學會考察他們的領導者，如果他們的領導者不能滿足無產階級利益的時候，他們就會把這些領導者趕走。

普列漢諾夫有一個時候曾經是我們黨內名望最大的一個人。但是工人們到了證實普列漢諾夫已經離開無產階級底路線的時候，他們就毫不猶疑地離開了他。如果這樣覺悟的工人能夠完全信仰共產黨員信托：他們做職工會的領導工作，那麼這就已足能證明共產黨在蘇聯工人中間的力量和堅固性是很大的。這又是廣大的工人群眾絕對同情於共產黨的一個鐵證。

現在我們再拿最近蘇維埃的選舉來看。在我們蘇聯，除了剝削他們勞動的資產階級份子和一切遞奪選舉權的份子外，不分性別，不分民族，凡是十八歲以上的成年男女都有選舉權的。蘇維埃的選舉人約有六千萬。其中大多數當然是農民。在這六千萬人中間真正實現了選

舉權的約百分之五十一即三千萬餘人。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中央與地方的蘇維埃領導機關的成分。大多數被選為領導人員的分子都是共產黨員，這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呢？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不是表示廣大的農民群眾對共產黨的信仰呢？我以為是的。這又是共產黨的力量與堅固性底一個證明。

現在再拿包含着，百萬工農青年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來看。大多數當選為領導人員的少共分子都是共產黨員，這是不是偶然的一回事呢？我認為決不是偶然的。這一點也足證明共產黨的力量與堅固性。

最後，我們再拿全蘇聯成千成萬的各種民族的男女勞動群眾，男女工人和農夫農婦所集合的無數的臨時會議，代表大會等等來看。西方人往往譏笑這點，說俄國人特別愛講話。可是在我們看來，這些會議是有很大底意義的，從這種會議上我們可以考察出群眾的情緒，可以顯示我們的錯誤，可以指示出消滅這種錯誤的方法，因為我們的錯誤是很多的，我們認為揭示錯誤和誠懇地糾正錯誤是改良領導的最好的方法。你們只要看一看在這種會議上所發的言論，看一看工農隊伍中這些「平民」切實的提議，看一看他們的決議——你們就知道共產黨的影響和威信是多麼龐大，你們就知道俄國共產黨的這種龐大的影響和威信的可以使全世界任何一個政黨羨慕。這又是共產黨的堅固底一個證明。

這就是使我們可以證明共產黨在民衆中之力量與影響底方法。

這就是我所以知道廣大的工農群眾是同情於共產黨的原因。

問題（四）：如果非黨的群眾組織了小組織，在選

舉中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這些人都是站在擁護蘇維埃政府底立場上的，可是他們同時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他們是否可以有方法進行他們積極的政治活動呢？

回答：我認爲在這個問題中本身含着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凡是真正站在擁護蘇維埃政府立場上的人決不會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底壟斷的。爲什麼呢？因爲對外貿易的壟斷是蘇維埃政府『綱領』底一個不可移動的基礎。因爲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人，事實上決不會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因爲只有切骨仇悞蘇維埃制度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在蘇聯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人當然是有的。這一種人就是：耐潑曼（Nepman——即新經濟政策下的資產階級——譯者），富農，已經被無產階級打得落花流水的剝削階級的殘餘等等。可是這些人只佔全人口的極少數。我想代表們在這問題中所說的當然不是這一種人，如果所說的是工農勞動群衆，那我們就要告訴你們，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要求只能引起他們的譏笑與敵視。

在事實上，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對於工人們是怎麼樣呢？這對於他們就是放棄國家的工業化，放棄建設新的工廠，放棄擴大舊的工廠。這在他們看來就是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汎濫到蘇聯來，就是縮小我們的工業（由於他的相對的薄弱），增加失業工人的數量，使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日趨惡化，減弱它的經濟和政治的地位。這結果就是加強新起的資產階級底力量。蘇聯的無產階級會不會去走這條自殺的道路呢？當然是不會的。

取消對外貿易的壟斷對於農民勞動群衆是怎麼樣呢？這對於他們就是使我們的國家由獨立國變成半殖民地，就是使農民貧窮化。就是恢復高察克和但尼金時代的

自由貿易制度，就是恢復反革命軍閥和「聯軍」任意劫掠農民那個時代的制度。這結果就的加張富農和農村中其他的剝削分子的力量。農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窩瓦河流域，和西伯利亞已嘗夠了這種制度的滋味。有什麼根據可以預料他們又重新想去上這個圈套呢？農民群眾決不會贊成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道理難道還不明顯麼？

有一個代表說：我們說明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這點，如果蘇聯沒有共產黨的壟斷，沒有合法權的壟斷，是可以組成一個整個民衆黨集團的。

斯大林回答：這樣說來。代表們又重新回到共產黨的壟斷，即回到共產黨是蘇聯唯一的合法政黨這個問題上去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在說到証明廣大的工農群眾對共產黨之同情的方法的時候，已經給了一個簡單的答覆。

至於說到人民中其他的階層，耐潑曼（新與資產階級），富農，舊的剝削階級的殘餘，他們在我蘇聯是沒有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的，正如他們被褫奪了選舉權一樣。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手裏剝奪過來的不僅是工廠，銀行，鐵路，土地，和鑛山。他們同時還剝奪了資產階級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因為無產階級不願意恢復資產階級的政權。我想代表們大概是不反對無產階級剝奪資產階級的工廠，銀行，鐵路，和鑛山的這種行爲的（笑）。但是我覺得代表們對於無產階級何以不僅限於這種行爲，且更進一步地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這一點還有點莫名其妙。我個人覺得這是不十分合邏輯的，更正確些說，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有什麼理由可以叫無產階級寬洪大量地對待資產階級呢？難道西方握有政權的資產階級對待工人階級肯放鬆一點麼？難道他們沒有把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迫入秘密的道路麼？有什麼理由可

以叫蘇聯的無產階級去寬洪大量地對待他們的階級敵人呢？我覺得邏輯上是應當如此的。誰認為可以把政治權利歸還資產階級，按照邏輯推論起來，誰就應當更進一步地提出把工廠，鐵路，銀行歸還資產階級的問題。

有一個代表說：我們代表團的任務就是要弄明白工農群眾的意見（與共產黨不同的那一種意見）如果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示。我們代表團所關心的並不是把政治權利給予資產階級的問題，也決不是資產階級的意見如何可以得到合法之表示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工農群眾的意見如何可以得到合法之表示的問題。

另一個代表說：這個意見我想可以在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職工會等等組織中找到他們的表現。

斯大林回答：很好。這樣說來，你們所講的，並不是恢復資產階級政治權利的問題，而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內部意見的鬥爭的問題。在工農群眾中間現在有沒有意見的鬥爭呢？當然是有的。數千百萬的工農群眾，要他們腦子中所想的完全一樣，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生活上所沒有的事。第一，在工人與農民之間，就其經濟地位，及對各種問題的觀感而論，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第二，在工人階級的內部，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熱度，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出身（世代的工人與農民出身的工人是有區別的）等等。這一切都是能引起工農內部意見的鬥爭，這種不同的意見在大會上，職工會中，合作社中，選舉蘇維埃時都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示。

不過在現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意見的鬥爭與過去十月革命前的意見的鬥爭是有根本的區別的。從前工農群眾中間的意見的鬥爭，主要的是集中在推翻地主，沙皇

政權，資產階級及毀滅資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上的。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意見的鬥爭，已不在推翻蘇維埃政權，毀滅蘇維埃制度的問題上，而在改善蘇維埃政權的機關與工作的問題上了。這是有根本的區別的。

在從前以革命手段毀滅現存制度這個問題上的意見的鬥爭，往往曾使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內部形成好幾個互相鬥爭的政黨，這是毫不奇怪的。我們過去曾經有下列三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孟塞維克黨，社會革命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了解，在現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意見的鬥爭底目的已不在毀滅現存的蘇維埃制度，而在改良和鞏固這種制度，因此，他決不會使工農群眾的內部形成好幾個政黨。所以俄國只有一個政黨存在，只有一個共產黨壟斷，不僅不會引起工農群眾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們只覺得這樣是必要的，是他們所心願意服的。

我們共產黨的地位，全國內唯一的公開政黨的（一黨壟斷的地位），並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來的。這種地位決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的方法所能造成的。我們共產黨的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是在歷史上逐漸形成的，這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完全破產而下台的結果。過去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究竟是什麼政黨呢？他們是把資產階級影響轉給無產階級的傳達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這些政黨的生命是靠誰維持和幫助的呢？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因此，資產階級一推倒後，這些政黨就應該消去了存在的基礎，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這些政黨變成怎麼樣的政黨了呢？他們已變成恢復資本主義和推翻無產政權的政黨了。這種政黨在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群眾中間必須要失掉他們的基礎和一切影響

，難道這還不明白麼？

共產黨與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之間爲爭取對工人階級之影響而作鬥爭不是昨天才開始的。這種鬥爭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在俄國群眾革命運動的第一個徵兆初出現的時候就已開始了。從一九〇三年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爲止的這個時期是俄國工人階級內部意見上劇烈鬥爭的時期，是布爾塞維克，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爲爭取對工人階級之影響而劇熱鬥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蘇聯的工人階級經過了三次革命。工人階級在這三次革命的火燄中已檢閱了和考察了這些政黨，考察了這些政黨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利害及這些政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因此，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當歷史把過去的革命鬥爭作一個總結的時候，當歷史把工人階級內部相互鬥爭着的政府放在天秤權衡輕重的時候——蘇聯的工人階級作了一次最後的選擇，結果終於選中了共產黨作爲唯一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爲什麼工人階級偏選中了共產黨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布爾塞維克在列甯格勒的蘇維埃中只佔少數，難道這不是事實麼？那時候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在蘇維埃中佔大多數，難道這不是事實麼？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一切政權機關和壓迫機關都操縱在與資產階級勾結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手中，這難道也不是事實麼？共產黨之所以能被工人階級所選中，第一就是因爲共產黨那時候主張停止戰爭，主張立刻實現德謨克拉西的和平，而當時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却主張「戰爭到勝利爲止」，主張繼續帝國主義的戰爭。第二，因爲那時候共產黨主張推翻克倫斯基政府，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主張沒收工廠，銀行和鐵路，而當時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却拚命的擁護克倫斯基政府。主張保

持資產階級對於工廠，銀行，和鐵路的私有權。第三，因為共產黨那時候主張立刻沒收地主的土地，把地分給農民，而當時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却主張把這個問題攔到立憲會議，同時立憲會議的召集又是茫茫無期。在這種情形之下工農群眾終於選中了共產黨，這有什麼奇怪呢？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如此迅速的倒台，這又有什麼奇怪呢？因此共產黨便取得了政權。

以後的時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國內戰爭的時期，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完全崩潰的時期，是布爾塞維克黨奏最終之凱旋的時期。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在這個時期自己促成了共產黨的凱旋。在十月革命時期打得落花流水的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殘部，這時候已開始與富農的反革命的暴動聯繫起來，與高察克和但尼金的反革命軍隊勾結起來，候協約國的驅使，他們在工農的心目中完全葬送了自己。情形是這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變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家，幫助了協約國來撲滅蘇維埃制度的新俄羅斯，而當時共產黨却在自己的四周圍日益增漲地團結了一切新的革命的力量，喚起了工農的一切新的隊伍為社會主義的祖國而鬥爭，反抗協約國的進攻。共產黨在這個時期的勝利必然要引起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引起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的完全失敗。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成了工人階級和貧農群眾之唯一的政黨，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我們共產黨的壟斷 全國內唯一的公開政黨的壟斷就是這樣形成的

你們說到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工農群眾內部的意見的鬥爭 我已經說過，這種鬭爭現在是有的，而且將來也還有的是，沒有這種鬭爭社會也不能前進的。不過

現在的鬭爭不是在推翻蘇維埃制度的原則問題上的鬭爭，而是改良蘇維埃機關，糾正蘇維埃機關的錯誤，就是說一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實際問題上的鬭爭。這種鬭爭當然祇能鞏固和改善共產黨。這種鬭爭當然能鞏固共產黨的壟斷。這種鬭爭當然也決不會使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內部形成其他的政黨

問題(五)：你可不可以把你和托洛恩基之間的主要的意見上的分歧約畧的告訴我們一下？

回答：首先我應當申明，我和托洛斯基的意見上的衝突，決不是個人的衝突。如果這是一種帶有個人色彩的衝突，黨連一點鐘的時間都不會用到它的身上，因為黨是不喜歡同志們鬧個人的意氣的。所以你們現在所說的，當然是黨內的爭論。我對於你們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了解的。是的，這種爭論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關於這種爭論的性質不久以前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的報告中，布哈林同志在列甯格勒的報告中已經很詳細地說過。這兩個報告也已經公佈出來。這種問題在兩個報告中已講得很明白，我無用再加以補充。如果你們手裏還沒有這些材料，我可以拿來給你們（代表團說他們已有這些材料）。

有一個代表說：我們回國之後一定有人要問我們這些爭論的內幕，可是這些爭論的材料我們還沒有完全得到，例如，『八十三人』的綱領我們至今還未拿到。

斯大林：我沒有在這個綱領上簽字。成沒有權力支配別人的東西。（笑）

問題(六)：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推動生產發展的刺激物是榨取利潤的慾望。這個刺激物在蘇聯當然是沒有的。那末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呢？你認為這種代替物的效果如何呢？它是否永久的存在呢？

回答：不錯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是利潤的榨取。不錯。在我們蘇聯，榨取利潤並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目的，也不是它的推動力。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什麼東西是我們工業的推動力呢？

第一就是，我們這裏的工廠都是屬於人民的，而並不屬於資本家的，管理工廠的並不是資本家的走狗，而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們感覺他們不是替資本家做工，而是替他們自己的國家，替他們自己的階級做工——這種覺悟就是使我們的工業發展和進步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還有一點必須特別指出來的，就是，大多數工廠的經理都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委任而得職工會同意的工人，無論那一個經理只要違反了工人或當地職工會的意旨，就無論如何不能再保持他的經理的職務。此外，在每個工廠中都有一個工廠委員會，這個工廠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出來監督工廠行政機關底工作的。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來的就是，每個企業中都有工人的生產會議，全體工人都要參加這種會議，工人們在這種會議上審查工廠經理的一切工作，討論工廠行政工作的計劃，指出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經過職工會，經過黨，經過蘇維埃政權機關去糾正這種錯誤和缺點。很明顯地，這種制度是根本地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和工廠中的行政。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工人把工廠當成了監獄看待，可是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工人不但不把工廠看作監獄，而且完全把它看成了與他們切身相關的事業，他們熱忱努力地要使它進步和發展起來。

不用證明就可知道，工人對工廠的這一種新的關係，工人對工廠的這一種親切的感覺，就是我們工業的偉大的推動力。因此，我們看到，技術上的發明家和工業的組織動員數量一天天地從工人隊伍中增長起來。

第二，我們工業上的收入不是用來發個人的財的，而是用來擴大工業，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上的及文化上的生活，減低工農所必需的價格工業品的價，也就是改善勞動群衆的生活狀況。資本家決不肯把他的收入花費到改善工人生活上面去的，他是爲利潤而生活的。否則他就不成其爲資本家。他榨取利潤是爲了把這些利潤變成剩餘資本，投到工業比較不發達的缺乏資本的國家中去，投到可以榨取新的更豐厚的利潤的地方去。美國的資本就是這樣源源的輸到中國，南洋群島，南美洲，歐洲去，法國和英國的資本也是這樣源源的輸到它們的殖民地中去。我們蘇聯就完全不同，因爲我們根本不採取和不承認殖民地政策。我們工業上的收入依舊是歸國家用來擴大工業，改良工人的生活，減底工業品的價格以擴大國家市場的含量（農民市場也包括在內）我們的工業利潤，百分之十是用在改良工人生活上面。工人工資的百分之十三是作爲工人的保險金的（這筆錢完全是歸國家出的，每年共八萬萬餘盧布）。還有一部份利潤（我現在不能說出精確的數目）是用在文化的設施，工廠學校和工人的休養上面的。還有一大部份的利潤（我也不能說出精確的數目）是用在每年的增加工資上面的。其餘的工業利潤就都用來擴大工業，修理舊工廠，建設新工廠及降低工業品價格。這種情形對於我們工業的龐大的意義就是：一，它促進農業與工業的聯合，與城市鄉村間矛盾的消滅；二，它助長了國內市場容量的擴大（城市的及鄉村的市場），同時也就造成了不斷地發展工業的基礎。

最後，還有一點：工業的國有化促進了整個工業經濟之有計劃的進行。

我們工業的這些刺激物和推動力，是否能成爲永久

的發動力呢？是的，這些都必然是永久的刺激物和推動力。我們的工業越發展，這些原動力的作用和意義也就越增加。

問題（七）：在何種程度上蘇聯可以與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合作？這種合作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還是祇不過是一種嘗試用來了解在那一部分可以合作，在那一部分不可以合作？

回答：你們所問的，大致就是在工商業方面及在外交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暫時的妥協。我認爲在兩個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存在之下這種妥協也依舊是可能的。我認爲這種妥協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中是可能的，而且是妥當的。入口與出口就是這種妥協的一種最適當的基礎。我們需要：機器，原料（例如棉花），半製造品（例如五金等等），而資本家則却巧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妥協鞏固的基礎。資本家需要，煤油，木材，糧食品，而我們則却巧要銷售這些貨物。這也同樣是妥協的基礎。我們需要借貸，而資本家也却巧需要豐厚的利息。這也就是在借貸方面的妥協基礎，而且大家都知道，蘇維埃機關於借貸方面是最守信用的。

在外交方面也是這樣，我們所採取的是和平政策，我們願意同資產階級簽訂各不侵犯的公約。我們實施着和平政策，並且願意同資本主義的國家訂立解除武裝——直至消滅常備軍爲止——的條約，在日內瓦會議上我們就已經向世界各國這樣宣佈過。這就是在外交方面的妥協基礎。

這些妥協的限度是什麼呢？這限度是建築在這兩個相互衝突的制度底矛盾上的。這些妥協是僅限於這兩

個制度所許可的範圍內的，祇有在這個範圍內纔可以妥協。我們與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訂約的經驗都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這種妥協是否僅僅是一種嘗試，還是帶有長期性的呢？這不僅要靠我們。同時也要靠我們的對手而決定的。這是要看一般的局勢而決定的。戰爭也許會把一切和約全盤推翻。這同時也必須要看妥協的條件而決定的。奴隸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與採掘格魯士錳鐵的加里曼訂了二十年的合同，這個期限可說是很長的。我們與採掘西伯利亞金礦立那哥爾非特公司也訂了三十年合同——這個期限還更要長些。此外，我們同日本也訂了一個採掘沙哈林煤油礦和煤礦的合同。

我們當然希望這些合同多少能有一種鞏固的性質。可是這當然不僅要靠我們，而且也要靠我們的對手而決定的。

問題(八)：在對於少數民族政策上俄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的區別是什麼呢？

回答：你們所說的大概就是從前被沙皇政府和俄國剝削階級所壓迫而沒有自己的國家的那些俄國境內的民族。主要的區別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存在着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的奴役，而在我們蘇聯，這種壓迫與奴役已經根本地被消滅了。在資本主義國內，除了所謂頭等的，享特權的和『有國家的』的民族之外，還存在着二等，『無國家的』，沒有完全權利的民族。而在我們蘇聯則却巧相反，這種民族的不平等和民族的壓迫原素已消滅得乾乾淨淨。在我們蘇聯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是享有完全的權利的，因為以前那種，俄羅斯民族的特權已經完全消滅了。問題當然不在於民族平等的宣言。民族平等

的宣言，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也都發表得不少了。但如果這種宣言不實行。那還有什麼價值呢？問題全是全在於消滅那些提倡和實施民族壓迫的階級。這種階級就是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我們已推翻了這些階級，同時，也已消滅了民族壓迫是可能性。正因為我們已推翻了這些階級，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民族的平等。這就是民族自決——直至民族自立——的實現。正因為我們實現了民族的自決，我們才能澈底地消滅蘇聯各國民族的勞動群眾之間的互相不信任，才能根據自願的原則把各民族統一成爲一個國家。現在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就是我們民族政策的結果，也就是蘇聯民族自願的聯合成爲一個聯邦國家的表現。這種民族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不用說，是不能夢想的，因為在那些國家內民族壓迫的首創人和實施人——資本家，還握着政權。還有一點也不得不指出的，例如：蘇聯最高機關，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不一定是俄國人，在六個主席（六個共和國）中間只有一個是俄國人（加里甯），一個是烏克蘭人（彼得羅夫斯基）一個是白俄羅斯人（切爾瓦柯夫，一個是阿舍爾巴張人（莫沙伯柯夫），一個是土耳其格曼人（阿依達柯夫），還有一個是烏士伯克人（霍柴也夫）。這件事實就是我們民族政策的一個顯明的表現。不用說，無論那一個最得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都決不會做到這一步的。可是這一步在我們蘇聯却是我們民族平等整個政策中產生出來的一件無須解釋的事實。

問題（九）：美國工人的首領，反對共產黨的理由有兩個：一、共產黨員在工會內部組織黨團，攻擊工會內不急進的領導份子，是破壞工人運動；二、美國的共產黨員受莫斯科的指揮，因此他們就不能成爲職工會的好首領

，因為他們對外國組織比對本國的工會還要忠心得多。這種困難怎樣纔能消滅，怎樣才能使美國的共產黨員能與美國工人運動的其他組織共同地工作呢？

回答：我以爲美國工人首領們攻擊共產黨員的這種理由是很容易駁倒的。過去和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證明共產黨員破壞了工人運動。可是共產黨員是全世界工人運動的（美國的工人運動也包含在內）最忠誠最勇敢的戰士，却已完完全全地被証明了。在每次工人罷工和示威遊行的時候共產黨員總是站在工人階級的前列，首先受資本家的摧殘，而那些改良主義的首領們在這時候却只會藏躲在資本家的屋後不敢伸出頭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共產黨員怎樣能不批評這改良主義工人領袖的懦怯性和反動性呢？這種批評只能活躍和鞏固工人運動，難道這還不明顯麼？不錯，這種批評確實是破壞反動的工人領袖底威信的。但是這又有什麼奇怪呢？反動的工人領袖們有本事也可以用反批評來回答共產黨員，又何必把共產黨工潮首腦中驅逐出去。我以爲，美國的工人運動如果要發展下去，職工會內部的意見的衝突和派別的鬭爭是必不可免的。我想，不管改良派的工會領袖們怎樣的反抗，美國職工會內部的意見的衝突，派別的鬥爭，及對反動的改良主義首領們底批評還是必然要一天天地增長起來的。

美國的工人階級絕對需要這一種鬭爭和批評，爲的是要使它能夠從各派之間去辨別好壞，去自己決定他們的方針，而成爲美國社會內部一個獨立的有組織的力量。美國改良主義的首領對共產黨員的怨言就是證明他們自己也明知自己的無理，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地位的不穩固，因此他們才像懼怕瘟疫那樣地懼怕人家的批評。美國改良主義的首領們比美國許多資本家還要堅決地反對最初步的德謨克拉

西。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樁事。

說美國的共產黨員完全遵照『莫斯科的命令』而行事，是一種很不正確的說法。你們在世界上決不出這樣的共黨黨員，就是：願意違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志，不顧客觀的環境，只遵照着外來的命令而行事的共產黨員。這樣的共產黨即使在世界上是有的，也是一個都不值的。共產黨員是最英勇最有胆量的人，他們是在與強大的敵人的淵海戰鬪着。共產黨的價值就在於他們能堅持他們的主張。因此，如果說美國共產黨員是沒有自己的主張只能遵照外來的命令而行事的人，是很奇怪的。在美國改良主義攻擊共產黨的話中只有一句話是對的，就是：美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組織中的一分子。而且常常與這個組織中央討論各種問題。但是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難道美國工人的首領們反對組織國際工人的中央麼？不錯，他們並沒有加入阿姆斯特丹的黃色國際。但他們之所以不加入黃色國際，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工人的國際組織，而是因為他們覺得黃色國際太左了（笑聲）。為什麼資本家可以有國際的組織，而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倒不應當有國際的組織呢？難道還不明白美國勞動合聯會的首領格林及其狗黨侮罵共產黨，說美國共產黨員只會聽『莫斯科的命令』，完全是卑鄙的從資本家口中抄襲來的麼？有些人以為共產國際的委員們只坐在莫斯科一天到晚給各國共產黨寫指令。加入共產國際的共有六十多個國家，如果照他們這樣講來，那末共產國際的委員們一天到晚就祇好不吃不睡的給各國寫指令了（笑聲）。美國的改良派的首領就想用這種可笑的謠言來掩蔽他們對共產黨員的恐懼，而且想抹煞共產黨員是美國工人階級最勇敢最忠心的戰士這件事實。

代表們問我這種情形的出路怎樣。我認爲出路只有一個：允許工會內部的意見和派別鬥爭，打倒把共產黨員從工會中驅逐出去的反動政策，給美國的工人階級以自由的在這些派別中間選擇的可能，因爲在美國還未曾經過它的十月革命，那裏的工人還沒有在職工會的各派中間作過一次最後的選擇。

問題（十）：現在是否有錢寄到美國幫助美國的共產黨或共產黨黨報工人日報？如果沒有，那麼美國共產黨每年繳給第三國際的黨費是多少？

回答：如果所問的是美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相互關係，那麼我就要告訴你們 美國共產黨既是第三國際的一部分，當然應當向第三國際繳納會費，同時第三國際既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在必要的時候，當然也要盡力的幫助美國共產黨。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如果你們所問的是美國共產黨和聯共的相互關係 那麼我就要向你們申明：美國共產黨的代表從來沒有要求過聯共的帮助。你們也許以爲這是很奇怪的，可是這個事實指明美國共產黨員太講情面了。但如果美國共產黨一旦要求聯共帮助的時候怎樣呢？我想，聯共就要盡量的帮助它。如果一個握有政權的共產黨拒絕幫助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壓制之下的共產黨，還有什麼價值呢？我覺得這種共產黨就簡直是一錢不值了。假定美國工人階級已在反對資產階級的偉大門爭中獲取了政權；假定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要求勝利了的美國工人階級予以量力的物質上底帮助的時候——美國工人階級能否拒絕這種帮助呢？我想，美國工人階級如果對於這種帮助，還要猶疑不決，那簡直就是它自己的恥辱。

問題（十一）：我們知道，有些好的共產黨員因爲

反動的僧侶現在已被鎮壓下去，所以不完全同意共產黨要一切黨員變為無神論者的要求。將來共產黨對於幫助一切科學的而不反對共產主義的宗教可否取中立的態度？假若宗教的信仰不與黨的行動相衝突的時候，那末你將來可否准許黨員堅持這種宗教的信仰呢？

回答：在這個問題中有些不大確當的地方。第一，我不知道有代表們所說的那種『好的共產黨員』。一般的說來，這樣的共產黨員在世界上恐怕是很難找得到的。第二，我應當向你們申明，在形式上，我們接收黨員時並沒有這樣一個條件：黨員必須是無神論者。我們入黨條件是：承認黨綱和黨章，絕對服從黨及其機關的決議，繳納黨費，加入一個黨的組織。

有一個代表說：我常常在報章上看到因相信上帝而開除黨籍的事。

斯達林回答：我只能重述上述的入黨條件，除此之外，就再沒有別的條件了。

但這是否是表示黨對宗教取中立的態度呢？不，決不是的。我們現在正作着宣傳，並且將來還要作宣傳反對宗教的迷信。按照我們國家的立法，每個公民都有信教權。這是各人的自由。更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把教堂與國家分立起來。我們一方面實現教堂與國家的分立和每個公民的信教自由，但我們另一方面則保障每個公民用各種說服和宣傳的方法反對任何宗教的權利。共產黨對於宗教決不能取中立的態度，它必須進行反宗教的宣傳，攻擊一切宗教的迷信，因為共產黨是擁護科學的，而宗教却是反對科學的，因為一切宗教都是違反科學的，像美國不久以前懲辦達爾文主義者的事，在我們國家裏是決不會發生的，因為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儘量擁護科學的政

策。共產黨對於宗教決不能取中立的態度，它必須作反宗教的宣傳，因為這是澈底剷除擁護剝削階級的僧侶的反動勞力底一個很妥當的方法。共產黨對於傳播宗教的迷信，蒙蔽勞動群眾意識的僧侶也決不能取中立的態度。

我們是否已把僧侶鎮壓下去了呢？是的，已經鎮壓下去了。現在的問題。就在於他們還未完全消滅。反宗教的宣傳就是澈底消滅僧侶的一種方法。有的黨員要阻止反宗教宣傳的事偶然是也有的。開除這種黨員的黨籍是很對的，因為對於這樣的『共產黨員』在他們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

問題（十二）：你可否把共產主義所要創造的未來的社會簡單的描寫一下？

回答：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的描寫在馬克斯，恩格斯及列寧的著作中都可找到。如果你們要我將共產主義社會簡單的敘述一下，那就是這樣：一、沒有任何私有財產，一切工具與生產資料均歸公有；二、沒有階級，也沒有國家政權，全人類都是工農業的勞動者，經濟上的管理者完全是勞動者的自由組合；三、有計劃的國民經濟都是建築在工農業之最高技術底基礎上的；四、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的一切矛盾均已完全消滅；五、一切物品均按照法國老共產黨員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分配；六、科學和藝術將利用優越條件來達到它們的完滿的發展；七、人們可以不必顧慮自身的衣食而屈服於『強有力的自然界』，他們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當然，我們離這樣的社會，還遠得很哩！

完全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國際條件是隨着革命危機與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革命運之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我們決不能這樣着想——以為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無產

階級能走向社會主義，甚至走向共產主義，而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肯高枕無憂地袖手旁觀。同樣我們也更不能這樣着想，——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肯袖手旁觀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之勝利的發展。實際上，決不會有這樣的事實的，資本國家一定想用盡各種方法去消滅這種國家。在無論那個國家內，走向社會主義的特別是向共產主義的每一步那必然要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為達到專政和社會主義而猛烈的鬭爭。因此，在將來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形成兩個世界的中心：社會主義的中心（四周圍環繞着一切向社會主義進行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的中心（周圍環繞着一切向資本主義進行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的爭奪世界經濟底鬥爭要決定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命運。因為世界資本主義之最終的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

二 同志的問題和代表們的答覆

斯大林：如果代表們還不十分疲倦，我也有幾個問題要請教你們，不知可否？（代表們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美國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工人是百分數，佔的很小，是什麼緣故？我記得美國差不多有一千七百萬產業工人（代表們更正道：美國共有一千八百萬到一千九百萬的產業工人）。有組織的大概只有三百萬工人。（代表們更正道：美國勞動聯合會共有三百萬組織的工人，但除此之外，還有組織其他工會中的五十萬工人，總計起來，美國共有三百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我個人以為，組織在聯合會中的工人所佔的百分數是很小的。在我們蘇聯，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工人佔全國工人的百分之九十。我現在要請教代表們的問題就是：代表們是否認為

美國有組織工人的百分數比較很少的這種現象是好的現象？代表們是否以為這種現象就是表示美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薄弱，表示他們與資本家作經濟鬥爭的工具之薄弱？

勃羅費（代表）：職工會會員人數很少的現象並不是由於職工會的策畧不好，而是因為美國一般的經濟條件不能推動全體工人群眾組織起來，而且這種優越的經濟條件，減少了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鬥爭的必要。這種條件當然是要變遷的，職工會隨着這種變遷也必要發展起來，使整個職工運動走上新的道路。

杜格拉斯（代表）：我完全同意前面說話人的解釋，不過我有下列幾點補充；第一，我們也必須顧計到這一點，就是：美國的資本家近來自己把工資提得很高。

這種提高工資的過程，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開始，在一九一九年和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他會有這種現象。現在的實際工資與一九一一年的實際工資比較起來要高得多。職工運動在它時發展過程中，從開始到現在都是按照行會的原則（按照職業性質）而組織的，而且職工會也只是為熟練工人而建立的。這種工會都有一些領袖在領導着，他們主張閉塞的組織，只替自己的會員獲得一些優良的生活條件就完了。沒有一種推動力使他們擴大他們工會的範圍，去組織不熟練的工人，除此之外，美國的職工運動也必須顧到組織很好的美國的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家握有一切力量，足能阻止全體工人加入職工會。例如，有一個托辣斯化的產業在它的一個企業中遇到了職工會極有力的反抗時，它就甚至把這個企業關閉起來，把工作移到其他的（也是它自己的）企業中去。這樣，職工會的反抗就被壓制下去。美國的資本家自動提高工資。但絲毫經濟的權力也不給工人，使工人不能為改良他們的物質生活

而鬥爭。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本家在製造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間的仇恨。大部分不熟練的工人都是從歐洲來的工人，或者是近東的黑人。資本家盡量地在製造不同的民族的工人之間的仇恨。這種民族的劃分，却在熟練的與不熟練的工人中也實行着。資本家不顧工人的熟練程度，有系統地在製造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間的衝突。

美國資本家在近十年來採取了一種更文明的政策，他們已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所謂公司聯合會。他們吸收工人到他們自己的企業中去做工，使工人參加企業的利潤等等。

美國的資本家還有從縱的劃分代替橫的劃分之趨勢，就是，離開工人，吸收工人，使工人關心資本主義的利益。

哥依爾（代表）：我不從理論上而只從實際上來講幾句話。不錯，我們最好趁好的時機把工人組織起來，但根據美國勞動聯合會會員的統計，美國勞動聯合會中不熟練的工人日漸減少，而熟練工人的成份却日增加。這樣看來，可知美國的勞動聯合會祇想成爲而實際上也已漸漸成爲熟練工人的組織。美國的職工運動差不多完全沒有吸收不熟練的工人。工會沒有影響到大的工業部門。在這些大的工業部門中只有一部分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稍微有一點組織，但沒有組織的煤礦工人還有百分之六十五。鋼鐵工業，橡皮工業，汽車工業的工人差不多還完全沒有工會的組織。我們可以說，不熟練工人都還沒有吸收到職工會中去。只有一些勞動聯合會之外的工會，是在設法組織不熟練和半熟練的工人。至於說到美國勞動聯合會首領們對這問題的態度，則從下面的事實中即可有得出來；有一位首領，五金工會的會長竟公開地申明他不願意把不熟練的工人吸收在他的工會內。職工會領袖的地位就是這樣；他們（大概有幾十個人）自己造成了一

種領袖等級，拿着豐厚薪水——一萬元以上的年俸——別人要擠到這個等級中去是非常困難的。

杜思（代表）：新達林同志所提出的問題，我認爲是不公道的，因爲在他們的國家內，政權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所以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工人能佔全數的百分之九十，而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工人完全是被壓迫的階級，資產階級在用一切方法阻止工人加入工會。此外，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還有反動的工會和反動的工會領袖。在美國這種客觀的條件之下很難把組織工會的思想傳佈到工人的頭腦中去。這就是美國職工會不發達的原因。

斯大林：你同意不同意前面一個代表所說理話，認爲美國有些工人運動的領袖自己要縮小工人運動的範圍？

杜思：我同意的。

斯大林：我不願意得罪什麼人。我只是想明白美國與蘇聯的情形之區別。如果我無意地得罪了什麼人就請他原諒。（代表們笑起來）。

杜思：你並沒有得罪我。

斯大林：在美國有沒有工人的國家保險制？

哥依爾：在大多數省分內，對生產中遭遇不幸事故

代表之一：美國沒有這種制度。

的工人，有一種賠償費，但至多只賠償百分之三十的損失。在大多數省分中都有這一種制度。賠償費是由發生不幸事故的企業負擔的，國家只規定了這一種法律。

斯大林：美國有沒有國家的失業保險制？

代表之一：沒有。保險失業的基金至多只能撫恤全國八萬到十萬的失業工人。

哥依爾：在生產中遭遇不幸事故的工人，是有一種保險費的（不是國家的）。但因疾病或衰老而殘廢的工人

是毫無保險的。保險的基金是由工人的會費組成的。實際上這種保險完全是工人自己出的，工人如果不湊集這筆基金，就可以多得到這點工資，因為這筆基金是工人和企業之間協定的，所以全部基金差不多都是從工人的工資中扣下來的。實際上企業主所出的保險費只佔全部基金的百分之十。

斯大林：我如果告訴你們：我們蘇聯國家每年出的工人保險費達八萬萬盧布以上，我想你們一定會覺得是很有興趣的。同時我也可附帶地告訴你們，我們一切工業部門的工人除了正式的工資之外，還可以得到約佔工資三分之一補充費，作為保險，改良生活，滿足文化需要等等的費用。

第二個問題：在美國為什麼沒有專門的群眾的工黨
美國的資產階級共有兩個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但美國的工人倒反沒有它的群眾的政黨。代表們是否認為沒有群眾的工黨（甚至於就像英國的工黨），足能削弱工人階級在其與資本家作政治鬥爭中的力量呢？為什麼美國職工運動的領袖（例如格林）等，堅決反對在美國組織工黨呢？

勃羅費：是的，領袖們曾經發過這種議論，說美國沒有建立工黨的必要。不過一小部分人也認為組織這種政黨是必要的。現在美國客觀的條件是如此：我們已經說過職工運動非常薄弱，其原因就在資本家自動地提高工人的工資，保證他們滿足的物質生活，所以現在工人階級還沒有感覺到組織起來與資本家鬥爭的必要。

斯大林：但生活有保證的，主要的是熟練工人。這裏就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說，工人沒有感覺到組織的必要，因為工人的生活已有保證；另一方面又說，組織在職

工會中的。就是那些生活最有擔保的熟練工人；同時又說沒有組織在工會中的，正就是那些生活最沒有擔保的不熟練的最需要組織的工人。這一點簡直使我莫明其妙。

勃羅費：是的，那裏確實有一點矛盾，但美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實際情形也是這樣矛盾的。

勃來布內爾：不熟練的工人誰沒有組織在工會裏，但他們是有政治表決權的。所以這些不熟的工人如果感覺到不滿意的時候，他們就可利用他們這種政治表決權，表示他們的不滿意。另一方面，組織在工會中的工人如果遇到特別困苦的事情時，他們所可以利用的，不是工會，而是他們的政治表決權。因此，政治表決權就可填補職工組織的缺乏。

依寺拉愛斯：主要的困難之一，正就是美國這種選舉制度。美國在選舉大總統的時候，當選的並不是全國票數得的最多的那個人（？）美國每個省分內都有一個選舉團，每省都有一定的數量的參加選舉大總統的投票人。必需要存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票數的人才能當選為大總統。因此如果有三個政黨的時候，就弄得誰也不能當選，選舉就只好移交到大會上去解決。就是反對組織第三個政黨的理由。反對組織第三個政黨的理由就是：如果提出第三個候選人的名單來，那麼就要分散自由黨的票數，使自由黨的候補人不能當選。

斯大林：可是上議員拉福來曾經建立了第三個資產階級的政黨。照這樣的看來，似乎資產階級的第三黨，是不會分散選舉票的，只有無產階級的第三黨才會分散選舉票。

台維斯：我認為前面一位代表所講的話不是有根據的事實。我認為主要的事實是下列這種事實。我現在就

拿我所居住的那個城市爲例。在舉行選舉的時候，某個政黨的代表，派職工會領袖去擔任一種重要的職務，再給職工會的領袖一筆經費叫這位領袖去運動，使他當選，經過這種運動之後，他就因此而得到相當的威信。這樣，職工運動的首領自己就成了某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擁護人。因此，當談到組織第三個政黨——工黨——的時候，這些職工運動的領袖們總是設法阻止。他們的理由是：如果組織第三個政黨，職工會就要分裂。

杜格拉斯：組織各職工會中的純粹是熟練的工人，其原因是這樣的，因爲職工會必須有一筆基金和保證金，因此會費就很大，不熟練的工人，拿不出這樣貴的入會費，所以就只好不加入。此外，不熟練的工人是處在經常的威嚇之下的。如果他想加入工會，廠主就馬上會把他開除出去。祇有熟練工人努力幫助之下才能把不熟練的工人組織起來。可是他們多半都沒有這樣的幫助。這就是

使不熟練的工人不能組織在工會內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工人群衆所擁護的主要的權利是政治上的權利。我認爲沒有不熟練工人的組織底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認爲不熟練工人之所以沒有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是：在於經濟基礎方面。美國選舉制的一個特點就是：它是直接的選舉制，無論那一個人都可以跑到選舉大會上去。宣佈自己是民主派或共和派而投起票來。我深信，岡背斯如果沒有贊成直接選舉的這個論據，他也就不能將工人堅持在非政治的綱領上。他常常對工人說：如果他們想作政治的活動，他們就可以加入現在兩個政黨中之任何一個政黨，在那裏取得相當的職務和威信。岡背斯就在這一種論調之下阻止住了工人們要組織工人階級和建立工黨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爲什麼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們在承

認蘇聯這個問題上所抱的態度比許多資產階級還要反動些？何以像包拉那樣的資產階級尚且主張承認蘇聯，而美國工人運動的首領，如像岡背斯以及格林這班人，倒反自始至終地進行其反動的宣傳，反對承認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反對承認蘇聯呢？甚至像美國舊任的大總統威爾遜那樣反動的人尚且在表面上「慶祝」蘇維埃俄羅斯的成立，爲什麼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如格林這一流人物，倒反而比資本家還更其反動呢？下面就是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軍隊進攻蘇維埃的列寧格勒的時候，致俄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一篇「慶祝辭」：

「我代表美國的人民，趁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機會。在德國的軍隊深入國內企圖阻礙爲自由而鬥爭，消滅它的一切勝利，實現德國的野心和壓制俄國人民的當兒，向俄羅斯人民表示誠懇的同情。美國政府雖然心有餘而力不足，在現在不能如願地給俄羅斯人民直接的援助，但我希望代表大會能轉達俄羅斯的人民：我們總要儘可能地保障俄羅斯內務上的完全的威信與完全的獨立。完全的恢復俄羅斯在歐洲和現代全人類的生活中所起的偉大底作用。美國人民竭誠的對企圖永遠從專制之下解放出來的，自己主宰自己命運的俄國人民，表示充分的同情。」

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首領。要想比反動的威爾遜還更反動些，是否是一種常態的現象呢？

勒羅費：我不能確當地解釋它的原因，但我認爲，美國的勞動聯合會既不加入阿姆斯特丹黃色國際，因此勞動聯合會的領袖也就根據這個原因主張不承認蘇聯。區別就在於美國工人與歐洲工人之間的哲學上的與經濟上的不

同。

斯大林：但我知道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首領并不反對承認法西斯統治着的意大利和波蘭。

勃羅費：你既然指出了法西斯統治着的波蘭和意大利的例子，你也可以明白美國不承認蘇聯的原因了。美國職工運動的首領之所以不願承認蘇聯，也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本國的共產黨發生了惡感的緣故。

杜思：這位同志所解釋的這個原因——因為他們與本國的共產黨員感情不好，所以他們也就不能承認蘇聯，——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因為他們關於不承認蘇聯的宣傳在美國共產黨未組織前已經在進行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們對於凡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都是反對的。正因為這一點，資本家便和他們籠絡起來，資本家有一個組織叫做「國民聯合會」，它正在努力用一切方法籠絡美國的一切團體去反對任何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這個組織會竭力的反對阿依維里的主張（主張發展美國與蘇聯的通商關係）。這個組織的首領曾經說過：自由黨人也竟開始這樣主張起來，叫我們還怎樣能維持我們工人階級中的秩序呢！「國民聯合會」是一部分資本家的組織，這部分資本家拿出了大筆款子投在這個組織中，這個組織的領導權也是操在他掌握中的還有一點必須指出來的，就是：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副主席瑪契哈爾兼任着這動反動的國民聯合的副會長。

勃羅費：這裏所說的關於職工會領袖的反動性底那些原因并不是主要的原因；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更深一層地來考察它。美國代表之來俄，就是美國一部分工人同情於蘇聯的一個最好的表示和證明。我認為勞動聯合會領袖們對於蘇聯的意見與美國大多數工人的意見沒有區別的

○ 美國工人階級對於蘇聯的這種不好的態度完全是由於蘇聯隔離太遠的緣故。美國的工人階級不喜歡顧問一切國際的大事，在對蘇聯之關係的這個問題上已大可以表示出資產階級對於美國工人階級的影響了。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號——

法國，德國，奧國，捷克斯拉夫，南美洲，中國，比國，芬蘭，丹麥及愛斯多尼亞各國派來的代表共八十人。談話繼續了六小時之久。

斯達林：同志們，昨天接到一張無名的德文的條子，上面寫着許多問題問我。今天早上我又接兩張發問題的條子，一張是法國代表寫的，一張是丹麥代表寫的。現在我首先來答復第一個條子上的問題，雖然我還不知道這些問題究竟是誰發的。答復了這些問題之後，然後再來答復後兩個條子上的問題。如果你們不反對，我就來開始答復（代表們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爲什麼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

回答：關於蘇聯不參加國際聯盟的原因，在我們的報章上已講過多次。我現在可以把其中幾個主要的原因說一說。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不參加國際聯盟會議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爲蘇聯不願意替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政策負責，替國際聯盟所發給的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國家的『委任狀』負責。蘇聯之所以不加入國際聯盟，就因爲他極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政策。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爲他不意願替國際聯盟所進行的軍事準備，增加武裝，組織新的軍事聯盟等等勾當負責，因爲這種勾當必然要引起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蘇聯之所以不參加國際聯盟，就是因爲他極端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蘇聯不加入國際聯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爲他不

願意成爲國際聯盟這一種帝國主義強盜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國際聯盟却以其會員的假話遮掩這種事實）。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後台老板的「幽會所」用以掩閉他們的勾當。國際聯盟官冕堂皇地所講的那些話，都是用來欺騙工人的空話。帝國主義後台老板們在暗中偷偷地幹的那些勾當，纔是帝國主義的正經事業，這種勾當都是由國際聯盟的演說家們用巧妙的漂亮的言辭掩飾着的。這樣，蘇聯不願參加這反對民衆的趣劇，又有什麼奇怪呢？

第三個問題：爲什麼蘇聯不能容納社會民主黨？

回答：蘇聯之所以不能容納社會民主黨：即孟塞維克），就是因爲在蘇聯內不能容納反革命的人。這也許會使他們覺得奇怪，但實際上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我們國家發展的條件，和發展的歷史是這樣的：社會民主黨在沙皇時代是一個比較革命的政黨，沙皇政府推翻之後，克倫斯基政府的時代，他就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在朝黨，一個主張帝國主義戰爭的政黨，及至十月革命之後，他就完全變成了一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反革命的政黨。你們要知道，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完全是站在高察克和但尼金方面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現在這個政黨完全是一個企圖恢復資本主義，撲滅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我認爲社會民主黨的這一種蛻變不僅是俄國所特有底現象，而且也是各國所共有的現象。在沙皇時代，俄國社會民主黨總還算是一個比較革命的政黨。因此，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那時候還同孟塞維克（即社會民主黨人）共處在一個政黨裏面。當所謂民主的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就成了資產階級的在朝黨。一到革命的無產階級握取了政權時候，社會民主黨就變成了公開的反

革命的政黨。

有一個代表問：社會民主黨是不是只有在蘇聯是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在其他的國家他是否也是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呢？

斯達林：我已經說過，這裏是有一點區別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社會民主黨是企圖以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名義恢復資本主義和消滅無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反革命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社會民主黨有的是一種反對資本家政權底在野黨，有的是一種與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向極端反動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的工人運動雙方進攻的政黨，有的是自始至終公開擁護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底一種政黨。社會民主黨只有在無產階級真正得到政權之後，才完完全全成爲反革命的政黨，那時候他必然要用他一切反革命的手段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政權。

第三個問題：爲什在蘇聯沒有出版自由？

回答：你們所說的究竟是那一種出版自由呢？是那一個階級的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如果說的是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的專政之下，是沒有的，而且將來也不會有的。如果說的是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那我就要告訴你們：你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找不到像我們蘇聯那樣普遍的廣大的無產階級底出版自由。無產階級出版自由並不是一句空話，沒有好的印刷所，好的報館，沒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包含着數百萬工人羣衆底公開的組織，沒有普遍的集會自由——也是不會有什麼出版自由的。你們看一看蘇聯的生活條件，考察一下工

人區域，你們就可知道，最好的印刷所，報館，一切造紙工廠和印刷所必需的顏料工廠，莊嚴的宏大的會場——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所必需的這一切東西，都完完全全地操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底掌握中。這就是我們蘇聯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我們這裏沒有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我們不代表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利益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出版自由，但這有什麼奇怪呢？我們絕對沒有必要給各階級以出版自由，使各階級都得到幸福的這一種義務。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就公開地說過：這個政權是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他將爲着蘇聯大多數人民——城市與鄉村的勞動羣衆——底利益去鎮壓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可以向無產階級的專政要求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呢？

第四個問題：爲什麼不把監禁着的孟塞維克釋放出來？

回答：你們所說的大概是那些積極的孟塞維克。是的，那些積極的孟塞維克在監禁期限未滿之前是不釋放出來的。但這又有什麼奇怪呢？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的時候，當少數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掌握政權的時候，爲什麼不把布爾塞維克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呢？

爲什麼列甯在七月至十月——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握政的時候，不得不秘密地隱避起來呢？爲什麼全世界無產階級心目中的偉大的旗幟——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間不得不亡命於芬蘭，遠避克倫斯基和采萊推里，切爾諾夫和唐的「民主共和國」呢？爲什麼列甯的機關報——真理報，在第二國際著名的健將們底統治之下，還會被資產階級的軍官所毀壞呢？這就是因爲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與革命的無產階級間的鬥爭中不得不採取一種

壓制手段。我已經說過，在我們蘇聯，社會民主黨已完全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因此革命的無產階級也不得不拘捕這個反革命政黨的活動分子。

但這樣說來還不充分。從上面的話中我們還得出這樣的推論：我們拘捕孟塞維克就是十月革命政策底繼續。但十月革命究竟是什麼呢？十月革命，第一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現在各國比較覺悟的工人已都承認，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對的。我們相信你們的意見一定也是這樣。但現在有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究竟推翻了什麼人？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候所推翻的正就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因為那時候完全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切爾諾夫，哥刺，里伯爾，唐，采萊推里，阿勃浪麻維契，阿島克仙契甫等人——撐握着政權。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什麼政黨呢？他們是第二國際的政黨。

因此，蘇聯無產階級的推翻了第二國際的政黨，才完成了十月革命。也許，這對於有些社會民黨人，是很不樂意的，但是，同志們，這是毫無疑意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由此可見，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推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權，只有這個才能使政權落到自己的手中。既然可以推翻他們，那麼，當他們已公開跑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營壘中去的時候，為什麼就不能拘捕他們呢？你們是不是以為推翻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手段比拘捕還要輕一些呢？如果不承認十月革命黨政策所必然產生出來的結果是正確的，那麼也

就不能承認十月革命的政策是正確的。兩者之中必取其一：或是承認十月革命是錯誤的——那麼拘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是錯誤的；或者承認十月革命是正確的，——那麼拘捕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也是不能認為錯誤的。這是邏輯上的法則。

第五個問題：爲什麼不允許社會民主黨報紙辦公處的新聞記者到蘇聯來？

回答：因爲外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尤其是前進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報——譯者）比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還更起勁地侮蔑蘇聯和蘇聯的代表。因爲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例如『Aossische Zeitung』攻擊蘇聯的時候，還西比前進報（Zorwärts）『客觀一點』，『有禮貌一點』。這看來也許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前進報的行爲不比有些資產階級的報紙壞，那他的代表也就可以像其他資產階級報紙的代表那樣有資格到蘇聯來。最近前進報曾經向蘇聯駐柏林的一個外交代表提出條件，請求准許前進報的訪員到蘇聯來。我們的外交代表就回答他道：『如果前進報，在實際上證明是對蘇聯和蘇聯代表的態度不再比『有禮貌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如像 Vosische Zeitung 這一類報紙——還更壞，那蘇聯政府也就決不反對前進報的訪員到蘇聯來』。

我想，這個答覆已經很明白了。

第六個問題：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有否合併底可能呢？

回答：我想是不可能的。因爲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主張和立場完全是不同的。

第三國際的主張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

政，而第二國際的主張却巧相反，他主張保持資本主義及破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的一切東西。這兩個國際之間的鬥爭是資本主義擁護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鬥爭的思想上的反映。在這個鬥爭中，不是第二國際戰勝第三國際，便是第三國際戰勝第二國際，他們兩者是勢不兩立的。

當然，我們毫無疑義地可以斷定工人運動中的勝利必定是歸於第三國際的。我認爲他們底合併是不可能的。

第七個問題：怎樣估計西歐的情形？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會發生革命的事變？

回答：我認爲歐洲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底成分已在增長而且將來還是要增長的。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可以使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加緊壓迫工人階級——這一切尙當資本主義現在還都可以做，但是他已經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前的那一種『穩定』『平衡』狀態了。這一種『穩定』和『平衡』他已再也不能恢復了。現在西歐各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活命的東西——殖民地，已都紛紛地爆發了革命底火燄，就以這一點而論就可知道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平衡已再沒有恢復的希望了。今天奧國爆發了革命的火燄；明天英國爆發了革命火燄，後天法國或德國又爆發了革命火燄，後來，中國，馬來群島，和印度等也就都爆發革命起來了。歐洲和殖民地是什麼東西呢？這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和四週。歐洲資本主義中心已經『不安靜』起來。在他的四週還更其『不安靜』。新的革命事變底條件已經成熟起來。我認爲日益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危機之最明顯的表誌，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憤激的情緒日益緊張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薩柯和王米契（Gako and Pahuctn）的事件。殺死兩個工人在資產階級的屠夫們看來算什麼一回事呢？難道他們不是每天每

星期都要屠殺許許多多工人麼？可是屠殺薩柯和王采契這兩個工人，却引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這樣巨大的風波。

這證明什麼呢？這就是證明資本主義腳底下的地基已經一天比一天不穩固了。這就是證明，新的革命事變的條件已經成熟起來了。資本家也許還可以把第一個革命底浪潮趕回海岸去，但這件事情決不能安慰資本主義。

反對資本主義底革命不是一個總的浪潮可以成功的。

他是從時起時伏的不平衡的浪潮中發展起來的。俄國曾經是這樣。歐洲也必將是這樣。我們現在正站在新的革命事變之前。

第八個問題：反對派在俄國黨內的勢力強不強？他們所依靠的是何種階層？

回答：我認爲，反對派的勢力是很薄弱的。它在我們黨內的力量是非常之小的。我拿在手上的就是今天的報紙。在這份報上把幾天以來的討論作了一個總結。數目字告訴我們，舉手贊成中央和中央提綱的黨員有十三萬五千人，而贊成反對派的黨員却只有一千二百人，還不到百分之一。我想，在以後的表決中反對派所得到的票數定還要少。我們的討論要繼續到代表大會開幕爲止。

我們在這一個時期內要儘可能地徵求我們全體黨員的意見。我不知道在你們社會民主黨裏是怎樣進行討論的。

我不知道你們社會民主黨中有沒有這種討論。我們對於討論是看得很嚴重的。我們要徵求全黨的意見，結果你們一定可以看到，反對派的比重將比上述的數目還要小得多。也許在我們黨的十五次大會上反對派的代表一個也沒有都說不定。我們且拿列甯格勒的『Putilov and Trengolnik』這兩個大企業來看。『Trengolnik』共有一萬五千工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二十二個黨員。舉手贊

成反對派的只有三十九人。『Putilov』約有一萬一千工人。其中有一千七百十八個黨員。舉手贊成反對派的只有二十九人。

反對派所依靠的是那種社會階層呢？我認爲反對派所依靠的主要的是非無產階級底階層。如果問一問那些不滿意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非無產階級的人民；他們同情那一方面？那他們就一定毫不猶疑的回答你說，他們是同情反對派的。爲什麼呢？因爲反對派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反黨的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能不使一部分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不滿意——的鬥爭。反對派就是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不滿意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反映。

第九個問題：魯脫費舍爾(Rut Fisher)和馬斯洛夫在德國宣傳說：現在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將工人出賣給反革命，這種說法是不是對的呢？

回答：我想大概是對的罷！共產國際和聯共現在正在準備把蘇聯工人階級全部出賣給全世界的反革命。除此之外，我還可以告訴你們，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已決定在這幾天內迎請一切驅逐出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回蘇聯來，把工廠土地都歸還他們。這還不夠。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更決定，布爾塞維克此後要改用人肉充當糧食。最後我們已經通過一個決議，決定把一切女人都充公，要實行姦淫自己的親姐妹（全場哄笑）。（有一個人問：誰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你們也都笑起來了。也許在你們中間有人會以爲我答覆問題太不正經。但是，同志們，這樣的問題不能正正經經地回答他的。我認爲對於這問題只能以一笑答之。（大鼓掌）

第十個問題：你對於反對派及德國魯脫費舍爾和馬斯洛夫

的態度如何？

回答：我對於反對派及其德國的黨徒底態度同法國著名的小說家陀台對於達拉斯康的達爾達林（Tstaxem）一樣的（此時代表中現出一種怡愉精神）。你們大概都讀過陀台創作的一部著名的小說，書名叫作達拉斯康的達爾達林。這部小說的主人翁達爾達林，是一個平常的『仁慈的』小有產者。可是他有非常發達的幻想和說謊的天才。他向人家吹牛，說他曾經在阿脫拉斯山殺死過不計其數的獅子和老虎。容易上當的朋友們便頌揚他是世界第一的獵人。可是陀台和達爾達林都知道達爾達林從沒有見過什麼獅子和老虎。達爾達林又向人家吹牛，說他曾經登過蒙勃蘭（Mondlan）高山。他的容易上當的朋友們於是便稱他是世界第一的爬山家。可是陀台明知道達爾達林從來沒有看到過蒙勃蘭山，因為他僅僅只到過蒙勃蘭山的山脚。達爾達林又告訴人家說他曾經在離法國很遠的一個地方建下了一個偉大的殖民地，他的朋友們於是又稱他為世界第一的殖民家。可是陀台明明知道——達爾達林自己也承認——在這幻想中除了狼狽之外是再也得不到什麼旁的東西的。

你們知道，達爾達林這種吹牛的行爲必然會使自己陷入怎樣狼狽的糟糕的情形中。

我想，反對派的首領們在莫斯科和柏林所吹的牛皮也必然會使反對派陷入這一種狼狽的糟糕的局勢中（全場哄笑）。第一張條子上所發的問題已經答覆完了。現在來答覆法國代表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蘇聯政府想用甚麼方法與外國的煤油公司鬥爭？

回答：我覺得這個問題根本問得不對。在這一種

問題之下，就似乎蘇聯煤油工業已準備向外國的煤油公司進攻，企圖把它們消滅。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決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情形是這樣的；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公司努力的想消滅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而我們蘇聯的煤油工業爲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繼續發展起見，就不得不採取防禦的手段。蘇聯的煤油工業，無論在生產額方面（我們出產的煤油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些），或在市場的聯繫方面（他們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比我們密切得多）。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工業要薄弱得多。蘇聯的煤油工業用甚麼方法來防禦呢？他的防禦的方法，第一就是改善煤油的質量，第二降低煤油的價格，使我們的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的時候，比資本主義國家的煤油還要便宜些，有人一定要問：難道蘇維埃國家竟這樣富裕，能比最富強的資本主義企業還更能便宜些把煤油出賣到市場上去麼？當然，蘇聯的工業不比資本主義企業富強。而且資本主義的企業還多富強於蘇聯的工業，但這原因並不是在於富強。這原因是由於蘇聯的煤油工業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所以他不需要猛烈地榨取額外利潤；可是資本主義的煤油企業都是非榨取大量的額外利潤不可的。

正因爲蘇聯的煤油工業不需要額外利潤，所以他可以把他的貨物比資本主義的企業的貨物更賤價地出賣到市場上去。蘇聯的糧食，蘇聯的木材等等也都是這樣。一般的說來，蘇聯的貨物，特別是煤油，在世界市場上是減低價格減輕購買人之經濟情形底原動力。這就是蘇聯的煤油業防禦資本主義國家蘇聯企業進底方法與力量。世界各國的煤油大王，特別是台脫亭狂暴地反對蘇聯和蘇聯的煤油工業，用反對『共產主義宣傳』的時髦話掩飾其煤油的高價政策及其對消費群衆的剝掠，這其中的一切巧妙就

在於此。

第二個問題：怎樣實現農民問題中之集體制度？

回答：我們認為，農民問題中的集體制度是逐漸地，用經濟的，財政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方面來實現的。我以為最有興趣的問題，要算經濟方面的問題。在這個領域內，我們底辦法是從三方面進行的：一，組織個別的農戶於合作社中；二，組織農戶（主要的是貧農）於生產協作社中；三，經過國家的計劃機關和調節機關在銷售農產品以及供給農民以工業必需品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

幾年以前，在農業與工業之間，有許多的中間人——以城市製造品供給農民，以農業品供給工人的那些私有企業家——阻隔着。當然，這些中間人決不肯「白出力」的，他們從農民身上以及城市居民身上抽括去的利潤不止數千百萬。這是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系，社會主義工業與單獨的農民經濟間底聯系還沒有建立好的時期。那時候合作社和國家分配機關底作用還比較小。但這個時期以後，情形就大變了。現在在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底商品流通中，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作用已不僅可以算為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可以算為統治的作用了（雖然我們還不能說他是壟斷的作用）。農民所購買的輕工業品，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業機器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國家供給的。農民所出賣的糧食，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工業原料，如棉花，甘蔗等等物品的交易，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由合作社和國家機關經手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證明，資本家已漸漸從商品流通範圍中排擠出去，工業已漸漸與農村經濟直接聯系起來，投機

商人的利潤已保留在工業與農業中，農民已經可以比較賤價地購買城市的商品，同時工人也可以比較賤價地購買農業品。

第二，這就是證明，工業已把資本家從商品流通範圍中趕出去，因此，他也就得到了領導農村經濟影響農村，提高其文化程度，使其合理化與工業化底可能。

第三，這就是證明，國家把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系起來之後，也就得到了有計劃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可能，他可以把最好的種子和肥料供給農村經濟，可以決定他的生產額，以價格政策去影響他等等。

最後，這就是證明，鄉村已漸漸造成了一種很好的條件，使我們可以順利地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節制和克服富農，組織勞動的農民經濟於生產協作社中，盡可能地用國家的經費幫助這些生產協作社。

例如，就拿製糖工業所必需的蘆薈和紡織工業所必需的棉花來講罷。這種原料的資產額，及其價格和質量，都不是由無組織的市場情況來決定的，也不是由投機事業家以及交易所這類資本主義的機關來決定的，而是糖業和紡織業新迪加與代表成千成萬農戶的棉花合作社和蘆薈合作社預定了條約有計劃地劃來決定的。這一已沒有交易所這類組織，也沒有買空賣空的這一類投機事業。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在我們這一個領域內已不存在。我們在一個領域內只有兩方單獨的直接交易沒有什麼交易所，沒有什麼中間人——一方面是國家的新迪加，另一方面是合作化的農民。國家新迪加與合作機關預先訂好合同，規定合作社必須出產多少蘆薈和棉花，而新迪加則必供給多少優良的種子和借款給農民。經濟年度告終的時候，一切出產品都歸新迪加所支配，而農民也就可以按照

預定的條件從新迪加方面得到一筆款子。這種制度。我們叫做合同制度。這個制度的優點就是他能使雙方都得到利益，而且能使工業與農業直接聯系起來不要經過中間人。這種制度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最正確的道路。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農村經濟的其他部門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農村經濟的一切部門：麥子的生產也包括在內，將都漸漸的過渡到這一條發展的道路。這一條道路就是直接走到農村經濟集體化的一個人門徑。

完全的集體化，只有到農村經濟已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過，已經實現了機器化和電氣化，大多數勞動農民已加入合作社，大多數鄉村已都有農村經濟協作社組織的時候，才能實現。我們現在正在向這個目的進行，但這個目的還沒有達到也不能很快地達到。爲什麼呢？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還心須一大筆經費，但國家現在還沒有這樣一筆大經費，當然，這筆經費經過相當時間，一定地可以積聚起來的。馬克思曾經說過，無論那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沒有大量的數千百萬的財政上的消費，是上能在歷史上鞏固起來的。我認爲我們已進入了農村經濟發展底新階段，國家現在已開始能够加緊地在財政上資助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獲得了領導作用，已經能够領導農村經濟——這件事實就是農村經濟要走向集體化的最可靠的保證。

第三個問題：在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當時企圖消滅貨幣，有些什麼主要的困難？

回答：無論在內部的發展上，以及對外的關係上，都經曾到過了許多困難。如果單就內部的經濟方面而論，那我們可以指出三個主要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我們的工業當時完全處在破產和停頓的狀態中（只有軍事工業在外國武裝干涉的時候供給我們內戰的軍需品是例外）。三分之二的工廠都關門起來，交通也完全停頓起來，商品差不多完全沒有。

第二個困難就是：農村經濟也完全處在停頓的狀態中，農民都被招募到戰線上去，缺乏原料，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糧食也非常缺乏。我們那時候每每只發半磅麵包給工人，有時甚至只發五十格蘭姆。

第三，那時候差不多還完全沒有組織為城市與鄉村間的蘇維埃商業的傳遞機關以便將城市製造品供給鄉村并將農村生產品供給城市。那時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還處在萌芽的狀態。

但在國內戰爭告終，實施新經濟政策之後，我們國內的經濟情形就根本改變了。

工業已發展而加強起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佔了領導地位。我們在最近兩年來，不靠外債，不靠國外任何的幫助，純粹用我們自己的積累，投到我們工業中去的經費已達二十萬萬餘盧布，這是證明我們工業發展的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說對於農民沒有商品。

農村經濟的生產額已提高到戰前的水平線。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工人沒有麵包和其他的產品了。

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機關也已大大的發達起來，他們在商品流通中已佔領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不能說，在我們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沒有商業的傳遞機關和分配機關了。

所有這些已經獲得的成績，現在當然還不能夠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完成。但是一切成績已足使我們可以順利的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了。

我們現在必須改造我們的工業，及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築新的工廠。我們必須提高農村經濟的文化，盡可能的製造農業機器供給農民使用，使大多數的勞動農民都吸收在合作社中，把個別的農民經濟改造成大規模的農業協作社。我們必須城市與鄉村間建立這樣的一種傳遞分配機關，使它真正能夠像每一個人估計他自己的預算和收支那樣地來估計和滿足全國城市與鄉村底需要。當我們達到這一切的時候，我們纔可以完全不需貨幣。但現在離這個時候還很遠呢！

第四個問題：『剪刀』問題現在究竟如何？

回答：如果這裏所說的『剪刀』是指農產品與工業品（指成本費）間價格的差異而言，那麼，『剪刀』形勢就像下面所說的那樣：

毫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工業品的價格比在其他條件下要貴些。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工業還很幼稚，我們還必須防禦外來的競爭，造成加速工業發展的條件，而工業的迅速發展對於城市和鄉村同樣都是必要的。因為工業如果不加速發展，我們就沒有充份的製造品與農業機器可以按時的供給農村經濟。這一種情形就造成了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底差異，這種差異對於農村經濟是有一點損失的。

爲了消除農村經濟的這一種損失起見，政府和黨採取了逐漸的不斷的降底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否能稱爲實際的呢？我認爲這個政策絕對是實際的。大家知道，在最近一年來工業品的零售價格已降底了百分之八十。同時，我們的工業組織已經有系統的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費與批發價格。我們毫無疑義地可以堅信這個政策將來還是要繼續採取的。此外，我還要告訴你們，不

斷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是我們整個經濟政策的樞紐，沒有這個政策，就根本談不到我們工業的改善，合理化，同時也根本莫想鞏固工農的聯合。

資產階級的國家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就完全不同。在那些國家中，資本家往往把企業組織在託拉斯和新迪加內，以便提高國內工業品的價格，使這種價格變為壟斷的價格，用這種手段多榨取一點利潤，造成商品輸出於國外的基礎，這些資本家在國外以賤價出賣自己的商品，以便拿得新的市場。我們俄羅斯，在資產階級統治時代，也採取了這種政策，例如，白糖，在我們國內的價格要三倍，而出賣到外國去的時候，都非常便宜，例如，英國甚至用白糖喂豬。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政策與這完全相反的。蘇維埃政府認為工業應為人民而服務，而不是相反。它認為不斷的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就是發展工業的主要方法。不用說，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樣也足能提高人民的需要，擴大國內市場的容量，及造成發展工業所必須的不斷增長的源泉。

第五個問題：蘇維埃政府對於法國小債主有甚麼意見？如何可以使法國的閒逸階級與他們相識？

回答：我們對於戰前債務的意見，已在拉哥夫斯基（Bakovsky）同志的談話中發表出來了。我想，這些意見，你們大概都已經看過。我們對於戰前的債務償還與否，是要看法國是否肯借債給蘇聯而決定的。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就是：你如果給我，我也就給你。你們如果肯借債給我們，我們也就把戰前的債款還你們一點，不借給我們，我們就一點不還給你們。這是不是說，我們原則上已承認了戰前的債務了呢？不，決不是這樣。這只是說，我們一方面保持我們取消沙皇債務的法令，同

時在實際的妥協的條件之下，如果肯借債給我們（這種債款不僅爲我們所必需，同時也有利於法國工業的）那我們也同意把戰前的債款還一點。這一筆付還戰前債款的錢，我們祇當作發展我們工業所必需的債款底一種附加利息。

談到沙皇俄國的軍事債款。說到由於十月革命的結果對蘇聯的各種要求。但是大家都忘記了，我們的革命是原則上否認帝國主義戰爭及與此種戰爭相關連的沙皇政府底債款的。大家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償還而且將來也不償還這些軍事債款的。除此之外，大家也都忘記了蘇聯是不能不計算外國向蘇聯進兵時期（蘇聯的反攻是與這種進兵有連帶關係的）所遭受的劫掠與損失及由此而生的蘇聯的相反的要求。試問向這些劫掠與損失應當由誰負責呢？誰應當賠償這些劫掠與損失呢？帝國主義的強盜很希望人家忘記他們這些野心的事。但是他們應當知道，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能忘記的。

第六個問題：怎樣把燒酒的壟斷和與酒癖做鬥爭聯系起來：

回答：我認爲，這兩件事是難以聯系起來的。這裏毫無疑義的有一個矛盾。明明知道這個矛盾，而且有意地的這樣做，黨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這個矛盾的存在，是沒有甚麼要緊的。當我們施行燒酒壟斷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兩件出路：或是向資本家妥協，把多重要的工廠都租讓給他們，從他們方面取得我們所必需的經費以便從事工作；或是施行燒酒的壟斷，以取得我們所必需的流通經費，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中央委員（我也在內）當時曾和列甯商量這件事情，列甯認爲在得不到外債的時候，就祇好公開直接的實施燒酒的壟斷，作爲一種臨時辦法這就是我們實施燒酒壟斷的時候

所發生的問題。

一般的說來，完全廢止燒酒當然要好一些，因為燒酒是一種壞東西，但如果廢止了燒酒我們就只好去受資本家的奴役，這就更壞了。因此，我們甯願少得些壞處。

現在我們每年從燒酒得到的收入共計五萬萬盧布以上。

放棄燒酒事業，就是放棄這項收入，而且酒癖的現象也必定不會減少。因為國家如果不製造酒，農民自己就要去製造酒，成天的醉迷於燒酒壘中。農村文化的不發達在這種地方當然也有相當的作用。不用說，如果我們立刻放棄了燒酒的壟斷，我們的工業就喪失了五萬萬以上的盧布。這一筆經費是無從填補的，

但這是不是說燒酒的壟斷在將來也應當一直保留下去呢？不，決不是的。我們實施燒酒壟斷，祇是一種臨時辦法。因此，只要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找到一個新的收入底來源，使我們可以藉此去發展我們工業的時候，我們就馬上要取消這一種辦法。這種新的收入的來源，毫無疑義地是可以找得到的。

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國家經營，這種辦法究竟對不對的呢？我認為是對的。如果我們把燒酒事業交給私人去經營，那就要引起下列的結果，第一，必然會加強私有資本，第二，政府就不能調節燒酒的生產與消費；第三，政府就不能在最近的將來取消酒的生產與消費，現在我們的政策就是逐漸的縮小燒酒的生產。我想，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完全取消燒酒的壟斷，把酒的生產縮小到純粹為技術上所必需的最底限度，然後就完全禁止酒的賣買。

我想，如果西歐的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並給我們以必要的幫助，那我們也就用不到去經營燒酒事業以及其

他那些不好的事業了，可是有甚麼辦法呢？現在我們西歐的兄弟們還不願意奪取政權，我們只好靠我們自己的經費。但這並不是我們的過失。這是命運如此。所以我們西歐的兄弟們對於燒酒壟斷也應該負相當的責任哩（笑聲，鼓掌）。

第七個問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的法權，審案不用證明人和辯護人，秘密逮捕。因為這些辦法頗難以爲法國的社會輿論所贊同，所以最好把它們的根據講一下。你們是否想變更或廢止這些辦法？

回答：國家政治保衛局或是非常委員會都是蘇維埃政權底懲罰機關。這個機關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社會治安委員會很有點相像。它所懲辦的犯人多半是奸細，陰謀者，恐怖主義者，強盜，投機商人，及製造僞幣的人。它與軍事政治法庭相類似，專門用來保護革命的利益，抵防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及其奸細的陰謀的。

這個機關是在十月革命後一天，當我們發現了許多陰謀的，恐怖的，奸細的（他們的經費是由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接濟的）組織的時候，才組織起來的。在許多反蘇維埃政權的恐怖舉動之後，在烏里咨基同志（列寧格勒革命委員會委員，被社會革命黨所謀害）被殺，伏羅達爾斯夫（列寧格勒給革命委員會委員，也被社會革命黨人所暗殺）被殺，列寧被刺（他曾被社會革命黨人所傷）之後，這個機關就更發展而鞏固起來。我們大家都應當承認，國家政治保衛局那時候確實非常敏銳的給了革命的敵人以銳利的打擊。而且他的一種能力現在也完全保留着。國家政治保衛局給資產階級的催命符，是革命的警衛兵，是無產階級的寶劍。

因此，各國資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一個個都

切齒痛恨，是毫不奇怪的。沒有什麼故事，他們不牽涉到國家政治保衛局，沒有什麼侮蔑，他們不散佈到這個機關。這證明什麼呢？這就是證明國家政治保衛局是很正確地在保護革命的利益。那般可咀咒的革命的仇敵謾罵國家政治保衛局，却巧證明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行動是正確的。

工人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態度就不是這樣的，你們且跑到各個工人區域去問一問工人們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意見。那你們就可以知道工人們都是很尊敬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深深地感覺到這是忠實的革命的保護人。

我明白資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底仇恨和不信任。我明白各國資產階級的旅行家，到蘇聯來遊歷的第一件心事就是探問國家政治保衛局還存在與否，及是否已到了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這一切都是很明白的，毫不奇怪的。但我不明白有些工人代表，跑到蘇聯來開口就驚惶地問：國家政治保衛局是否懲辦了很多反革命家？以後是否還要懲辦那些反無產階級政權的恐怖主義者和陰謀者？現在是否到了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有些工人從什麼地方生出這樣關心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的心思呢！這怎麼解釋呢？它的根據在甚麼地方呢？

勸我們的手段盡量的和軟，勸我們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局……但是我們取消了國家政治保衛局之後是否可以担保各國資本家就從此不再組織和接濟陰謀者，恐怖者以及殺人放火等的反革命的團體了呢？在絲毫不能担保革命的敵人能解除武裝的時候，就來解除革命的武裝——難道這不是蠢到極點的勾當麼？難道這不是反對工人階級

的一種犯罪行爲麼？不，同志們，我們決不願意再重複巴黎公社的錯誤。巴黎公社對付凡爾賽敵人的手段太軟了，當時馬克思責備他們是很有道理的。他們這種和軟的手段，結果當棋耶標進入巴黎的時候，就明白斷地送了成千成萬工人的性命。同志們是不是以爲俄國的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像法國凡爾賽人那樣殘忍和兇暴呢？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記得他們（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與英法日美的聯軍勾結起來佔據西伯利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時候，是怎樣殘暴地屠殺工人的。

我並不是說，因國家內部的情形而使我們不得不設立革命的懲罰機關。就我們內部的情形而論，革命的大局早已鞏固穩定，沒有國家政治保衛局也已是過得去了。

但問題就在於我們內部的敵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他們與各國的資本家有千條萬緒的聯系，各國資本家正在竭盡全力用盡各種方法幫助他們。我們是被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着的國家。我們革命內部的敵人是全世界資本家的奸細。資本主義的國家是我們革命的內部敵人之後方的根據地。我們與內部的敵人鬥爭。也就是與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鬥爭。現在請你們評判一下，在這種條件之下是否可以不要國家政治保衛局這種懲罰機關呢？

不，同志們，我們不願再重複巴黎公社的錯誤。我們的革命需要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政治保衛局還應當保留着威嚇無產階級的敵人（大鼓掌）

有一個代表說：斯大林同志，我代表在座的代表們向你深深的表示感謝，感謝你的明白的解釋，使我們透澈的明白了國外對蘇聯所散佈的那些謠言。請你不要懷疑，我們回到本國去之後必能把蘇聯的真情實理告訴工人們

○

斯大林：同志們，這是不值得感謝的。我回答你的問題是我應盡的責任。我們蘇聯的工作人員，認為應當向我們本階級的兄弟們盡量地解釋他們所願得到回答的一切疑問。我們的國家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嬰兒。我們國家負責人員向世界無產階級的代表解釋疑問只是他們應盡的責任（鼓掌）。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

——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特密得利夫同志！

本年一月十四日，你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所發表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的信，轉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叫我答覆，我因黨務纏身。以致延擱。尚請原諒。

一，我們不應該同有些同志一樣的提出問題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實際的，或是一個宣傳的口號」。我們絕對像這樣的說：我們在事實上雖則沒有工農政府，但我們又不妨說工農政府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像這樣的發問，不啻說我們的黨可提出內虛外實的口號，此種口號，不切合於事實，在黨的本身，亦不相信，但把他提出來作為欺瞞民衆的工具的。此種行動只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能够做，因言行不一致，欺瞞民衆，是這些日趨死亡的政黨之主要的工具。但我們的黨不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決不許有這樣的發問，因他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甯主義的黨，是向前進步的黨，他的力量是在言行的一致，他不肯欺瞞民衆，他對民衆只講真實的話，他不以挑撥的手段來決定政策，他是根據階級力量的分析來決定的。我們應該這樣的發問：或者，我們沒有工農的政府——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必須將他拋棄，因為他是不需要的不真實的口號；或者，我們在事實上確有工農政府，而此種政府的存在，是與階級的力量相符合的，——那末，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正確的革命的口號，非此即彼，願特密得利夫同志擇之。

二、你稱工農政府的口號是：『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上這個口號，或者如你所願說

的這個公式，乃是列甯的口號，并不是甚麼別的人的。我只是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重新提出而已。請看一看列甯全集的第一五卷第一二、一四、一六、三八、五二、七九、三四八頁；第一六卷第二八、二九、三一五頁，第一八卷第一部第九六頁，那裏列甯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府」；請看一看第一五卷第二二八、三二二、三四〇、三四一、三四五頁，第一六卷第九五、一六四、三〇一、三〇三、三〇七、三七八、三七九頁，第一七卷第五六、一〇五、三二〇、三四〇、四〇三、四一九、四二〇頁；第一八卷第一部第九四、一一一、二二三頁，那裏，列甯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權」。你們看了這些引據以及列甯所有的他種論著，你們就會了解工農政府的口號或「公式」是列甯的口號或「公式」，并不是甚麼別的人的。

三 你的根本錯誤：在你（一）把我們政府與我們國家的兩個問題混淆起來；（二）把我們的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問題混淆起來。

我們的國家，絕對不能與我們的政府混淆，同時也不能使之相等。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取國家政權的形式，以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爲目的的。我們的政府，是此種國家組織的上層機關，是他的上級領導機關。政府或許犯了錯誤，一時使階級的專政發生破壞的危險，但這并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不正確的錯誤的原則，不能做過渡時代國家組織的原則。他僅是說，上級指導不好，上級指導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不合於無產階級的專政的，此種政策，應該使之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相符合。國家與政府，如根據他的階級改變性，來講是一種同樣性質的組織，但政府自有他的範圍，他不能包括國家的一切。

他們在機體上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把他們混爲一談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不能把國家與政府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同樣，不能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上級領導機關混淆起來。

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和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更是不可允許的。我們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本身是很明顯的——他們的階級性，就是無產階級的。我們國家與政府的目的，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目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一切都很明顯了。然而究竟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的趨向何在？就是要採用怎樣的路綫與方法，藉此，可以在我們農業的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爲的是要鎮壓剝削者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除上述一切以外，須指出一些途徑與方法，我們要在無產階級佔少數農民佔絕對多數的國家內實現上述任務是不能。這些途徑與方法是甚麼，他們的趨向何在呢？他們主要的趨向是使工人與農民基本群眾的聯合保存和鞏固起來，使得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權能保存和鞏固起來。除此種聯合外，那末，我們的政府就毫無力量，我們也沒有可能實現剛才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任務。這是無須証明了。此種聯合，究能存在得多久：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的政策究能繼續到什麼時候？這是很明顯的，他在階級與政府存在的時期內，還是要繼續的，因爲政府是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這是我們要注意到：甲，工農聯合，不是爲保存農民這一個階級，是要改造他們，使之走向恰恰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

利的方向；乙，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政策，不在鞏固階級。而在消滅階級，而在加緊消滅階級的速度。因此列甯說得很對，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使無產階級能够握住領導的作用與國家的政權。」（第一八卷上册第三三一頁）。不用證明的，惟有列甯這種主張，而非其他主張，才是蘇維埃政府日常政策的指導路線，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目下發展的階段中，實際上就是維持和鞏固這種工人和農民基本群眾聯合的政策。在這種意義上——祇有在這種意義上，并非在他階級性的意義上——蘇維埃政府才是工農政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脫離列甯主義，否認無產階級與農民勞苦羣衆聯合的真諦。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聯合是一種陰謀，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動，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爲的是「煽動」。而不是與農民群眾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我們的革命不能滿足農民基本群眾的根本利益，就不啻說他們的利益，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衝突，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與農民基本群眾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列甯合作社的計劃是靠不住的。孟塞維克及其同調者是正確的……。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便會馬上明瞭用「煽動」的眼光去觀察工農聯合問題的陳腐與無謂，所以我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說工農政府的口號，并不是「挑撥」和「煽動」的手段，而是絕對真確的革命口號。

簡單說：一個問題是講到國家與政府的社會性，這個就是決定我們革命發展的根本目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說政府的日常政策，關於這個政策的途徑與方法，是實現上述目的必須條件。這兩個問題，無條件的是互相聯系的。這不是說，他們是可以等量齊觀，混爲一團。

你可以看見，國家與政府的階級性的問題決不能與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這裏有一個矛盾存在，根據政府的階級性，他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它怎樣能稱為工農政府呢？但是這裏的矛盾只是推測想像的。老實說有幾個神經過敏的同志在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兩個公式中，也想出這樣矛盾，因為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的政權』（第十六卷。第二八二頁），但第二個方式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勞苦群眾先鋒隊——無產階級無量數非無產階級勞苦群眾（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農民，智識份子等等）之階級聯合的特殊形式（第六卷，第二四一頁）。在這兩個公式中有沒有矛盾呢？當然是沒有的。在與農民基本群眾發生階級聯合間，有的時候。怎樣能達到一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呢？就執在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合中實現其領導作用。在與農民基本群眾聯合，以國家的形式去領導農民，藉以來實現無產階級的一階級政權。這就是兩個公式的基本意思。那裏還有矛盾在在呢？但是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基本羣衆的國家領導，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譬如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但我們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存在過這樣的國家領導？是沒有過這樣的領導。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乃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領導。所謂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就是：（甲）資產階級已被推翻；（乙）無產階級已握得政權；（丙）無產階級不與其他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基本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與工農專政之下的領導，即是說：（甲）資本主義還是根本存在；（乙）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當權（在

政權的成分中，此種資產階級佔重要地位）；（丙）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將農民從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并在政治思想方面領導他們作推翻資本主義爭鬥的準備。你可以看見，這裏的差別，是一種根本的差別哩。

對於工農政府問題，也是同樣的說法。我們政府的本性是無產階級的，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的任務，並沒有妨碍我們的政府，恰恰相反，它們祇推動，而且必須推動他，使它實行保障和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以爲我們農民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級任務的重要工具，因此我們，稱此種政府爲工農政府，這裏有甚麼矛盾呢？列甯實行工農政府的口號，并稱我們的政府爲工農政府這是很對的，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呢？

一般的講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我們國家內，藉他的幫助實現一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制度。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喜歡這樣的複雜情況，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很多同志抱着「少費力主義」願意在簡而又易的制度下過生活。有甚麼辦法呢：第一，列甯主義，須應用真正的列甯主義（絕不能簡單庸俗化）；第二，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最簡單的最容易的「理論」，不一定是正確的理論。

四，你在來書中，噓聲嘆氣的說：「一般同志對此問題所犯的罪過。是在他們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國家或者僅是簡單的談到政府。因此，他們不能給一個最後的解答，同時他們完全忽視了這兩個觀念的關係」我承認，在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中間確有此種「罪過」存在，如果我們注意到有些不很努力的「讀者」當他們讀列甯文集

時，不願意好好的研究，而反要求人家替他們將每字每句都澈底的分析一下。這有什麼辦法呢，第一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異常忙碌，鎮天爲日常工作所糾纏，不能把列甯主義逐點加以解釋，第二，總要留點工作給「讀者」，因爲他們終久必須由隨便翻閱列甯全集，而走向刻苦的研究。應該說的，就是如果「讀者」對於列甯主義不肯下刻苦研究的工夫，那「讀者」的怨嘆，（像你的一樣，和「誤會」時常會發生的。

拿個比方來說，拿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來說。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不論根據他的階級性或政綱，或根本任務，或行動，或事業，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自然，在國家機關裏有些「官僚主義的流弊」。列甯的定義：「工人國家是抽象的，在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工人國家。第一個特點，在他是一個工人佔少數農民佔絕大多數國家，次則工人國家尚帶有官僚主義的流弊」（第十八卷上册第三三頁）。懷疑有此的，只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一些反對派的分子。列甯屢此說明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即是一階級（無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已經很久以前爲人所共知的了。但是還有不少列甯主義底「讀者」，仍然冒充列甯的話，謂列甯曾經稱過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其實，這裏並不難知道列甯在那時所說的並不是我們國家階級性的定義，更沒有否認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他只說無產階級性的蘇維埃國家必須實行^無產階級與農民基本群衆的聯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又必須向鞏固此種聯合的方向進行。試看一看列甯全集十五卷——五五頁；第十七卷——二六，五四，四二〇頁；第十八卷第一編——一二，一一一，一一九，三八〇頁。

在這些著作中，以及在幾種其他著作中，列甯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可是在這些地方列甯始終不是說到我們國家的階級性，列甯只給了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一個定義，這個政策，是在農民國家條件之下的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及社會主義的任務中所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有條件狹隘的意義上，只在這種意義上，才能講到列甯在上述的著作中關於「工農」國家。至於我國的階級性，我已在上面說過了，列甯曾給我們一個真確無比的說法，這種說法，絕不能加以任何的曲解：我們的國家是工人的國家在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內并帶有官僚主義流弊的。以爲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有些『讀者』善於『誦讀』文句，而不求了解，已讀過的東西還在繼續悲一着，埋怨列甯，關於我們國家性質的問題把他們弄糊塗了。而列甯的『信徒』不願『解釋』這種『混糊的地方，特密得利夫同志，這不是很可笑的一回事嗎？……

你問：免除『誤會』的出路在那裏？據我的意見，只有一條出路：不要片斷的去研究列甯主義把他看得太容易，而要切實的深思與嚴重的去研究它。除此以外再沒有旁的出路。

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覆楊同志——

楊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我的答覆稍微遲了一點，請原諒！

(一) 列甯說『一切革命中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參閱列甯全集第十四卷下冊，一九二頁）。權集中在那一個階級。或那些階級的手中；那一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推翻；那一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一切革命中之最主要的問題』。

在革命的某一階段中整個時期內發生效力的黨的戰畧上的基本口號，如果不完全建築在列甯的這一個提綱上，就不能稱為基本的口號。如果所有基本口號真正能建築在階級力量之馬克思主義底分析上，能正確地指出革命力量在階級鬭爭戰線上底配置，能順利地推動群眾到革命鬥爭底戰線上去，為革命勝利而鬭爭，為新階級奪取政權而鬭爭，能幫助黨從廣大的群眾中間形成一支廣大的強有力的政治軍隊來完成這些任務，——只有這樣，此等基本口號才會正確。

在革命的某一個階段中，也許會有失敗，退守，不成功，以及個別的策畧上底錯誤，但這還不能證明基本的戰畧上的口號是錯誤的。例如，我們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使資產階級中立，與全體農民一致反對沙皇和地主，以獲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與完全是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了失敗。

因此，黨的基本口號問題是不能與革命某一階段上的成敗問題混爲一談。

有的時候，黨的基本口號在革命的行程中已級走到推翻一個舊階級或幾個舊階級政權的地步，可是從這口號中產生出來的許多切實的革命要求，却還沒有實現，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或甚至於要經過一番新的革命，方纔能夠實現出來，但這還不能證明基本的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和地主，可是沒收地生土地等等的要求並沒有實現出來，但這並不是證明我們的黨在革命第一個階段中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再舉一個例來說，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把政權轉入無產階級的手中，但他第一，並未立刻澈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第二，它並沒有立刻使富農孤立起來，把這件事牽延了相當時期，但這決不能證明我們在第二個革命階段中的基本口號——『使中農中立，與貧農一致反對城市與鄉村中的資本主義，奪取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不正確的。

因此，我們黨的基本口號問題決不能與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革命要求之實現的時間和形式問題混爲一談。

所以我們黨的戰畧上的口號，決不能根據某一時期中革命運動之片斷的成功或失敗來判斷它的正確與否，更不能根據從這些口號中產生出來的某個要求實力的時間和形式來判斷它的正確與否。只有根據階級力量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革命鬥爭戰綫上革命力量之正確的配置，爲着政權能集中到新的階級手中，纔能判斷這種基本口號是否正確。

楊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忽畧了這個非常重要的

方法上的問題，或是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二) 你的來信中說道；

『說我們只在十月革命前聯合全體農民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不，是不正確的。『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的時候，及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都是發生效力的，因為在這些時候，全體農民都是希望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

照這段話的說法推論起來，黨在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中（一九〇五——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時候的目標是推翻沙皇地主政權和建立工農民主專政——之戰畧上的口號：與第二個階段中（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那時候的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之戰畧上的口號，是沒有甚麼區別的。這樣，你也就是否認了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底基本區別。你之所以會犯這一個錯誤，就是大概因為你不願意瞭解：戰畧上的口號之基本問題是某個革命階段上的政權問題，也就是那個階級被推翻和那個階級奪得政權的問題。你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根本的錯誤，這是不言而喻的。

你說。正當十月革命的時候，和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我們都實行了「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因為那時候全部農民都還希望澈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誰也訴過：十月革命只限於或規定其基本任務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呢？你從何知道？難道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可以放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內的麼？難道攫取無產階級的專政不是已跳出了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麼？怎樣能夠斷定富民（他也是農民）也能幫助推翻資產階級和轉政權於無產階級的手中？

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賣買等等的訓令（雖不能稱爲社會主義的訓令），都是在反對富農的鬭爭之下，而不是在聯合富農之下實行的。這怎樣能夠否認呢？試問富農（他也是農民）怎麼能擁護蘇維埃政權所頒佈的沒收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訓令呢？他們又怎樣能擁護無產階級所提出來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說十月革命的基本任務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

不錯，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便不能徹底完成，同時十月革命本身如果不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且因爲十月革命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纔能得到全體農民的同情，這一切都是毫無爭辯的，但怎麼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斷言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不是十月革命行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他的主體或他的基本目標呢？

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權，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沒收資本家的產業等等——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戰畧上的口號之主要問題就是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即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入別一個階級手中的問題，那麼很明顯地，無產階級政權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就不能與推翻資產階級和獲取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即革命第二階段中之戰畧口號的主要問題）混爲一談。

無產階級專政徹底最偉大是成績之一，就是他 底的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掃清了中世紀的一切污物，這對於鄉村有非常重要的能左右一切的意義。不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使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關於這一

點，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不做這一層，無產階級的革命也就不能鞏固起來，同時我們也必須顧計到下面這一件重要的事實。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並不是一件一舉就成的事業。實際上，他曾牽延了很長的時期，他不僅包括了一九一八年的一段時間（像在來信中所說的那樣），而且還包括了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時間（窩瓦河沿岸和烏拉爾一帶地方）和一九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時間（烏克蘭）。這就是在高察克和但尼金進攻的時候，那時候在全體農民的面前又發生了恢復地主政權的危險，因此全體農民便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以便保證資產階級革命之徹底完成和保持這個革命的果實。要正確地瞭解你所引證的列甯的話和實施這些口號時的決竅，就必須時刻顧計到這種活的生活行程底複雜性，無產階級專政之直接的社會主義任務與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間之相互的錯綜。可不可以說這一種複雜的錯綜就是證明黨在第二個革命階段上底口號是不正確理，這個口號與第一個革命階段上的口號是沒是什麼區別的？不，決不能這樣說。恰巧相反，這一種複雜的錯綜，祇能証實黨在第二個革命階段上的口號——與貧農一致反對城市和鄉村中的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的政權而鬥爭——之正確性。為什麼呢？因為要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就必須在十月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及奠定無產階級的政權，因為只業這樣的政權，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要在十月奠定無產階級的政權，就必須準備和組織一支能够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來進行十月革命，而且我們只有在『聯合貧農反對資產階級，擁護無產階級』的口號之下，纔能準備和組織這樣一種的政治軍隊，這也是不言而喻的。很明

顯的，沒有這樣一種戰略上的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實施到十月爲止），我們也就不會有這樣一種的政治軍隊，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不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因而也就不能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所以，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這回事決不能與第二個革命的階段——他的任務是証保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中的基本口號對立起來。

只有一個方法才能避免這一切『矛盾』，這個方法就是：承認第一個革命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上的戰略口號與第二個革命階段（無產階級革命）上的戰略口號之間的基本區別，承認我們在第一個革命階段上是與全體農民一致擁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但在第二個革命階段上只與貧農一致反對資本的政權，擁護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必須承認的，因爲第一個革命階段和第二個革命階段中之階級力量是分析，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基本區別。否則我們就不能解釋下面這件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時候我們是在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之下進行工作的，而在二月革命後却換成了工人和貧農的社會主義專政的口號。

楊同志根據你的說法，就不能解說這一種口號的變換（在三月到四月），這是你應當同意的。

列甯在兩個策客那本書上就指出了這兩個策客口號之間的基本區別。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中的口號，照列甯的意見應當這樣：

『無產階級當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聯合農民群眾以強力去撲滅專制體制的反抗，及麻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參閱列甯全集第六卷三七一頁）

換句話說，就是；使資產階級中立，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政權，擁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的口號，列甯認為應當這樣：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聯合半無產階級群眾以強力去撲滅資產階級的反抗，及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動搖性。』（同上）

換句話說，就是：聯合貧農和一般半無產階級群眾去反對資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革命，保持城鄉小資產階級的中立。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事。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甯分析當時的政治局面，是工農的民主專政與實際的資產階級政權兩相錯綜的局面，他說：

『俄國現時正處在一個特殊的階段中，現在他正在從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因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充分而使資產階級得到了政權）過渡到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無產階級和貧農便應當把政權抓在自己手裏。』（參閱列甯全集第十四卷，上册一七八頁列甯的四月提綱。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正聚精會神地準備十月革命的時候，列甯特別做了一篇論工農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說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那時候（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我們階級政策底一個基本定義。這個定義是很正確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更加証實了他。只有領導貧農的（就是我們政綱上所說的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才能以民生的和平來結束戰爭，醫好他的傷痕。急不容緩地向着社會主義的道

路開步走——這就是我們現時的階級政策的定義』
(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八二頁)

但切不可把這句話理解作爲這樣：以爲我們現在還是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工人和貧農專政的口號之下走向十月革命的，而且在十月革命中我們在形式上却是實現了這個口號，因爲我們那時候同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而且分了一點領導權給他們，雖然在實際上那時我們已有無產階級專政，因無我們布爾塞維克佔了大多數。但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盲動』之後，即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決裂之後，領導權已完全集中到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底手裏，已決不能再將國家的領導權分給另一個政黨，到了這個時候，工人和貧農的專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這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列寧在回顧革命所經過的道路時說道：

『不錯，當我們與全體農民一致行動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這一點我們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們從一九〇五年以來已經說過幾千幾百遍，這一個歷史的必經的階段，無論如何是跳不過的，也決不是訓令所能取消的……但到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很早以前，在我們未奪取政權之前，我們就公開地對民衆說道：革命現在已不能再停留在這個階段上了，因爲國家已向前跑去，資本主義也已向前發展了，破壞已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這一種客觀的情形，要求我們（不管誰願意不願意）更進一步地跑向社會主義去。因爲不然，我們就不能前進，不能拯救被戰爭所

破壞了的國家，不然，也就不能減輕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底痛苦。事變的發生正是像我們所說的那樣。革命的行程證實了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起初我們與「全體」農民一致反對君主和地主，反對中世紀的制度（因此這時候的革命依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我們與貧農，與半無產階級，與一切被剝削者，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農村中的富人，富農及投機商人，因此革命也就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五〇八頁）。

你看，列寧曾屢次鄭重地指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中的戰畧口號與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的戰畧口號之間，是有極深刻的區別的。第一個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致反對專制政體。第二個口號是：與貧農一致反對資產階級。

不錯，資產階級革命一直牽延到十月革命後一個很長的時期中才完成的，我們既澈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全體」農民當然不能不來同情我們——這是事實，但這件事實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并不能絲毫動搖下面這一個基本觀點：我們與貧農一致走向十月革命，完成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我們與貧農一致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他底任務之一就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這時候富農（他也是農民）是反抗我們的，中農是動搖的。

我想，這已是很明白的了。

（三 你在來信中又這樣說道：

「有的人說：「我們走向十月革命時的口號，是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這種說法對不對的呢

？不，這是不對的。根據上引的列寧的話，可知這個口號，只有當農民內部階級分化業已成熟的時候，即一九一八年夏秋之間，才能發生。」

照這段話說法看來，黨開始走到使中農中立的道路上，並不是在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也並不是正常十月革命的時候，而是在十月革命之後，特別早在一九一八年，貧農委員會成立之後。這完全是不正確的，恰恰相反，使中農中立的政策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貧農委員會成立之後才開始的，而是在那個時候告終的。使中農中立的政策正就在一九一八年之後，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取消的（而不是在那時採取的），列寧也正就在一九一八年之後，一九一八年三月，我們黨的第八次大會的開幕詞中說道：

「昔日社會主義的最好的代表們（那時候他們還相信革命而且還在理論上幫助革命）曾經說過使農民的中立，就是說，使中農變成一個中立的社會階層，縱使他們不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至少也要使他們不來妨礙我們的工作。這一個抽象的理論上的任務的提法，我們已經完全明白了。但這是不夠的。我們已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我們現在必須根據我們農村工作底經驗，具體化，詳細地劃出一個基本規則和指南，指示我們去堅固地聯合中農。」（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九四頁）

這樣看來，列寧所說的話與你來信中所說的話，簡直完全是相反的，你把我們黨真正的實際工作完全顛倒起來，你把中立政策的開始和終止完全混亂起來了。

在資產階級已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尚未鞏固的時候，中農是動搖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因此，就只好使他中立起來。當中農已經相信：資產階級已「真正」被

推翻，蘇維埃政權正在鞏固起來，富農正在克服下去，紅軍已開始在國內的戰線上節節勝利的時候，他便開始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正就在這個轉變之後，列寧纔能在黨的第八次大會上提出第二個口號：依靠貧農，鞏固的聯合中農——爲社會主義建設而前進。

怎麼能夠忘記這一件事實呢？照你來信中的話看來，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及在革命勝利後的初期，是不正確的。所以是不適用的。楊同志，你這種見解是完全不對的。事實恰恰相反。中農正就在資產階級推翻之後，無產階級政權未鞏固之前，動搖和反抗得最厲害。正就在這個時期，我們必須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

你堅持你自己的錯誤，你認爲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們的國家有極大的意義，而且對於「類似俄國十月革命前的經濟」的那些國家，也有很大的意義。後面這一句話當然是正確。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提出來的土地問題底提綱中，曾述及無產階級政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中對於中農底政策。他首先認爲貧農，更正確點說，「農村中的被剝削的勞動群眾」，是農業工人。半無產階級，或小農組合的成的一個獨立的集團，然後他才講到中農問題，他認爲中農是農村中一個特殊的階層，他說：

「在經濟意義上說來，「中農」可以說是一種小的自耕農，他們享有私有或租來土地底權利，他們的土地雖然也是很少的，可是在資本主義之下，他們不僅可以維持儉省的家用，而且還可以有一點餘剩，這種餘剩在豐盛的年頭，就可漸漸積聚成爲一筆資本，這筆資本往往用來雇傭他人的勞動力……革命的無產階級不能——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及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開始的時候不能這樣——以吸收這種中農階層到自己方面來作爲自己當前的任務。
。無產階級的任務。現在只能限於使中還中立，就是迫使中農不去積極地幫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參閱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記錄六一〇——六一一頁）

我們看了這段話之後，怎麼還能冒昧地說：使中農中立的政策，「祇是」在「一九一八年夏末秋初」的時候，即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政權已經大大地鞏固之後，才能開始「發生」呢？

可見無產階級在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時期中底戰客口號問題，都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四）從上述的一切話中，可知你所引證的列寧的話是決不能與黨在第二個革命階段上底基本口號對立起來的，因爲這些引證：第一所說的並不是關於十月革命前的黨的基本口號，而是關於十月革命後的資產階級革命之澈底的完成；第二這幾段引證并不能推翻這個口號；而只是證實了這個口號底正確性。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此刻又不得不再重複說一遍：決不能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這個任務與黨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一個任務（他的主要的問題就是政權問題），第二個革命階段上的戰客上的口號互相對立起來。

（五）你不信中又說到莫洛托夫在『真理報上』所發表的那篇論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文章，你說，促你來請我解釋底『動機』，就是這篇文章。楊同志！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來讀這篇文章的。我也讀過了莫格托夫同志的這篇文章，但我認爲這篇文章

與我在十四次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說關於農民的話，絲毫沒有衝突的地方。莫洛托夫同志所說的並不是關於黨在十月革命時候中底基本口號，而是關於黨在十月革命後，完成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因而得到了全體農民底同情。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件事實并不能否認下面這一個基本見解底正確性，而只能更證實他的正確性，就是：我們在中級保守中立的局面之下，與貧農一致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城鄉資產階級，不這樣做，我們也就不能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號布爾塞維克第，七八兩期)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工人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答覆樸克羅夫斯基同志——

樸克羅夫斯基同志！

你五月二號的來信，實無詳細答覆的必要。老實說，你這封信和楊同志的來信比較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東西。我之所以依舊寫回信答覆你，因為你這封信內有些意見，簡直是加米業夫派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的主張底復辟。爲了揭破這種觀點起見，所以我不得不給你一個簡單的答覆。

(一) 你在來信中說道：「實際上我們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這個時期內的口號，是聯合全體農民」，「黨在這個時期內，對於農民仍保持了他底舊的口號——聯合全體農民」。

照這樣看來，第一，好像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四月至十月）中並沒有把貧農與小康的農民劃分開，而仍舊把他們放在一塊兒。

第二，好像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中並沒有提出新的口號——「工人與貧農的專政」——來代替舊的口號——「工農專政」，而依舊逗遛在列寧一九〇五年在兩個策略那本書中所指示出來的那個舊的立場上。

第三，好像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與蘇維埃內部的動搖和妥協鬥爭。與蘇維埃裏面和戰線上中農底動搖鬥爭，與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底動搖鬥爭，與一切的動搖和妥協鬥爭，（在七月間，蘇維埃爲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妥協首領所把持，與

反革命軍官勾結起來，要使布爾塞維克孤立，在這時候動搖和妥協的空氣最爲濃厚，)——照你那樣說來，布爾塞維克與一部分農民階層的動搖和妥協作鬥爭是沒有對象的，是絕對地不需要的。

第四，照你那樣說來，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月間主張保持工農專政的口號是對的，而列甯當時認爲這個口號，已經太舊，提出工人和貧農專政底新口號，是不對的。

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就可以明白你的全信底錯誤了。

但你是最喜歡零碎的引証列甯底話的，所以我也不妨引證些列甯的話給你看，

列甯認爲在二月革命後，俄國土地關係上的新現象從革命繼續發展的觀點上看來，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利益底一致，而是貧農和小康農民的分裂，貧農已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而小康農民則轉到臨時政府方面，關於這一點不用費什麼大的力量就可以證明的。

列甯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與加米業夫和加米業夫派底爭辯中，曾說道：

「現在無資階級的政黨，決不能希望與農民的利益共同一致。」(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下冊第四一七頁)

下面又說：

「現在我們在農民代表大會的許多決議中已經可以看到把土地問題延擱到立憲會議的這種議見——這是投向立憲民主黨的小康農民之勝利。」(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城代表會議上的講演，列甯全集第二〇卷下冊 第一〇七頁。)往下又說：

「農民取得一切土地和一切政權，這是有可能的，我不僅沒有忘記這個可能性，沒有把我們眼界死板地限制在今天的窘境中，而且在確定土地政綱的時候很精確地估計到新的現象：僱農貧農與小康農民之間底更深一層的分裂。」（列甯的論策畧書，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上册，第三〇頁。）

這就是列甯所認為在二月革命後新窘境中之新的重要的特點。

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規定黨的政策的時候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

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彼得格勒全城代表會議上所說的話，也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列甯在那次會議上說：

「我們僅僅在這裏纔知道，工人和兵士的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工人和兵士的代表蘇維埃是工人和兵士專政的實現，兵士中間大多數是農民。這也就是工農的專政，可是這個『專政』與資產階級妥協起來了。現在『老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實有重新審查的必要。」（列甯全集第二〇卷下册第一〇七頁）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下面這一段話的時候也是根據這一個見解出發的：

「誰到現在口裏還只嚷『工農民主專政』，誰就是時代的落伍者，誰就是在實際上已轉變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底階級爭鬥，誰就應當存放到革命前的『布爾塞維克』的古董陳列所中去（可以稱之為老布爾塞維克的文庫）。」（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上册第二九頁）

以工人和貧農專政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工

農專政。正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你也許要說（在你的來信中確有這種意思），這是托洛斯基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革命底主張，但這種話和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對列寧時所說的話是一樣的。

列寧也早料及這一種攻擊，所以列寧說：

『托洛斯基的主張是：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着的，我們是不能把它丟開的。可是小資產階級有兩部分。最貧苦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是與無產階級一致的。』（列寧全集第二〇卷第三部第一一二頁。注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加米業夫同志的錯誤，也就是你現在的錯誤，就在於不瞭解兩部分小資產階級（這裏所指的是兩部分農民）之間的差別，不知道把最貧苦的一部分農民從全部農民羣衆中劃分出來，不知道黨的政策在一九一七年第一個革命階段過渡到第二個革命階段的時候應當建築在這個基礎上，不知道從這個基礎上提出是新口號，得出第二個黨的策畧上的口號——工人和貧農的專政。

我們現在且從列甯的著作中把工人與貧農專政的口號，自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的這一段實際歷史，仔仔細細地看一下。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列甯寫道：

『俄國目前時局的特徵，就在於它從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因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充分而使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權）過渡到革命的第二個階級，在這個階級上無產階級和最貧苦的一部分農民便應當把政權奪在自己手裏。』（參閱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二册第一七——七二八頁『列甯的四月提綱』）

)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列甯寫道：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在貧農幫助之下）。纔能克服資本家的反抗，使人民無代價的獲得土地引導民衆走完全的勝利——對飢荒，對戰爭的勝利，引導民衆走到正義和堅固的和平。』（列甯全集第一卷下冊第四二——四三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間，他寫道：

『只有領導貧農（即我們政綱上所說的半無產階級）底無產階級，纔能以民生的和平結束戰爭，醫好他的傷痕，急不容緩地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開步走——這就是我們現時的階級政策底定義。』

（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下冊第八二頁）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他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纔能克服資本家的反抗，表現出政權之真正偉大的勇氣和堅決性，才能保證他自己獲得兵士群衆和農民群衆之赤膽忠心奮命擁護的擁護。』（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下冊第一〇八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九，十月間，列甯著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叫作布爾塞維克能否堅持國家政權，在這本書中列甯與『新生活』派辯論道：

『或是一切政權歸資產階級——你們早已不擁護這個主張了，就是資產階級自己現在也不敢作這樣的妄想了。他們知道，八月二〇號和二一號的一次民衆運動就打落了這種政權，現在民衆的第二次打擊還更比前一次厲害得多。或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底聯合政府（聯盟

妥協) 因爲小資產階級不願意也不能夠獨立地掌握政權，一切革命的經驗都證明，經濟科學也同樣的證明，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他可以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也可以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但在中間無論如何是站立不住的。這個聯合政府在俄國會用盡千方萬計嘗試了半年，但終於是倒了台。最後，或是一切政權歸無產階級和貧農去反對資產階級，去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這還沒有試過，你們這班『新生活』派的先生們都竭力地阻止民衆這樣去幹，你們在資產階級面前嚇得混身打顫，你們還想拿你們這種恐懼的心理去恐嚇民衆。除了這三種政權以外，再想不出第四種來了。』（列甯全集第一四卷下冊二四八頁）這是事實。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的這一切歷史的事變和事實，你都『很巧妙地』忽畧過去了，你把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與蘇維埃內小康農民的動搖和妥協，作的鬭爭，都在布爾塞維克的歷史上『很巧妙地』一筆抹煞了，你把列甯的口號——工人和貧農的專政——也『很巧妙地』埋葬了，而且你還裝腔做勢地表示你沒有曲解歷史，也並沒有曲解列甯主義。

P 同志，從這些引証中（這樣的話我還可以從列甯全集中引証出許多來），你就應當明白，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出發點並不是聯合全體農民，而只是聯合農民中最貧苦的一部分，他們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的口號，並不是工農專政，而是工人和貧農的專政。

從這裏就可以明白，布爾塞維克在與蘇維埃的動搖和妥協作鬭爭的時候，及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作鬥爭的時候，曾實行這一個口

號。

從這裏就可以明白，沒有工人和貧農專政的這一個口號，我們就不能團集一支強大的政治軍隊去克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動搖和妥協，使一部分農民的動搖中立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及使資產階級革命有澈底完成之可能。

從這裏就可以知道，『我們在富農（也是農民）的反抗之下，在中農的動搖之下，與貧農共同一致地走到了十月革命，并獲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參閱我致楊同志的信）。

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及在十月革命的整個準備時期中，列寧的主張是正確的，而加米業夫的主張是不正確的，可是你現在又把加米業夫的主張復活起來，似乎墮入了一個不很好的夥伴中。

（二）你來信中所說的話，與上述的話完全相反，你引証了列寧的話，說我們在十月革命中取得政權的時候是有全體農民的幫助的。說到我們在全體農民某種幫助之下取得政權，這句話完全是正確的。可是你忘記了『一件事』；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之所以幫助我們，僅僅是因為我們能澈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這是很重要的『一件小事』，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你『忘記』這樣重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忽畧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P同志，這是為布爾塞維克所不允許的。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知道，你把列寧所說的全體農民幫助我們這句話與列寧所提出來的『工人貧農專政』這個黨的口號對立了起來。但是你如果要想把列寧的這句話與前面所引証的列寧的話對立起來，要想用你所引証的列寧這句話（全體農民的幫助）來推翻列寧的『工人貧農專

政』這個口號——至少，就必須證明兩點。

第一，必須證明，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列寧認為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是十月革命的『附帶的』產物，十月革命只是『附帶地』個決了這個任務。首先你就必須駁翻列寧的這一個見解，及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並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及將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的手中，而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P同志，請你且證明一下吧，只要你能把這一證明出來，我就一定承認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段時期內的口號，並不是工人和貧農的專政，而是工農的專政。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看出，你不敢冒這一種險，可是你還企圖『偷偷地』證明，在十月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上，和平問題上，我們曾得到了全體農民的幫助。這當然是不正確的。P同志，這完全是錯誤的。在和平問題上，你完全取了一種庸俗的觀點。事實上，那時候的和平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因為那時候只有把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的手裏，才能從帝國主義的戰爭中跑出來。你大概忘記了列寧的下面這一段話：『只有把政權過渡到一個階級的手裏，才可以完結戰爭』，『打倒戰爭——並不是拋棄自己手中的武器，而是要把政權過渡到另一個階段。』（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城代表會議上的講演，列寧全集第二〇卷，下冊一一二至一〇九頁，）

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或者你不能證明這點，那麼你就應當承認：全體農民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幫助我們，僅僅是因為我們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中及十月革命之後所以能夠取得全體農民的幫助只是因為他們徹

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中有系統地實行工人貧農專政的口號，在這個時期，並沒有系統地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作鬥爭，並沒有有系統地揭穿一部分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中的代表之動搖，（這些鬥爭都是由工人貧農專政這個新的口號發生的。）P同志，請你且證明上下，我們在十月革命中及十月革命後究竟我們爲什麼能夠獲得全體農民的幫助呢？因爲我們得到了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底可能。爲什麼我們得到了這樣的可能呢？因爲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只有它才能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爲什麼我們能夠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因爲我們是在工人貧農專政的階級之下，進行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因爲我們根據這個口號而與小產階級政黨妥協行爲作過有系統的鬥爭，因爲我們根據這個口號而與蘇維埃動搖作過有系統的鬥爭，因爲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之下，我們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消滅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建樹一支強大的政治軍隊，領導無產階級爭取政權底鬥爭。沒有這些決定十月革命運動的先決條件，我們在十月革命中及十月革命後，就決不能獲得全體農民的幫助，這是不言而喻的。

P同志，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底匯合，是應當這樣瞭解的。

所以你把全體農民在十月革命中和在十月革命後幫助我們這回事，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之工人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對立起來——就是表示你一點也不瞭解列甯主義。

P同志，你底基本錯誤，就在於何不瞭解在十月革命行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一相互錯綜，同時你也不瞭解從黨的第二個戰畧上的口號之

一工人貧農專政——所產生出來的個別革命要來之實現方法。

照你來信中的說法，似乎並不是我們獲得了農民對無產階級革命底幫助，而是『全體農民』（富農也包括在內）獲得了布爾塞維克的幫助。如果布爾塞維克肯這樣的輕地『幫助』非無產階級，那麼，布爾塞維克的事業也就糟了。

P 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時期中的加米業夫派的主張，把你的脚牽住了。

（三）你說斯大林沒有看到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與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環境之間底區別。這當然，不是鄭重的說法。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也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祇是在我的信中說過：一九〇五年所提出來的工農專政底口號，在一九一七年的二年革命中更得到了一次證實。這當然是對的。列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論工農一文中也曾經這樣說：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當時（指一九〇五思而言——斯大林註）我們階級政策底一個基本定義。這個定義確實是正確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更証實了這點。』（列甯全集第十同卷，下冊，八二頁）。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完全不按照『辯證法』，而只是強詞奪理的駁斥同志。

（四）你想要証明斯大林的話是自相矛盾的，你把斯大林論中農在十月革命之妥協一文與斯大林在『列甯主義問題』一書中所說的一段話（說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之後可以與中農共同建立社會主義）對立起來。我們不費

半點氣力就可以証明，把兩種不同的現象混合起來是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前，資產階級掌政時期中的中農，和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之後——當資產階級的財產已被褫奪，合作社已經發展起來，主要的生產工具已集在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的中農，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把這兩種中農混爲一談——就是站在歷史寰境的聯系之外觀察現象，就是迷失了一切遠景。這同季諾維夫倒顛時期，胡亂引証人家的話那種行爲很有點相象。如果這叫作『革命的辯証法』，那麼P同志真可謂『辯証』詐術的蓋世能手了。

（五）其他的問題，我在這裏不提起了，因爲我認爲在給楊同志的信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號

列寧和聯合中農問題

答S同志

S同志！

你說，列甯的口號：『要與中農妥協，一分鐘也不要放棄反對富農的鬥爭，祇是堅固的依靠在貧農身上。』（這是列甯在論沙羅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口號）

似乎是『貧農委員會』時期的口號，是『中農中立時期告終時』的口號，這種說法完全是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起來的。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我們在鄉村中的力量就已超過了富農，中農已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黨的中央正就在這個轉變的基礎上，提出了下列的決議：取消蘇維埃和貧農委員會間的兩權制，改選市鎮蘇維埃和鄉村蘇維埃，在新選的蘇維埃內解散貧農委員會，一句話講來，就是取消貧農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號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地通過了這個決議。此地我指的是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十一月九號所通過的改選市鎮蘇維埃，和鄉村蘇維埃及取消貧農委員會的決議。列甯的『沙羅金的有價值的承認』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提出與中農妥協的口號來代替使中農中立的口號）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這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號，即在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的兩星期之後，才發表的。列甯在這篇文章中很直捷了當地說，與中農妥協的政策是由於中農轉變到我們這方面來而採取的。列甯曾這樣說：

『我們在農村中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破壞剝削者和投機富農的反抗；要實現這些任務，我們只能堅固地依靠在半無產階級身上，依靠在貧農身上。可是中農並不是我們的敵人。是他過去是動搖

的。現在是動搖的，將來也是動搖的：影響動搖份子的任務，與打倒剝削階級，戰勝積極敵人之任務，完全不是一樣的。與中農妥協，一分諦也不要放棄反對富農的鬥爭，只是堅固地依靠在貧農身上——這就是目前的任務，因為現在由於上述的原因。中農必然要轉變到我們這方面來。』（向甯集第一五卷第五六四頁）

從這段話中可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列寧的這個口號：並不是舊的時期貧農委員會時期和中農中立時期的口號，而是新的時期——與中農妥協時期的口號。這個口號所反映的並不是舊時代的終局，而是新時代的開始。

可是你關於列寧這個口號的說法不僅在形式上是不正確的，不僅在時期方面是不正確的，而且在實質上也是不正確的。大家知道，列寧所提出來的與中農妥協的新口號，在黨的第八次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得到了全黨的贊許。大家知道，黨的第八次大會曾奠定了堅固聯合中農的政策之基礎。大家知道，蘇聯共產黨的黨綱也是在第八次大會上通過的。在這個黨綱中特別有一次講到黨對於農村中各種不同階層——貧農，中農，富農——的態度，在黨綱中關於農村中的社會階層和黨對於他們的態度是怎麼樣講的呢？聽聽下面的一段話吧。）

「聯共在它的全部農村工作中依舊依靠在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分子身上，首先把他們組織成爲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建立黨的支部，組織貧農；組織農村中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職工會等等，盡量地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起來。把他們從農村資產階級和小有產者利益

的影響之下脫出來，

黨對於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的反對他們的剝削傾向，克服他們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反抗。

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是要漸漸地有計劃地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中去。黨的任務是要把他們與富農分裂開來，仔細地關心到他們的需要，以思想上的說服的方法去消滅他的落後，漸漸地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切不可採用壓制的手段，凡是關連到他們切身利益的地方，都必須與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社會主義改造之實行的方法時，必須向他們讓步。』（黨第八次大會記錄第五三頁。本文印時，稍有縮小。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黨綱上這幾段話和列甯的口號之間，請你且找出半點差別來吧！老實告訴你，這裏半點差別也找不出來的，因為在宇宙間根本沒有這一個差別。而且毫無疑義的，列甯的口號不僅不與第八次大會的中農問題決議案沒有一點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列甯的口號是這些決議案一個最確當的說法聯邦共產黨的黨綱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特別討論中農問題的第八次大會上通過的，而列甯提出與中農妥協的口號的那篇反對沙羅金的文章，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八次大會前四個月）發表的，這完全是事實。

黨的第八次大會完全批准了列甯的這一個口號（在他的反對沙羅金的文章中提出的），作為黨在現在這一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的農村工作的指南，難道這還不明顯麼？

列甯這一個口號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這一個口號的實質就是他把黨的農村工作的三個連帶的任務，很巧妙地總括在一個簡明的公式中：（甲）依靠貧農；（乙）與中農妥協；（丙）一分鐘也不停止與富農鬥爭。如果從這個公式中抽出一部分來作為現時農村工作的基礎，而忘記這個公式中的其餘的部分——你就必然要跑到絕路上去。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時期中若不依靠貧農，不反對富農，可不可以與中農切實地、堅固地聯合起來呢？不可以的。若不依靠貧農，與中農妥協在現在發展的階段能不與富農進行勝利的鬥爭呢？怎麼樣才能把黨的農村工作的三個連帶的任務，最確當地包括在一個總的口號中呢？我認為列寧的口號是這三個任務的一個最簡明而適當的結晶體。我想，再沒有比這個更適當的口號了。

為什麼在現在，在農村工作的現時的實境中，必須特別指出列寧這一口號的適當呢？

因為，現在我們看看有些同志，發生一種趨向要把這三個連帶的任務拆開來，互相分裂起來。在今年一二月收買麥子的運動中已完全証明了這件事實。我們應當聯合中農，這是全體多數黨員都知道的。但是怎麼樣去聯合中農，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了。有些人認為聯合中農應當停止與富農鬥爭，或減弱這種鬥爭，因為與富農鬥爭就會嚇退一部分富裕的中農。又有些人以為聯合中農就應當拋棄組織貧農的工作，或減弱這種工作，因為組織貧農的工作，就要使貧農形成一個特殊階層，這樣就會嚇退中農，使中農離開我們。這種說法，都完全離開了正確的路線，結果他們便忘記了下列的馬克斯主義的定義：中農是一個動搖階級，祇有在堅決的反對富農，和加緊貧農工作的條件之下，才能堅決的聯合中農，沒有這些條件，中

農就會動搖到富農方面去動搖到有力的方面去。列甯在黨第八次大會上曾這樣說道：

「對於沒有固定地位的階級必須確定一種固定的關係。無產階級在群眾中是主張社會主義的，資階級在群眾中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很容易外定的。可是中農是一種動搖不定的階級。他一方面是有產者，他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不剝削他人的勞動。他在幾十年以來都是千辛萬苦地在勉強維持着他的地位，他受盡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他是被剝削者，同時他又是無產者。因此我們對於這一個動搖階級的關係是很難確定的。」（聯共第八次大會記錄第三〇〇頁）

此外還有其他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并不比前兩種傾向小一些。譬如，有些人雖然是在與富農鬥爭，可是他們的鬥爭是很鬆懶而無聊的。而且鬥爭的火力都打在中農和貧農頭上。結果，富農仍安然無恙；而與中農聯合的事實倒地進行反發生了阻礙，一部分貧農暫時地落到富農的爪牙之下，讓富農密祕蘇維埃政策的鬥爭。還有一種人，他們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成撲滅富農，收買麥子的工作變成徵收糧食的工作，他們忘記；撲滅富農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之下是一種愚蠢的舉動，而徵收糧食并不是與中農聯合，而是與中農鬥爭。

爲什麼會發生這一種不正確的傾向呢？

就是由於不瞭解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三位一體的任務，是整個的不可分離的任務。就是由於不瞭解與富農鬥爭的任務，是不能和中農妥協的任務拆開來的，同時這兩個任務也是決不能和變貧農爲黨在農村中的柱石這一個任

務分裂開來的。(註)

同是我在這裏也不得不順便地指出，我們報的章雜誌也不時刻注意到這個原則，有時往往表現片面的觀察事情。例如，有的報紙痛斥那些想把黨在收集麥子方面所採取的非常手段變成黨的經常政策傾向，以威嚇工農的聯合，這是很好的。可是最不好的和錯誤的就是他們只顧到一方面，同時沒有充分注意到而且也沒有痛斥另一種威嚇工農聯合的傾向——爲小資產階級自發性所迷惑而要求削弱與鄉村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宣告商業的完全自由，取消國家的調節作用，因此從另一頭破壞工農聯合。這樣就錯誤了。這就是叫做片面的觀察事情。

還有些報章，時常攻擊那種否認提高小農和中農個別經濟之可能與有益的傾向。這是很對的。可是他們同時不去攻擊另一種傾向——輕視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意義，不知道除了提高小農中農個別經濟的任務之外，還應當加上提高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實際任務這也是叫做片面的觀察事情。

(註) 由此可知離開正確的路綫就可以造成兩種對於工農的聯合事業的危險傾向：譬如一方面的危險，有些人想把收積麥子時所採取的暫時的非常手段變爲黨的經常的長期的政策，另一方面的危險，就是有些人想利用全消非常手段這一種機會，來放任富農，宣佈商業的完全自由，不必經過國家商業機關底調節。因此，爲保障黨的正確路綫起見，必須要在兩條戰綫上作鬥爭。要保障正確的路綫 就必須在兩條戰綫上鬥爭，並且必須拋棄一切片面觀察問題的觀點。

怎樣才能使這些任務在我們日常的農村工作中互相

連貫起來呢？

要達到這一點，至少就必需要有一個總領導的口號，把這些任務包括在這一個總的口號中，才能使這些任務互相連貫起來。

在我們黨的軍械庫中有沒有這樣一個總的公式，這樣一個總的口號呢？

有的。此種公式就是列甯的口號：『要與中人妥協，一分鐘也不要忘記與富農鬥爭，堅固的依靠在貧農身上』。

因此我想認為這個口號是一個最適當的包羅一切的口號，特別在現時這種農村工作的條件之下，必須把這個口號提到第一位。

你認為列甯這個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在你的來信中問道：『爲什麼這個反對派的口號竟能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號的真理報上公然發表出來，爲什麼這個口號竟能出現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篇幅上？這是排印上的錯誤呢？還是在中農間與上與反對派妥協呢？』話是說得很嚴重的——還有什麼可說的！可是S同志，在『轉灣』的時候，我總希望你謹慎一點：請你最好不要這樣鹵莽地做出一個結論，要禁止發表我們的黨綱，要知道這個黨綱完全批准了列甯的口號（這是事實啊！）是列甯親手起草（他並不是反對派），黨的第八次大會（也並不是反對派）所通過的。請你對於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社會階層這一項看得尊重一點！你對於第八次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也得多尊重一點！……你說『這個口號就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這句話是不值一駁的，這句話大概是你一時的氣話。

在列甯的口號和第八次大會所通過的政綱中所說的

是與中農妥協，而列甯在第八次大會的開幕詞中却說堅固的聯合中農，這一點也許是擾亂了你的心田。大概你以爲這是一種矛盾。你大概以爲與中農妥協的政策是違背聯合中農的政策。S同志 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這完全是迷昏了頭腦。只有那些只會讀口號的字眼而不會思索口號的意義的人，才能這樣想着。只有那些不知道聯合中農，與中農妥協這個口號的歷史的人，才能這樣着想。只有那些憑空以爲列甯在第八次大會的開幕詞中說要「堅固地聯合中農」是與他在同一次大會上和該大會所通過的政綱中說要與中農妥協是自相矛盾的人，才能這樣着想。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是因爲列甯和整個蘇聯共產黨（以第八次大會爲代表）認爲「聯合」與「妥協」這兩個字的字義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爲列甯在第八次大會上的一切講演中認爲「聯合」與「妥協」這兩字完全是相等的。在第八次的大會「關於黨對中農態度」這一個決議案中也同樣把「妥協」和「聯合」兩個字看作意義相等的兩個字。因爲列甯和我們的黨認爲與中農妥協的政策並不是偶然的短時期的政策，而是長時期的政策，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與中農妥協的政策，就是堅固聯合中農的政策，反過來說，堅固聯合中農的政策，就是與中農妥協的政策。你如果不相信，最好請你把第八次大會的記錄和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案，好好的去讀一下。

這就是列甯在第八次大會上所講的話：

「由於蘇維埃工作人員的缺乏經驗，和問題本身的困難，往往使那些本來應當加於富農身上的打擊，都打到中農身上，我們在這方面犯了非常重大

的錯誤。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已收集了一些經驗，這些經驗可以幫助我們以後去避免這種錯誤，這是我們面前一個很重要的實際任務而不是理論的任務。你們也很知道，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我們現在還沒有很大的物質上的幸福可以給予中農，而中農是一個實際的唯物主義者，他們需要具體的物質上的幸福，可是我們現在還不能給予他們，我們的國家還要在缺乏物質幸福的情形之下過活，或者還要幾個月的艱苦鬥爭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但我們在行政的實際工作中可以做到許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許多浪費的現象。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矯正我們黨的路綫，因為我們的黨，過去並沒有充分的與中農聯合，與中農妥協。（第八次大會記錄第二十頁）。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列甯並沒有在「妥協」與「聯合」之間分出區別來。

下面就是從第八次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案中摘出來的一段話：

「把中農與富農混雜起來，把反對富農的手段，或多或少地推廣的應用到中農身上去，——這不僅大大的違背了蘇維埃政府的一切訓令和政策，而且違背了共產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無產階級在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堅決鬥爭的時期中與中農妥協，是順利地走向消滅一切剝削底條件之一。

中農有比較鞏固的經濟根源，由於農村經濟的技術比工業落後（甚至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俄國更不用說）的緣故，所以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之後還可以堅持很長久的時候。因此，蘇維埃農村工作人員和我們黨的工作人員底策畧，

應當建築在與中農長期合作的基礎上。……
…因此，只有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正確的政策，
才能完全保證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合和妥協
。……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在現在和將來，應當
根據無產階級和貧農與中農的妥協這種精神去進行
。』(第八次大會記錄三七七二頁)。

可見，決議案也並沒有在『妥協』和『聯合』兩個
字之間分出什麼區別來。

在第八次大會的這個決議中一個字也沒有說到堅固
聯合中農。但這是否就是證明這個決議案違背『堅固聯
合』中農的政策呢？不，決不能這樣說。這只是證明：
決議案完全把『妥協』『合作』和『堅固聯合』三個名詞
看作意義相等的三個名詞。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不與中農
『妥協』，就不會與中農『聯合』，不與中農作『長期』的妥協
和合作，也就不能與中農作『堅固』的聯合。這點我認為
也有指出的必要。事實就是這樣。

兩者之間，必取其一：或者是列甯第八次大會違背
了列甯自己所說的『堅固聯合中農』的話或者你應當拋棄這
種無謂的設想，並承認列甯是和第八次大會並沒有在『妥
協』和『堅固聯合』這兩個名詞中間分出任何區別。

誰不願意做一個只講空字面的犧牲者，誰願意思考
列甯這一個口號——依靠貧農，與中農妥協，與富農鬥爭——
的意義，誰就不難瞭解與中農妥協政策就是堅固聯合
中農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了解反對派的詭計，而上了
他們的當，致陷入他們替你設的陷阱。那些反對派的騙
子們大嚷大鬧地訴說以他們是贊成列甯關於與中農妥協這

一個口號的，可是他們同時又用挑釁的方法暗示『妥協』與『堅固的聯合』是兩回不同的事。這完全是他們用的一箭射雙貂的計策：第一，隱藏他們對於中農問題真正的主張（實際上他們并不主張與中農妥協，而是與中農分裂——參閱我在十六次莫斯科省的臨時會議上所引証的反對派斯密爾諾夫的講演。）第二，虛構『妥協』和『聯合』之間的區別，來欺騙那些頭腦簡單的布爾維克，恐嚇他們，使他們離開列寧路線。

可是我們有些同志怎麼樣對付這種詭計呢？他們不但不能揭破反對派騙子們的假面具，暴露反派對的真正欺騙黨的主張，反而自己爬到反對派所設的陷阱中去，使自己離開列寧的路綫。如果反對派喊着列寧的口號，自命爲列寧口號的擁護者——那麼我就應當離開這個口號，使我不同反對派混淆起來，否則人家就可以侮蔑我『與反對派妥協』——這班同志的邏輯就是這樣。

反對派的詭計還不止如此。例如，自我批評的口號。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們黨的行動的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布爾塞維克訓練幹部人才的主要方法。可是反對派却故意製造出空氣來，說自我批評的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口號，黨把這個口號從他們手裏拿過來，投降了他們反對派。反對派的這個計策有兩種目的：第一，他們想騙工農群眾，遮蓋反對派的自我批評（目的是在破壞黨內的團結）與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目的是在鞏固黨內的團結）之間的鴻溝；第二，使那些頭腦簡單的同志跑進他們的圈套，及迫使他們離開黨的自我批評的口號。

我們有些同志怎麼樣對付這一種詭計呢？他們不但不去揭破反對派的騙子們的假面具，堅持布爾什維克的

自我批評的口號——他們不但不這樣，反而爬進了反對派所設的圈套，離開自我批評的口號，在反對派的鼓樂聲中跳舞起來，投降在反對派的面前，自己還很錯誤地以為是在離開反對派。

這種的例子，不勝枚舉。

但我們在工作中決不能在人家的鼓樂聲中跳舞。而且更不可以根據反對派對付我們的話作為工作的指南。

我們應當走我們自己的路，掃除反對派的詭計和我們那些上了反對派圈套的同志的錯誤。請你牢記下面這一句馬克思的話罷：「不顧旁人的議論，要堅定地走你自己的路」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號

(登在同年七月三號的一二五號真理報上)

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

斯 達 林

——斯達林同志在聯共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
上的演說——

一 五年計劃的國際重要性

同志們！當我們公佈五年計劃的時候，很少有人認識五年計劃偉大的國際重要性。恰恰相反，許多人以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的私事，這事體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嚴重的，但他不過是蘇聯自己國內的私事。

但是歷史顯示了五年計劃的國際意義是不可測量的。歷史已經表現了五年計劃並不是蘇聯的私事，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事體。

遠在五年計劃出現以前，那時我們剛剛完成了反抗干涉主義者的戰爭而進行經濟的建設，在那時列甯便已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具有深刻的國際重要性，蘇維埃政權於經濟建設中所採取的每一個前進步驟，都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內各階層的強烈的回聲，把人類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的，另一個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

列甯說：

「現在我們影響世界革命，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每個人都望着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內的全體勞動者，沒有例外，也沒有誇大。這種事現在已經實現了。在這一方面，這種鬭爭已經具有世界範圍。假使在這一工作中我們能獲得勝利，那麼，我們最終一定能在全世界範圍上得到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具有特別的

重要性。在這一條戰線上，我們要緩緩的，逐漸的爭取勝利——這是不能很快地做得到的一——只能切實地向前和向上推進。（列甯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第三版，四百十頁）

列甯說這些話的時候正是我們正在結束反對干涉主義者的戰爭，由武裝鬥爭轉到經濟戰線上的鬥爭反對資本主義，轉到經濟建設時期。

從那時起經過了許多年，在這個時期內、每季，每年，蘇維埃政府在經濟建設領域內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顯明地証明了列甯所說的這些話是正確的。

但是最顯然地証實列甯的這些說法的正確性，要算是建設的五年計劃——這計劃的來源，他的發展和他的實現。事實上，好像我們在我們國家進行經濟建設所採取的步驟中，沒有一個如五年計劃的問題及其發展與實現一樣，引起了歐美亞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各階層中這樣的回響。

其初，資產階級及其報紙，對五年計劃加以嘲笑。他們暗指我們的五年計劃為「妄想」，「惡夢」，「烏托邦」。

後來事情很明白了，五市計劃的實施，產生了具體的結果，他們這些人便發出警報，說五年計劃威脅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生存，說五年計劃的實現會要使歐洲市場上的貨物充斥起來，傾銷增加，失業擴大。再過了多日，反對蘇聯政府的這種陰謀詐術，並沒有發生所期望的結果，於是各公司商店各報館各公團派遣了各種代表到蘇聯去考查，以使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那裏的實況。在這裏，我不是說工人代表團。一直從五年計劃的最初的開始，工人代表團就表現他們對於這一計劃開始的熱情，預祝蘇

聯完全成功，并且表示完全擁護蘇聯的工人階級。

從此以後，在所謂輿論中，在資產階級各種報紙上，各種公團內，起了一個分裂。有的人說：五年計劃完全失敗了，布爾什維克快要垮台；另一方面，又有人發出相反的論調，說布爾什維克雖然是一羣壞蛋，但是他們的五年計劃似乎成功了，并且很顯然的，布爾什維克要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這裏我引用代表各種見解的資產階級的報紙所表示的意見，這或許對於我們不無補益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紐約時報」說：

「一個五年工業計劃，絲毫不顧到比例性，而想如莫斯科時時自豪的所謂「不惜任何代價」達到目的。這個計劃實際上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個冒險以圖僥倖的賭博。」

因此，你們可以知道，五年計劃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場賭博！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每日電訊」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說：

「作為計劃經濟的一種實際嘗試，這個計劃是十分顯然的失敗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說：

「自然，集體化運動是一個悲慘的失敗。使俄國瀕於兇荒。」

一九三二年夏季波蘭的資產階級報紙「波蘭公報」說：

「目前的形勢似乎表顯了蘇維埃政府，因實行農村集體化的政策，已經把他自己驅逐到「此路不通」的絕境。」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國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時報」說；

「因為實行他們的政策的結果，斯達林和他的黨遇到了五年計劃制度的破產，五年計劃所想達到的目的成了幻想。」

意大利的「政治報」說：

「說一個有一萬萬六千萬人民的國家四年的工作毫無成績，說布爾什維克統治所代表的這樣一個大的政權在四年中經濟上和政治上超人的努力毫無成績，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過那裏仍然有一個災難。這是一個對任何人都很明顯的事實。朋友和敵人，布爾什維克和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人，左翼和右翼的反對派等都認識這一事實。」

美國資產階級雜誌「現代歷史」一九三二年十月號

說：

「我們只要檢閱目前俄國的現狀，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所宣佈的統計目的方面，特別是在一些根本的社會原則方面，五年計劃是失敗了。」

這些著者的意見，毫無批評的價值。我認為沒有批評的價值，因為這些「頑固者」屬於中世紀時代的化石類，不管我們如何執行我們的五年計劃，他們仍然是要重述他們的意見。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從資產階級營壘內發出的另一報紙的意見。

在這兒，法國最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說：

「在第一回中，蘇聯已經得了勝利。蘇聯正

在進行工業化，沒有外國資本的幫助。」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時報」又說：

「共產主義以極大的步伐完成改造工作，而資本主義制度只能緩緩的進步。……在法國，土地到分爲無數歸個人所有，因此農業不能機械化。蘇維埃因實行農業工業化，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在與我們競爭中，布爾什維克已經勝利了。」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圓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十九期上說：

「在五年計劃下所獲得的發展是很驚人的。

卡可夫和斯達林格拉的曳引機廠，莫斯科的拉摩汽車廠，下諾弗哥羅的福特車廠，第聶泊洛水電廠，西伯利亞麥尼托哥兒斯克與古勒次克的大鋼廠，烏拉兒機器廠化學廠網（烏拉兒將成爲俄國的魯耳）——這些和全國其他的工業成績，證明了俄國的工業雖有種種缺點和困難，無論在健康上，在體積上和力量上都是在繼續生長，已經替未來的發展建立了基礎。從俄國的觀點上特別重要的是俄國已經大大地加強了他的戰鬥力。」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金融新聞」一九三二六月六日

說：

「關於機器建設的進步是沒有人可以懷疑的。報紙上，講壇上大吹大擂的宣傳這種進步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必須記着……自然俄國生產機器和工具，不過這些機器和工具是最簡單的種類……。」

「真的，在絕對數字中，機器和工具的輸入是在實際的增加，但是輸入機器和國內自製機器的比

例是切實的減少……○」

「俄國今日在生產他的五金業與電氣業工業所需要的一切機械。他已經建立了他自己的汽車工業，建設了工具製造的工業，從小的簡單的器械到複雜的機器。而且在農業機械方面，蘇聯可以脫離外國輸入品而獨立。」

「他們也不認為一些基本工業（如鐵煤）生產量的遲緩其嚴重的程度足以妨害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有一件事是確實的：現在正在建設中的大工廠足以保證重工業出產量大大的增加。」

奧國的資產階級報紙「Neue Presse」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廿七日說：

「我們可以咀罵布爾什維主義，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布爾什維主義。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巨像，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點，特別是在經濟方面估量到這點。」

英國資本家加維（他是聯合屬國銀行的行長）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說：

「我要聲明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我切實是一個資本家，一個個人主義者。俄國正在向前猛進，然而我們國內許多工廠停了業，三百萬的人在拚命的找工作。人們對於五年計劃加以嘲笑並且預言五年計劃要失敗。」

但是你們可以相信五年計劃條件之下，所做的工作多於所計劃的。在我所參觀的一切工業城市中，新的區域正在產生，這些新區域的建築是根據一定計劃，有很寬的街道，有樹木，有廣場，有最近代式的房屋，有學校，醫院，工人俱樂部，有照料

工人兒童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不要輕視俄國的計劃，不要妄想蘇維埃政府會失敗。……現在的俄國是一個有靈魂，有一個理想的國家。俄國是一個驚人活躍的國家。我相信俄國的志願是正確的。不過最重要的事是俄國全體青年和工人有一種爲今日資本主義國家不幸缺乏的東西，這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的雜誌「國家」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說：

「五年計劃的四年已經真正地見到了特別的發展。俄國正在用戰時的強度來建設一個新生命的物體的社會的模型。這個國家的面孔已經改變到令人不認識。莫斯科有成百的街道與廣場，在莫斯科的郊外有新的外市，新的建築，一羣新工廠。其他比較不重要的城市也是如此。從大草原中，從荒涼曠野中，從沙漠中已經出現了新的城市，不僅是幾個城市，在過去四年中至少有五十個這樣的城市，每個城市有五萬到二十五萬人民，每一個城市是建築在某一種企業的附近，開發某種天然的富源。成百數的電力站，還有一些大的發電廠如第聶伯洛等正在實現列寧的公式：電氣如蘇維埃等於社會主義。」

「蘇聯現在努力大規模的製造俄國以前從未生產過的物品——曳引機，複合機，高度鋼軌，人造橡皮，高力地什爾摩托，五萬基羅瓦特渦輪，電話交換器，電力採鑛機，飛機，汽車，貨車，腳踏車，電力銲接機，及其他數百種新機器……。」

「俄國開採鋁，鎂，碘，磷灰石，木炭，及許

多寶貴鑛產，這是第一次。

「現在蘇維埃農村的標誌不是一個富麗的教堂的圓頂，而是穀物起重機和穀物保藏棧。集體農場的人正在建築養豬所，倉庫，房屋。電氣正在侵入愚蒙的鄉村，無線電及報紙已經征服了這種鄉村。工人們正在學習操縱世界上最近代的機器，農民的兒童們製造和使用比在美國看見的更大的複雜的農業機械。

「俄國已經變成了機器熱了。俄國正在很快地由木的時代轉變到鋼，鐵，三合土與摩托的時代。」英國左派改良主義的「前進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說：

「沒有一個人會看不見正在進行中的偉大建築工作。

新工廠，新影院，新學校，新餐館，新俱樂部，整幢新的大共同住宅，每一個地方都有新的建築物，許多已經完成了，其他的則才建立起骨架。

「我們很難使英國的讀者認識在俄國已經做了的工作和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

「一定要親眼看過才會相信。我們在戰時的努力同俄國已經完成的工作相比真是渺小不足道。

美國人承認就是在西方最忙的日子也不能有像俄國現在正在進行的狂熱建築工作。

「在兩年後在俄國我們就看見了這許多變遷，因此我們簡直不能料想到再過十年後俄國將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我勸你們忘記那些英國報紙所說的謊謬驚的故事，英國的報紙關於俄國的事情總是頑固地

聳然地。可鄙地造謠。我們你們忘記那些一知半解的學院知識階級所傳播的半真理和誤解，這些知識階級從他們的上等的中等階級的眼鏡中去看俄國，他們很瞧不起俄國，其實他一點兒也不了解俄國現時正在進行着的事。……

「俄國正在依着根本正確健全的路線建設一個新社會。爲了要進行這一工作，俄國正在冒許多危險，正在以世界上未見過的力量來熱烈的工作，他犯了錯誤，並且用辛苦來補救這些錯誤，他必須克服極大的困難，這種困難是與企圖在一個廣大，未開化，脫離世界而孤立的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不能分開的。在兩年後我參觀俄國所得的印象是：俄國正在空實的進步，計劃，創造，建設，向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挑戰。」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資產階級營壘中的紛爭與分裂。有的大吹大擂的說五年計劃失敗了，蘇聯要死亡；但是另外有些人顯然贊成和蘇聯維持商務合作，很明顯的，他們打算可以後五年計劃的成功中取得若干利益的緣故。

特別的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對於蘇聯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的關係。這裡只引述每年來到蘇聯的許多工人代表團中的一個宣言，比如比利時工人代表團。這個宣言，可以代表每個工人代表團，不管他是英國的，或法國的，或美國的，或德國的，或來自其他國家的。這個宣言說：

「我們十分高興在我們旅行期中看見了偉大的建設工作。在莫斯科，馬喀越府喀，戈羅府喀，哈爾可夫，列甯格勒，我們能証明他們用什麼熱忱在那兒工作。一切機器，都是最新式的模型。」

工廠中到處清潔可愛。空氣光線，都很充分。我們親見蘇聯工人受了怎樣的醫藥。工人住處，建築在工廠的附近。學校與托兒所，都設立於工人區域。對於照料小孩們予以極大的注意。我們見到舊式與新式工廠的不同。舊式與新式住房的差別。我們所見到的，很明白地表示工人羣衆是以絕大的能力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來建設新的社會。我們在蘇聯看見了偉大的文化進步，而在其餘的一切國家，一切都在沒落的狀態中，失業瘋狂般地增加着。也是我們也看見了蘇聯勞苦羣衆在路途上所遭遇的巨大困難。我們更了解他們指出其勝利時的那種洋洋得意的情形。我們深信他們正在克服一切障礙。」

這就是五年計劃的國際重要性。兩三年內所做出來的建設工作，使五年計劃產生了初步的成功，把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方面站立着不斷地咀咒我們的人，另一面站立着見我們五年計劃勝利而恐慌的人。此外還有存在於全世界的我們自己的營壘，正在繼續增加他的力量，——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營壘，這一工人階級對於蘇聯無產階級的成功是歡欣鼓舞的，並且是準備擁護他的，這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見了害怕。

這是什麼意義？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勝利與成績的國際重要性是沒有疑慮的。這就是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正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孕育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要從五年計劃的「所謂」失敗找得新的論據，來反對革命。同時，無產階級在另一面正在從五年計劃的成功，找得新的論據來擁護革命反對整個世界的資產階

級。

五年計劃的成功，動員一切國家內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來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無疑地，五年計劃的國際革命意義，是確實不可測量的。所以我們對於五年計劃，對與其實質與基本任務，必須予以極大的注意。我們必須很仔細地分析五年計劃的結果，分析執行和實現五年計劃的結果。

二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與其實現方法

現在我們來提出五年計劃的實質這個問題。五年計劃是什麼呢？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使我們的國家，從落後的有時是中世紀的技術，走向新式現代技術的道路。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從一個脆弱的倚賴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而不依賴世界資本主義。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蘇聯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完全驅逐資本主義的原素，擴大經濟的社會主義形式的陣線，建立廢除蘇聯內各階級的經濟基礎，建立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我們國內建立一種工業，能夠於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不僅改造整個工業而予以新的設備，並且改造交通與農業。

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把小規模的散漫的農業。轉到大規模的集體的經濟，這樣便可於農村中樹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為不可能。

最後。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於國內創立絕對必須的技術上的與經濟的種種前提，來增加保衛國家的防禦能力到極大的限度，務必擔保外來的武裝干涉，外來的軍

專進攻的任何企圖，都受堅決的擊退。

這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取決於什麼呢？五年計劃後面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是由於必須消滅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的落後，這一落後注定了蘇聯的無意義的存在。這是由於必須在國內創立種種先決條件，使蘇聯在技術上與經濟上不僅能夠趕上而且及時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以為蘇維埃政權不能長期維持自己於落後工業的基礎上，只有最新的大工業，祇有不僅不落後而且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的那種大工業，才能成為蘇維埃政權的穩固基礎。

我以為蘇維埃政權不能長期站立於兩個矛盾的基礎上，一個是摧毀資本主義原素的社會主義式的大工業，另一個是產生資本主義原素的個人的小農經濟。

我以為從小農經濟決不能建立大生產的基礎，小農莊如果不聯合成為大的集體農莊，那末，蘇聯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是成為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際的危險。

列甯說過：

「革命的結果，俄國在幾個月內在政治制度上趕上了最先進的國家。但是這是不夠的。戰爭是堅決不容情的，他無情地提出了兩個辦法：或是在經濟上趕上最先進的國家並且超過他們，或是滅亡；或者是猛力上前，或者是滅亡。這是歷史所提出的問題。」

列甯說過：「祇要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則在俄國，便存在着於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只有全國電氣化了，只有工業農業交通獲得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了，那時我們才能够獲得最後地勝利。」

列甯說的這些話，成爲黨的基本見解，來制定五年計劃與決定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

但是我們不能亂七八糟地來執行這個偉大的計劃。

爲要實行這個計劃，我們必須首先找出這個計劃中主要的一環，只有找到和抓住這主要的一環，我們才能推進這個計劃中其他的許多環。

五年計劃中的主要環是什麼呢？

五年計劃的主要環。是重工業，以建設機器爲中心。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改造工業的全部，交通與農業，使他們都能够自立。因此恢復重工業是執行五年計劃的基礎。

在這方面，我他也有列甯的指示。列甯說：

「能够救俄國的不單是農民田莊的豐收。那是不夠的。也不單是輕工業的好狀況，把消費者的商品供給農民。那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重工業。不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不能建設任何種的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將要滅亡而不能稱爲一個獨立的國家。……重工業需要政府的津貼補助。假使我們不能找到政府津貼，我們不能稱爲一個文明的國家，更談不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俄文列甯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三四九頁）

但是重工業的改造與發展，尤其是在我們落後的不富足的國家內，成爲一個很困難的工作，因爲大家都知道，重工業需要鉅大的財政資金與最低限度的有經驗的技術人員的存在，沒有這個，重工業是簡直不可能的。黨知道這點麼？考慮到這點麼？是的，黨知道這點。他不但知道這點，而且大聲疾呼地喊出來了。黨知道英德

美的重工業是如何建立的。黨知道這些國家內重工業的建立，是得到大借款的幫助，或由於劫掠別的國家，或同時採用這兩種方法。黨知道我國不能採用這些方法。那末它打算依靠什麼呢。他依靠我們自己國內的力量。

他記着：我們握住蘇維埃政權，又以土地，工業，交通，銀行，貿易的國有為後援，能夠執行嚴格的節儉政策，以便籌集改造與發展重工業所必須的資金。黨曾經十分公開地說過：這一工作需要重大的犧牲，假使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黨打算依賴國內的力量來進行這一工作，不需要奴隸我們的信用借款與外債。

在這一點上，列甯說：

「我們必須努力建設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內要保持工人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的信任。以極大的節儉剷除他們的社會關係中的每一個奢侈的痕跡。

「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機關變為極端的節省，我們要肅清帝俄時代官僚資本家機關所遺留的每一個奢侈的痕跡。

「這不會變成一個農民狹窄心理的王國嗎？」

「否，假使我們能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在政府的管理中採取極大的節省政策，那麼我們一定能使每一點儲蓄——不管是如何的小——都用來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水電，完成窩爾加阿赫斯特羅依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是在這兒。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換馬」，以一個破碎農民國家內所需要的貧困的經濟馬來換無產階級所尋求的馬——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等等的馬。」（列甯全集二十七卷，第四

一七頁)

從一匹貧窮的馬換為一匹大機器工業馬，這就是黨在進行五年計劃中所追求，所努力的目的。

實行極端的節儉制度，籌集必須要的款項來進行我國工業化，這是恢復重工業與完成五年計劃所必須走的道路。

這是大膽的工作麼？ 困苦的道路麼？ 但是我們的黨是稱為列寧主義的黨，因為他沒有害怕困難的權利。

黨是十分相信五年計劃的可能性，十分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所以他覺得在四年內可以完成五年計劃這個困難工作，確切點說，假如我們加上「特別季」，便是四年零三個月完成的。

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有名的口號。

結果是怎樣呢？ 事實證明了黨是正確的。事實證明了假若沒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假若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黨是不能夠得這個我們可以自豪而無愧的勝利。

三 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現在我們講到實現五年計劃的問題。

在工業範圍內，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領域內得到了勝利麼？ 得到了。我們不僅得到了勝利，而且超過了我們自己所希望的，甚至超過了最熱心的黨員所希望的。現在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否認。至於我們的朋友更不用說了。

從前沒有鐵和鋼工業作為我們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電話機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汽車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機

器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健全化學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生產現代農業機械的真正重要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沒有航空工業，現在有了。

從前關於電力的生產，我們占末了的一位，現在却進到第一等位置中的一個了。

從前關於油與煤的生產，我們占末了一位，現在進到第一等位置中的一個了。

從前祇有一個煤鐵根據地，即烏克蘭，我們尚不能完全利用他。現在擴大了這個基礎。並且在東方建立了一新的煤鐵基礎，算是我們國家足以自豪的。

從前只是我國的北方只有幾個紡織業的中心，現在却建立了兩個新的中心，一個在中央亞細亞，另一個在東西伯利亞。

我國不僅創立了這些巨大的新的工業部門，而且發展他們到這樣的程度，和這樣的大的範圍，簡直令歐洲的工業相形見绌。

這一切的結果，使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原素數遠被剷除而不能復活，使社會主義工業成爲蘇聯工業的唯一形式。

這一切把我們的國家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一個工業國家，因爲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比重，從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八，增加到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終了時的百分之七十。

這一切使我們在五年計劃的第四年能够完成五年工業生產的全部的百分之九三，七。工業生產比戰前增加三倍以上，比一九二八年增加兩倍以上。關於重工業的

生產量的計劃，我們完成了五年計劃百分之一〇八。是的，五年計劃的整個計劃，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這是由於鄰國拒絕和我們簽定不侵犯條約，並且遠東的糾紛日趨嚴重，我們不得不把某幾種企業儘可能地迅速地改造現代的防禦武器，來增厚我們的防禦力。

因情勢的需要，使我們不得不作某種準備，使有些工廠停止製造生產品，經歷四個月的時光，因此影響了一九三二年五年計劃的總生產的完成。這一改變的結果，完全補足了國防能力上的缺憾。但對於完成五年計劃的生產計劃，確有一個不良的影響。假如不是有了這一意外的情況，我們不但完成了計劃上的數字而且超過了他。

最後，這一切把蘇聯從一個虛弱的，毫無防禦力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防禦力強大的國家，一個準備應付任何事變的國家，一個在外來攻擊時能大量生產一切近代防禦武器供給他自己的軍隊的國家。

在工業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大概如此。

你們自己判斷一下：資產階級報紙說五年計劃在工業領域內「失敗」了，到底有什麼價值呢？資本主義各國，現在是怎樣呢？他們關於工業生產的發展，目前感受極銳利的危機。在這方面，有大家知道的官場統計：

在一九三二年的末了，蘇聯的工業生產，是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三四，在同一的時期，美國的工業生產降到戰前水準百分之八四，英國降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到百分之六二。一九三二年末，蘇聯的工業生產增加到一九二八年水準百分之二一九，美國的降到百分之五六，英國的降到百分之八〇，德國的降到百分之五五，波蘭的降到百分之五四。

這些數字，不過指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業，在和蘇維埃制度的比賽中，經不起試金石的試驗：蘇維埃制度下的工業，享有優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優點。他們向我們說：這一切都是很好的，許多新工廠已經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也建立了，不過放棄工業化的政策，放棄擴大生產手段的生產的政策，成至少延緩這個工作到較後的階段，以便生產更多的棉布，鞋子，衣服及其他日常需要的用品，那便更好了。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並且顧慮到這一展緩工業化的政策會得到什麼結果呢？不錯的，我們可以拿建立重工業所耗費的十五萬萬盧布的半數，來買進生棉，生皮，橡皮等。自然可以生產更多的棉布，鞋子，布疋。但是我們不能有電耕機與汽車工業，也不能有穩固的鋼鐵工業，沒有五金來生產機器。資本主義世界都有現代的技術的武裝，而我們是無異乎被敵人解除武裝。我們不能拿電耕機與農業器來供給農業。因此我們沒有糧食。我們更不能戰勝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原素。或許也大大增加了恢復資本主義的機會。或許也不能有一切現代的防禦武器，沒有這個，國家的獨立是不能的，沒有這個，我國便變成了國外的敵人的戰爭活動的目的物。那時我國的地位，或許和中國差不多，自己既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軍事工業，只好任人宰割罷了。總括一句：在那樣的場合中，我們會要受武裝干涉，決不會有什麼不侵犯條約，只有戰爭，非常殘忍的戰爭，而且是不平等的血戰，因為我們沒有武裝，而敵人則有一切現代的進攻的武裝。

事情就是這樣，同志們！顯然地，一個自尊的國家，一個自尊的黨，不能採取這種自殺的觀點，黨正因為拒絕了這種反革命的態度，才能在工業的領域內，獲得完

成五年計 中的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實現五年計劃中，在組織工業建設領域內的勝利中，黨以最高的速度執行發展工業的政策，黨推動了全國，使他向前猛進。

黨執行提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行動呢？毫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對於一個落後幾百年的國家，對於因為落後就有滅亡的危險的國家，當然不能不加以刺激。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使這個國家於現代技術的基礎上，迅速地改造自己，最後走向發展的大道。

再者。我們不知道帝國主義者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來阻撓我們的建設工作。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就來進攻，並且同時利用我們的技術上的與經濟上的弱點，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黨只得推動國人，以免虛耗時間，他必須從早利用「喘息」的時間，來建立蘇聯工業化的基礎，這基礎成為蘇聯權力的根據。黨沒有等待與敷衍的可能。他必須提高速度到最大的限度。

最後，黨必須在最短時期內補救國防方面的弱點。

目前的形勢 資本主義國家軍備的發展，縮減軍備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於蘇聯的仇視，這一切逼迫我們的黨不得不努力加強國防力，這是國家獨立的基礎。

黨曾經有不有真實的可能來實現最大的速度呢？他確有真實的可能。它有了這樣的可能，不僅僅因為黨及時喚醒全國向前邁進着，尤其是因為黨能依靠天規模的新建設，在舊有的或刷新了的工場與工廠上，這些工廠已經由工人，工程師與專家弄得很純熟了，因此可以使實現發展的最大的速度是可能的。

那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即新建設有迅速的進步，擴張建設的猛烈，建設熱情，新建設的突擊隊與

大大增加速度的基礎。

是不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執行同樣增加速度的政策呢？ 否。

第一，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在實質上完成了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建立工業，交通和農業的現代技術的基礎，在這些條件下，還需要去刺激和加速全國嗎？ 很明白的，現在沒有這種需要。 第二，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提高國防能力到必須的程度。 最後，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結果，我們已經建立好幾百個新式大工廠，並且以現代複雜的技術來裝置它們。

這個意思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生產中，舊有的工廠，即被我們把技術弄純熟了的舊有工廠，不再起領導作用，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一樣。 起領導作用的，將是新設的工廠，它的技術還沒有由我們弄得純熟，但是必須要弄純熟。 不過把新企業及新技術弄得純熟，比較利用舊有的或翻新了的工廠是困難些。 它需要較多的時間，來提高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的純熟，養成新習慣，使他們能夠完全使用新技術。 這不是很明顯嗎？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下，就令我們想進行高速度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起始的一二三年。

因此，我以為第二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將要小一點。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二。 但是很以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生產，將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一三——一四。

這種增加率，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做不到的。 現在，他們連百分之五的增加都辦不到了。 他們究竟是資本主義國家。 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聯是不同的，在我們的

經濟制度下，我們能够并且應該每年實現百分之一三——一四的增加，這是最低的限度。

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創造了對新建設的熱情，得到了很大的勝利。這是很好的。到現在，這便不夠了。我們現在必須補充這一工作，必須熱烈地來熟練新的企業與現代技術，來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來大大地減少成本。這是現在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半對於建設與工業生產的發展得到新的猛烈的發展。

最後，稍為說一說速度與生產每年增加的百分數。

生產增加百分率是怎樣的意思呢？每百分增加的背景是什麼呢？我們舉出經濟恢復時期的一九二五年。那是生產每年的增加是百分之六六。工業的總生產是七〇〇百萬盧布。百分之六六的增加，在那時代表三〇〇〇百多萬（絕對數字）。因此那時的每百分增加等於四三百萬盧布。再來舉出一九二八年。這年的增加是百分之二六，即約畧等於一九二五年百分增加的三分之一。

那時工業的總出產是一五，五〇〇百萬盧布。那年的總增加是三二八〇百萬（絕對數字）。這樣，那時的每百分增加，代表一二〇百萬盧布，即約畧等於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的百分之六六的三倍。最後，一九三一年，生產增加百分之二二，即等於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的三分之一；而工業的總生產，等於三〇、五〇〇百萬盧布。增加的總和，等成五六〇〇百萬。那末每百分增加，等於二五〇萬盧布。即等於一九二五年增加百分之六六的六倍，等於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六的二倍。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在考查生產發展的速度時，不應該只限於考查發展的百分數。必須知

道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內容，增加的總數是若干。比如一九三三年只增加百分之六，即是一九二五年所增加百分數的四分之一。但是這年增加的實數，決不會小四倍。就絕對數字講，一九二五年生產的增加，等於三〇〇〇百萬強，每百分之一的增加，等於四三百萬。一九三三年根據百分之六的速度的生產增加，不會少於五〇〇〇百萬，即等於一九二五年的兩倍。每百分之一的增加，至少代表三二〇至三四〇百萬盧布，即等於一九二五年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七倍。這些是工業領域內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結果。

四，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結果

農業領域內的五年計劃，便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

什麼是黨執行集體化的基礎呢？黨認為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除工業化以外，應該把小的個別農莊，轉變為集體化了的大農莊。更以電耕機與現代農業機器來裝置他，使成為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唯一穩固基礎。黨認為沒有集體化，便不能領導我們國家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大道，便不能把成百萬的勞動農民從貧困與愚昧中解放出來。列寧說：「小農莊沒有法子免除窮困」。

列寧說過：「假如我們依舊維持小農莊——甚至於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我們同樣將受不可避免的破產的威脅」。

他又說：「祇有藉助於集體合作的工作，我們才能從這個帝國主義大戰替我們造成的死巷中走出來」。

「我們必需轉到共同耕種大的模範農場，沒有這個，我們不們逃出滅亡，不能逃出目前俄國所遭遇的絕境」。

。

根據上面的基礎，列寧得到下面的基本結論：

「只有在實際事實中證明給農民看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的優點，只有以合作的與勞動組合的農場去幫助農民，祇有這樣，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真正地證明給農民看工人階級是對的：才能真正堅決地和有力地奪取數百萬農民羣衆。」（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五七九——五八〇頁）

黨於執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於執行農業五年計劃的綱領，是從列寧的這些話出發的。在這方面，五年計劃的任務，在於連合散漫的小農莊，這小農莊沒有利用電耕機與現代農業機器的可能。應該把他轉變成為集體化了的大農莊，用一切現代工具來裝置他，把他轉變成為高度發展的農業。國家模範農莊，蘇維埃農莊，應該成立於自由的土地上。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的任務，在於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小農國家變成一個以集體勞動為基礎的國家，生產最大數量的市場商品。

在農業方面，黨在執行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中得到了什麼成績呢？他完成了綱領麼？或者他受了失敗呢？黨在三年內組織了二〇〇，〇〇〇以上的集體農莊五〇〇〇蘇維埃農莊，主要用來生產五穀與家養牲畜，同時在四年內增加了耕地二一〇萬公畝。

現在集體農場包括租地百分之六以上，包含全體農場百分之七十以上，超過五年計劃三倍。

在個別農莊支配的時期，僅能獲得五〇〇——六〇〇百萬蒲得的「商場五穀」，現在每年可以獲得一二〇〇——一四〇〇百萬蒲得五穀，這要算是黨的成績。

富農階級被打碎了，不過還沒有完全消滅，勞動農民，已經從富農的剝削下解放出來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即集體農莊。這是黨的成績。

蘇聯已經從小農經濟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大農業的國家，這也是黨的成績。

你們想想：從這一切看來，資產階級報紙說集體化失敗了，說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失敗了，他們這些話到底有多少價值。

正在經過最銳利的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業的現狀是怎樣呢？讓我們看看一般知道的官報罷！

生產五穀最重要的國家，減少了耕地百分之八一〇。美國棉地減少了百分之一五，捷克與德國的甘地，減少了百分之二二——三〇，立陶宛與萊多維亞的蘇地減少了百分之二五——三〇。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統計，美國農產品的總生產量一九二九年值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一九三二年則降為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即是說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同一時期五穀總產量的價值由一，二八八，〇〇〇元降到三九一，〇〇〇元，即是減少百分之六十八強。關於棉花，則從一，三八九，〇〇〇元降到三九七，〇〇〇元，即是減少百分之七十強。

這些事實，不是證明了蘇維埃制度的農業超過資本主義農業的種種優點麼？不是證明了集體農莊比個別農莊與資本主義農莊是較好的農業形式麼？有人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不能完全生產有利的報酬，反而消費了大量的金錢，經營這種企業是不合理的，頂好是將他解散，祇留下生產有利的報酬的。只有不懂國民經濟的問題和

經濟問題的人，才會說這些話。

幾年以前過半數的紡織廠是不能生利的。一部分同志要求要這些廠停辦。假使我們當時採納了他們的意見，結果將變成怎樣呢？我們對於國家，對於工人階級犯了極大的罪過。因為我們一定會破壞了正在生長中的工業。

在那時我們怎樣辦呢？我們等了一年多一直到整個的紡織業都能生利。

現在高爾基地方的汽車廠也還不能生利，難道我們關閉這個工廠嗎？我們也要關閉現時尚不能生利的鋼鐵業嗎？同志們，我們不應當關閉他嗎？

假使我們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生利性，那麼，我們只能努力發展能生最高利息的少數工業如糖果，麵粉，香水，襪，玩具等等。自然我并不反對發展這些工業。恰恰相反，這些工業也必須發展，因為他們也是人們所需要的。但是第一，沒有機器和燃料，我們不能發展這些工業，然而要有重工業才能生產機器和燃料。第二，我們不能以這些工業作為工業化的基礎。主要點就在這兒，同志們。

有利與否，是不能從小店主的觀點與一時的觀點來加以觀察的。有利與否，必須從一般的國民經濟觀點，從多年平均的觀點，來加以觀察的。只有這樣的觀點，才真是列寧主義的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觀點是必須的，不僅關於工業尤其關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都應該是這樣的。這裏，請想一想。三年內我們建立了二〇〇〇〇〇集體農莊與五〇〇〇蘇維埃農莊。即是說我們完全建立了新的偉大企業，他對於農業猶如工廠對於工業是同樣的重要。請舉出一個國家來，不說於三年內建

立二〇五，〇〇〇新的偉業大企。只說建立二五，〇〇〇這樣的企業。你們不能舉出這種國家來的。世界上沒有這種國家。

然而我們在農業中創立了二〇五，〇〇〇新企業。

雖然世界上有人要求這些企業立刻生利，否則立刻必須加以滅毀和解散。

這不是很明顯地嗎？黑羅斯提拉特的桂冠不能讓這些莫明其妙的人安眠？我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不生利。並不是說他通統不生利。不是這一回事。大家知道有若干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是很生利的。我們有幾千的集體農莊，有幾千的蘇維埃農場，已經很能生利了。我們的黨與蘇維埃政權對於這些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都可引以自豪的。自然這種農莊，並不是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相同的。他們當中有些是很舊的。有些却是很新的。有些還不或為財政上有定形的經濟組織。他們在組織上的發展經過和一九二〇——二一年我們工廠所經過的同樣時期。他們的大多數，還不能夠生利，但是經過兩三年以後，他們就會和一九二一年後的工廠一樣地生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因為他們不全體生利就拒絕幫助，這是反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最大罪惡。只有人民的敵人，反革命派，才說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是沒有用的東西。

黨於執行農業五年計劃，提高了集體化的速度。

這是對的麼？黨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在這裏，還免不了各種情感的暴露。黨於消滅富農階級：和肅清富農的巢穴，自不能半途而廢。黨利用電耕機與農業機器，更利用土地佔有制的不存在，自然可以實行農業的集體化。

在這方面，黨的成功是最大的，因為超過五年計劃集體

化的三倍了。

這個意思是不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還要執行集體化的加速度的政策呢？不是的。因為已經完成把蘇聯最重要的區域都集體化了。在這領域內，我們超過了以前的預期。我們已經使農民的大多數覺悟到只有集體農莊才是最可接受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集體農莊的問題，已經不是「是不是」的問題。這問題已經確實解決了。集體農莊，已經加強了。到舊式個別農莊的道路，已經是封閉了。現在的任務，在我從組織上加強集體農莊，肅清陰謀破壞份子，提拔真正好的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到集體農莊，把集體農莊變成真正布爾什維克農莊。現在這是重要的事情。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到四年完成的問題就是如此。

五 在改善工人農民的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我已經說過工業和農業中的成績，說過蘇聯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這些成績對我個改善工人農民的物質狀況有什麼結果呢？

從根本改善勞力與勞心的勞動者的物質地位看來，我們在工業農業領域內成功的最重要的結果，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在撲滅了工人中的失業與愚昧。第二，吸引了差不多一切的貧農建立集體農莊，破壞了把農民分為富農與貧農的基礎，因此消滅了農村中的窮困和貧苦。

這是資產階級國家夢想不到的偉大成績，不論他是如何的「民主」。我們蘇聯工人，早已忘記失業了。三年以前，我們有一百五十萬的失業工人，但是到現在，已經有兩年沒有失業工人了。現時工人才能忘記失業與失業痛苦。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的痛苦是怎樣的！

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的工人，總有三四千萬。他們現在是怎樣一種人呢？一般人稱他們為「注定遭劫的人」。他們天天找工做，準備在任何條件下接受工作，但是終久找不着，因為他們是「多餘的」。同時大量的商品與產物，是被資本家與大地主的驕子的浪費。失業工人得不到食物，因為他們不能付錢；得不到住處，因為他們不能付房租。他們是怎樣生活？他們靠些富人們桌上可憐的救濟金為生，他們只是吃着人們拋棄了的腐爛食物。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很多是住城外用樹皮箱板蓋成的破房裏。不僅如此，失業的結果，不僅只有業者受痛苦。在業工人也受痛苦，因為大批失業的關係，生產中創出了一種不定狀態，不知道明天是怎樣的。今天固然還沒有失業，究竟到了明天，是不是會得到被開除呢？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最重要的結果中的一個，是於蘇聯內消滅了失業，使工人們不感覺到失業的恐怖。

對農民也是一樣的。他們忘記了貧農與富農的分別。他們忘記了每年有幾百萬的農民破產為乞丐痛苦。

忘記了農村貧民被富農剝削的痛苦。三四年以前，農民戶口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三〇是貧農。他們的總數在一千萬以上。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占戶口百分之六〇。

他們過着飢餓的生活，經常地被富農奴役着，在從前還被富農與大地主奴役着。不久以前，有一百五十萬乃至兩百萬貧農，每年到南方，北高加索與烏克蘭替富農工作，從前替富農與大地主工作。他們當中更有一大部分來到工場的大門前，增加失業工人數量。不只貧農是這樣可憐。一半中農也受同樣的痛苦。農民已經忘記這一切了。

五年計劃給予了貧農與中農的上層一些什麼呢？他消滅了富農階級，這樣便把貧農與一大半中農從富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他吸引他們到集體農莊中來。替他們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基礎。他這樣使農民不至再分為剝削的富農與被剝削的貧農了。他提高貧農與中農的下層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因此毀滅了農民貧窮化與破產化的行程。在我們這裏，每年再沒有幾百萬的農民，拋棄他們的農莊，跑到很遠的地方來謀生活。如果要找集體農莊上的農民，到外邊工作，必須首先簽定和集體農莊結成的合同，擔保免費乘車。在我們這裏，再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破了產，擠擁到工廠的大門邊。今日的農民已經確立了他的根基，成為集體農莊上的一個成員，握有電耕機，農業機器，種子，準備金等。

改進工農物質的景況的結果，第一個五年計劃表現了：（一）大工業中工人與僱員的加多，比一九二八年加一倍，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五七；（二）國民收入的加多，即是一九三二年工農收入加多，等於四五，一〇〇百萬盧布，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五；（三）大工業中工人與僱員每年平均的工錢，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七，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一八；（四）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九二（一九二八年是一〇五〇百萬，一九三二年是四一二〇百萬），比五年計劃的原定額加多百分之一二；（五）公共食堂包含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的工人的百分之七〇，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六倍。

不錯的，我們還沒有辦到完全滿足工農的要求，這恐怕是最近一兩年內辦不到的。但是我們做到了工農的物質景況年年有改進。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死敵，才懷疑這點。資產階級報紙的代看，包含他派駐莫斯科的一部

分的通訊員，或許也是懷疑的。這些人了解蘇聯的經濟與勞動羣衆的景況，正如亞比叙利亞王了解高等數學。

資本主義國家內工農的地位現在是怎樣呢？

這兒我們有正式的數目字。

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失業人數已經駭人地大大增加了。在美德，根據官報製造工業中的工人數目由八百五十萬（一九二八年）減少到五百五十萬（一九三四年）。但是據美國總工會的統計一九三二年末美國失業者總數達到一千一百萬。

在英國，根據官方的統計，失業人數從一百廿九萬（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二百八十萬（一九三二年）。

在德國，官場的統計說失業人數從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五百五十萬人（一九三二年）。

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不過我們要記着官方的統計總是減少失業數目字。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失業人數大概是在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之間。

同時有計劃地減少工人的工資。在美國平均每月工資與一九二八年相比減少百分之三十五。在英國同時期減少百分之十五，德國減少到百分之五十。根據美國總工會的推算，在一九三〇——三一年，因減少工資，美國工人損失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在英德兩國內工人的保險基金已經大大減少了。在英美完全沒有或近乎完全沒有任何形式的失業保險，因此無家可歸的工人和颯泊者的數目有極大的增加。特別是在美國。

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民羣衆的地位并不比工人好。農業危機正在根本動搖農村，把千百萬的受難農民驅逐在

農村中颺流。

關於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就是如此。

六 在城市與鄉村間商品交換方面，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結果

工業農業生產的鉅大增加，工農業積餘產品的增加，工農需要的增加。這一切恢復了並且擴大了鄉村與城市間的商品交換。

城市於農村間生產上的合作，是合作的主要形式。

不過光是生產上的合作是不夠的。必須用交換上的合作來補充，才能使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繫有永久性，不破碎。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發展蘇維埃貿易。這是不正確的，假使說只能用一種方法——如經過合作社——來發展蘇維埃貿易。為發展蘇維埃貿易，我們必須採取各種道路，如合作社，國營貿易機關，集體農場貿易等。

有些同志以為發展蘇維埃貿易，尤其是發展集體農場貿易，會要恢復到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階級。這個意見是絕對錯誤的。

什麼是蘇維埃貿易？蘇維埃貿易，是沒有大小資本家與投機者的貿易。他是經濟史上從沒有見過的貿易的特種形式，只有在我們蘇維埃發展的特種條件底下才能由我們布爾什維克創辦出來。

在蘇維埃貿易（包括集體農場貿易）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間有一個基本的不同。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我們許允資本主義的恢復，我們允許私人貿易，我們允許私人商業家，資本家與投機者的活動。在那時我們有相當的自由貿易，只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在那個時候，私人資本的活動在國家的貿易上佔一個很大的地

位。在那時我們沒有發展的工業，沒有集體農場國家農場。現在我們有了，這些發展的工業，集體農場，國家農場在一定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着、供給政府大量的農產品與城市製造品。

現在我們有相似的形勢嗎？自然沒有。

第一，蘇維埃貿易絕不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相同，雖然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是受政府的限制。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允許資本主義的恢復，允許私人資本在商品交換中的活動，但是蘇維埃貿易則拒絕了這兩種可能。

第二，在我們的背後，有了充分發展了的國家工業與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的整個網，以大量的工業農業出品供給國家，來發展蘇維埃貿易。新經濟政策的第一階段，不是這種情形，也不能是這種情形。

第三。最後。我們把一切私商人與私中間人都從貿易中驅逐出了。

這自然不會排斥依照商品流通中隔世遺傳律出現的新的私商人與投機家，這些人得了好機會經營集體農場貿易。但是我們有一個武器來抵制這些不好的現象，那個武器便是禁止投機與懲罰投機的蘇維埃法律，你們自然知道這種法律並不溫和，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沒有，也不能有這種法律。

有了這些條件，還有人說我們會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的貿易，這完全是不了解我們的蘇維埃經濟。

有人說現今我們的革命法律與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現時我們的革命法律是恢復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律主要是反對戰

時共產主義所採的過激手段，反對「非法」的沒收和勒索，在蘇維埃法律嚴重監視之下，保障私人所有主與資本家的財產安全。

現時我們的革命法律則完全不同。現在的革命法律主要是用來對付損害公共財產的竊賊，怠工者、惡棍及強盜。現時革命法律主要的任務只是在保護公共財產。

因此用蘇維埃政府法律所給我們的一切武器和方法來保護公共財產，這是黨的主要任務之一。

有人說，沒有健全的金融制度，沒有穩固的金融，是不能發展貿易的，甚至蘇維埃貿易也是不能的。又說，尤其是我們蘇維埃的金融制度與金融，據他們說是沒有價值的。必須首先加以改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這樣對我們說。以我看來，這些經濟學者關於政治經濟的知識，恐怕不會超過英國大僧正關於反宗教宣傳的知識。怎麼能說我們蘇維埃金融沒有價值呢？我們用這種金融建設了馬格立多斯提羅易，第立拍羅斯提羅易，庫斯勒慈斯提羅易，斯達林與哈科夫電耕機廠，莫斯科與高爾基汽車廠，幾十萬集體農莊，幾千蘇維埃農莊，這不是事實嗎？這些資本主義專家覺得這些東西是用乾草或乾土做的，而不是用有價值的材料做的嗎？假如我們考慮到有組織的市場，不說及無組織的市場，前者在我國商品的流通上有決定的意義，後者僅有次要性，那末，什麼是蘇維埃金融的基礎呢？自然不是存金。蘇維埃金融的穩定性，主要地是由巨量商品做保證，這商品握在國家的手中，以一定的價格轉運市場。這種擔保品只存在於蘇聯，不是比存金還好些麼？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這點？五年計劃的結果，蘇維埃貿易領域內得到了什麼成績呢？執行五年計劃的結果，我們：

一，輕工業的生產量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七。

二，增加了合作社的與國家的零售貿易百分之七五（和一九二八年比較），這貿易在一九三二年的總額是三九，六百萬盧布。

三，和一九二九年來比較，增加了國家的與合作社的貿易網，一共增加了一五八，〇〇〇鋪店。

四，集體農場貿易繼續增加，個別的國家和合作社機關購買農產品的數量也繼續增加。

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流通，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象徵。在那裏，危機使貿易蕭條，使貿易機關大批地關門，使中小商人貧窮化，使貿易中的商品發生擁擠，使工人羣衆的購買力繼續減低。這就是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商品流通發展方面的成績。

七 四年完成五年計劃在反對敵人機結殘餘鬥爭中的成功

執行關於工業農業貿易的五年計劃的結果，我們在一切國民經濟領域內，加強了社會主義的原則，把資本主義原素都趕出去了。

結果是：把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從他們最後的巢穴裏趕出去了。這就是指的工業家及其走狗，商人及其助手，以前的貴族，僧侶，富農，富農分子、以前的白軍軍官、警士，憲兵，各種狹義愛國主義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以及其他反蘇維埃份子。這些「得意時代已經過去的人」被趕出去了，散布於蘇聯全境，混進了我們的企業中，工廠中，行政機關中，貿易機關中，建築企業中，交通機關中以及我們的合作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中。他們藏匿在這些地方，冒充工農，他們當中也有些混入共產黨內來

了。

他們爲什麼這樣做呢？他們混進這些組織中來，自然帶有痛恨蘇維埃政權的感情，自然非常痛恨新經濟與新文化的形式。不過這些紳士們，再沒有能力向蘇維埃作公開的進攻。他們與他們的階級，曾經做過這樣的進攻，但是被擊退了。他們現在所要做的，祇是挑撥離間和危害工人，集體農民、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他們總是暗中盡力活動。他們焚毀倉庫，損壞機關，組織怠工，破壞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他們當中有些大學教授甚至用牛瘟或惡性癩來毒殺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的牲畜。但面他們主要的活動是組織羣衆偷取和強切盜用政府財產、合作社的財產與集體農場的財產。

在工廠內，鐵路上，貿易機關內：集體農莊企業內，他們實行搶劫盜竊，這是他們的主要活動方式。他們的階級本能告訴他們：蘇維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化了的財產，如果要動搖蘇維埃政權，必須這個基礎破壞。

他們的組織搶劫與盜竊，利用了集體農民即昨日的個別農民的私有財產的習慣與殘餘。馬克思主義者要知道個人的覺悟，落在現今物質景況發展的後面。集體農民現在不我個別的農民，而是集體者。但是他們的氣性仍然是舊的私有財產氣性。從前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利用集體農民的私有財產的舊觀念，來組織搶劫與盜竊以反對公共財產，以破壞蘇維埃制度的基礎即公共財產。

有許多同志認爲這些現象不很重要。不了解這些分子的偷竊與強切的意義。認爲這些事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這些同志是大錯了。我們的制度的基礎是公共財產，正如私有財產是資本主義的基礎一樣。在鞏固資本主義的社會行程中，宣布了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我們現在也要宣佈社會化了的財產一樣地神聖不可侵犯，以便在生產與貿易的一切領域內來鞏固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對於搶劫與盜竊社會化了的財產的寬容，是無異允許破壞蘇維埃制度，這制度基於社會化了的財產。因為這種原因所以不久以前，蘇維埃政府頒佈保護社會化財產的法律。

這個法律是我們革命法典的基礎。嚴格的實施這個法律是每個共產主義者，每個工人與每個集體農民的第一責任。

因此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以便消滅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最後殘餘，以便消滅他們的掠奪行爲。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的理論，把建立無階級的社會與國家逐漸消滅的理論，解釋爲可以允許怠惰與調和，解釋爲可以是認停止階級鬥爭與削弱國家權力的反革命理論。自不待說，這些人和我們的黨沒有相同的地方。階級的消滅，不是由於階級鬥爭的停止而來的。相反的，只有加強階級鬥爭，才能滅階級。國家的逐漸沒落，不是由於國家權力的削弱而來的，而是國家權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的結果，要這樣提高，才能完全掃滅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殘餘，才能組織有效的防禦，來反抗資本主義的環境，這環境還沒消滅，短時期內也不會消滅。

五年計劃的結果，已經把敵對階級的最後殘餘，從生產中趕出去了。富農已經被打倒了，並且準備了最後消滅他。但是這還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的任務，在於把從前統治階級剩下來的這些份子，從我們的一切機關中趕出去，使他完全不能作惡。

不錯的，從前剝削階級的這些殘餘份子，自然不能以破壞，搶劫，盜竊來根本改變蘇聯的現狀。他們恐怕

是太弱了一點，不能夠有效地抵制蘇維埃的手段。不過我們要留心，蘇維埃的壯大，會要加強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最後殘餘的反抗。正因為他們是垂死的末日快要到來，所以不惜使用種種武器來對付我們。他們不惜以種種罪名加於蘇維埃來挑動落後份子來反對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從前被打倒了的反革命的政黨，如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國粹派，都能夠復活而且恢復他們的活動，就是反革命派的反對派的殘餘，從托洛斯基派到右派，也能夠復活。那自然沒有甚麼可怕的地方，不過我們如果要極快地消滅這些份子而且不想受重大的犧牲，也必定要考慮到一切。

所以，革命的機警，是目前布爾什維克特別需要的性質。

根據前四年的結果與成績，就斷定蘇聯內部的一切都是順利的，這當然是錯誤的。我們的工作中，有了不少的錯誤與缺憾。可惜我現在不能說明這些錯誤與缺憾，因為我的報告短了一點，不允許我這樣做。但是這也不是主要的一點。主要點是：雖然有了無人否認的錯誤與缺憾，我們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工人的熱情，我們所得的勝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要性。

使我們於種種困難中能夠得到這個歷史勝利的主要力量是什麼呢？最主要的是廣大工人與集體化農民的活動，自動犧牲、熱情與積極，他們和我們的工程師與工藝專家，在社會主義競賽與衝擊隊運動中，發展了偉大的能力與熱情。自不待說，沒有這個原素，我們不但不會達到目的，恐怕很難前進一步。

第二、便是黨與蘇維埃政府領導的堅決，他們號召群眾前進，並且克服了在中途所遇着的一切困難。

最後，便是蘇埃維經濟制度特有的價值與優點，這制度的本身包含着偉大的能力來克服所遇着的一切困難。

這是蘇聯在偉大的鬥爭中得到歷史勝利的三個最重要的原素。

總的結論是：

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果，駁倒了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政客的說法，說五年計劃是一個幻想，一個不可實現的迷夢。事實上，五年計劃已經完成了。

二、五年計劃的結果，掃滅了資產階級的舊的武斷宣傳，說工人階級只能破壞，不能建設。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工人階級不僅能夠破壞舊的，而且能夠建設新的。

三、五年計劃的結果，粉碎了社會民主黨所說的單獨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可以單獨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在蘇聯已經有了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四、五年計劃的結果，否認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只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的制度而一切其餘的經濟制度都不能受經濟發展的困難所提出的試驗的說法。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破產了，他已經是過時了，他必須讓位於較高形式的制度，即社會主義蘇埃維制度，只有這個制度才不怕恐慌，才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困難。

五、最後，五年計劃的結果，表示共產黨只要完全知道所走的方向與不怕困難，那末，共產黨無敵的。

（鼓掌如雷，歷時很久。出席的人全場起立向斯達林同志致敬）

農業黨的工作的任務區 斯達林

——一九三三年正月十一日斯達林同志在聯共中央
執監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

我相信發言的同志們已經很正確的摘要敘述了在農業區域中黨的工作情形，黨的工作中的缺點與成績，特別是缺點。不過我以為他們還沒有說及關於農業區域中黨的工作的缺點的最重要點。同時這一方面，對於我們有極大的興趣。因此請你們允許我提出我對於農業區域中黨工作缺點的意見，以布爾塞維克特有的完全坦白性，來說我們的意見。

一九三二年我們在農業區域工作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主要的缺點是一加三二年我們在收獲谷物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難比一九三一年所遇的困難更大。

我們不能說這種現象，是由於穀物的收成不好，因為今年的收成并不比去年更壞，而是比去年好。沒有人能否認一九三二年市場五穀的收成比一九三一年更大，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境內五個重要地方的旱災大大的減少了國家的穀物平衡。自然在一九三二年因古班，德力克及一些烏克蘭區域氣候不良，使我們的穀物收成中受了相當的損失。但是這些損失還不到一九三一年因旱災而受損失的一半。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在農村中的穀物比一九三一年多。雖然是如此，一九三二年穀物收集的工作所遇的困難比一九三一年所遇的困難更大。

這是什麼理由呢？我們工作缺點的來源是什麼呢？如何解釋這個變態呢？主要的解釋是因為我們實際工作的同志與在農業區的工人不能了解在農村中因實行穀物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的新形勢。正是因為他們不能顧

慮到這種新形勢，所以他們不能根據新形勢而來適應新的狀態，沒有五穀集體農場貿易，穀物沒有兩種價格（政府規定的價格與市場價格）那麼農村中的狀況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宣佈穀物集體農場貿易，農村中的狀況一定有一個徹底的改變，因為宣佈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就是說法律上承認穀物市場價格，這種市場價格是比政府所規定的價格高。在這兒我們無須指出這種情形將使農民們畏縮不肯把穀物儘量地供給政府，農民們對於這事的見解是這樣：「現在宣佈了穀物集體農場貿易，法律上承認了市場價格。同量的穀物我可以在市場上獲得比較把穀物交給政府所得的價格更大。因此，假使我不是愚蠢。我必須保留穀物，少交一點給政府，多留一點給集體農場貿易，因此同量的穀物，我可以賣更多的錢」。農民們的這種見解，自然是很簡單，很合理的。問題在於許多農業區內工作人不了解這種最簡單明瞭的事體。為要不妨害政府的任務，共產黨員在新的條件之上，早就應該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收穫開始的時候，用一切力量增加與促進谷物收集工作。

環境所需要的就是在此。但是他們實際上怎樣做了呢？他們不去促進谷物收集，反而去建設各種基金，因此使谷物交付者在盡他們對政府責任中收藏更多的谷物。因為沒有了解這些新的環境，他們不認識農民們不肯交出谷物會妨害谷物收集。他們反而恐怕農民不會把谷物收藏起來，以後送到市場上去，實行集體農場貿易，或者農民們甚至於把他們所有的谷物完全交到倉庫。換言之，在農村中的共產主義者。至少他們的大多數是如此，他們僅僅了解集體農場貿易的正面，但是他們誤解了并且不完全了解集體農場貿易的反面。他們不了解，假使不

在開始收穫的時候用一切力量來促進谷物收集運動，那麼集體農場貿易的反面能給政府以極大的損害。犯這種錯誤的人不僅是集體農場上的工作人員。蘇維埃農場的經理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些經理們非法的把應當交付給政府的谷物收藏起來，經過其他的路線，把這些谷物用較高的價格出賣。

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在關於發展集體農場貿易的決議中曾經考慮到因實行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出新的環境嗎？是的，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曾經考慮到這些新的狀況。在這個決議案中曾經直接了當的提出，只有在谷物收集計劃完全實現後，只有在谷種收集後才能實施谷物集體農場貿易。這個決議案很明白的說，只有在谷物收集與谷種收集完成後（大概一九三三年正月十五日），只有在完成這些條件後，才能開始谷物集體農場貿易。

在這個決議案中，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似乎對農業區中的工作人說：「不要因為顧慮各種基金和資本而分散你們的注意力，不要忽視主要的任務，在收穫開始的時候，就進行谷物收集運動，用力推進這種運動，因為第一個指示是完成谷物收集計劃，第二個指示是收集基金與谷種，只有實行這兩個條件後，你們才能開始和發展你們的谷物集體農場貿易。」

中央政治局與人民委員會的錯誤是在他們沒有儘力指出問題的這一方面，沒有大聲疾呼地警告農業區的工作人員注意集體農場貿易所含有的危險。但是他們曾經警告注意這些危險，而且是很明白的警告，這是沒有疑義的。

我們必須承認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有點過分估量在實際工作中的工作人員和一些區域的工作人員的列寧主義者的頑強性和先見之明。

或是我們不當實行集體農場貿易？ 或者這是一個錯誤，特別是因為集體農場貿易不僅有正面而且有反面。

否，這不是一個錯誤。 沒有一個革命計劃能保證不會有反的方面，假使這個革命計劃不能正確的執行。 這種說法在穀物集體農場貿易中也是對的。 對於鄉村與城市，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集體農場貿易是必要的而且有利益的。 正因為是它是有利益，所以我們必須採用。

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是根據什麼理想來決定實行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呢？ 最重要的是擴張城市與鄉村間物品流通的基礎，改良以農產品供給工人，以城市製造品供給農民。 毫無疑義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與合作社的貿易是不够的。 必須用新的辦法來補充這些物品流通機關，這個新辦法就是集體農場貿易。 我們用集體農場貿易來補充他們。 其次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想以集體農場貿易的幫助，補助集體農場上的農民的收入，加強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爲實行集體農場貿易可以推進農民在集體農場上的工作，在播種方面與收穫方面。 一切由集體農場農民生活中所得的事實完全證實了人民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的這些意見。 加強了鞏固集體農場的過程，消滅了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更多的個別農民加入集體農場，使集體農場的會員在接受新會員時加以仔細的選擇。 這一切和其他相似的事件毫無疑義地證明了集體農場貿易不僅沒有削弱集體農場的地位，反而加強了和鞏固了集體農場的地位。 因此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不能歸咎於集體農場貿易。 這些缺點是由於沒有正確地執行指示，我們的工作人員不能估計到新的環境，我們的隊伍不能適應因實行集體農場貿易而產生的新環境。

第二個原因是在實際工作中的同志們——不僅是這些同志們——不了解由於鞏固集體農場在我們產穀物區域中的統治地位，我們在農村中工作條件的改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集體農場貿易形式變成了我們谷物地方中的統治形式。然此有些人還不了解：這種新的實境，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農業發展方面的留意和責任。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在這個或那個地方完成集體化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那麼一切必須的事都做了，我們可以讓這事體自己去發展。他們以為集體化單獨進行這一工作，單獨可以促進農業。但是同志們，這是一個很深刻的錯誤。事實上，集體形式變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了我們在農業方面的留意，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了共產主義者在促進農業中的領導作用。

讓事情聽其自然的發展，這種見解在現在比以前更有害於農業之發展，這種辦法現在可以摧毀整個的工作。只要個別農民在農村中佔優勢，那麼黨能把他的干涉發展農業的行動限制於個別的救濟行動，用勸告或防止的辦法。在那個時候，個人農民必須自己照料他的農場，因為他不能把他自己所有的農場的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去，除開他自己以外，他不能依靠任何人。在那個時候，個人農民不得不自己去注意播種，收割及農業一般的過程，假使他自己不願意餓飯，受飢荒。

在改變為集體農場後，這種狀況完全變更了。集體農場不是一個個人農民農場。現在集體農場的農民說：「集體農場是我的，同時也不是我的。他是我的，同時也是張三，李四，以及其他集體農場會員的。集體農場是公共財產。」

現在的集體農民就是以前的個人農民。現在的集

體農民可以躲避責任，可以依賴集體農場之其他會員，因為他知道集體農場絕不會使他餓飯的。因此現在的集體農民不如以前的個人農民那樣地留心，因為現在是由全體農場的農民來負擔一切事務和責任。

從這樣還發生什麼呢？

結果是進行集體農場的主要責任由個人農民轉到集體農場的管理部，轉到集體農場的指導部。現在農民不是要求他們自己來處理集體農場的事務，建立合理的管理部，而是要求集體農場的經理來處理集體農場的事務與管理一切。更正確一點說，集體農場的責任，不是由他們自己而是由集體農場的經理來負擔。

這是什麼意義呢？

這就是說黨在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再不能只限於個別的干涉行爲，現在黨必須把集體農場的領導權拿到自己的手中，負擔起集體農民工作的責任，幫助集體農民在科學的與技術的基礎上，發展他們的農場。

但是問題不惟如此而已。集體農場是一個大事業。沒有計劃是不能進行大事業的。只有在有計劃經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這個包括成百成千農場的大農業事業。沒有這個，集體農場是一定要失敗的。

在這兒發現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另一條件，這個條件與管理個別農民農場的條件全完不同。

我們能把這個大事業的管理聽其自然嗎？讓他自動地變化嗎？

很顯然的我們不能這樣做。爲要經營這樣的大事業，我們必須供給集體農場以一定限度的有基本教育的人，這些人要能執行這個事業的計劃，以有組織的方法來管理這個事業。這是很明顯的，假使在發展集體農場運動

中沒有政府的有計劃的干涉和幫助，那麼，經營這種事業是不可能的。

隨着這點發生了什麼呢？

集體農場制度並不會減少，恰反而增加了黨與政府對於發展農業的留意和責任，假使黨要想指導集體農場運動，那麼黨必須注意到集體農場生活與集體農場管理等等。黨不僅不應當減少，而應當增加黨與集體農場的聯繫，黨應當知道在集體農場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樣才能及時幫助集體農場，保護集體農場不受迫切的危害。

我們實際中所看見的是怎樣呢？

我們看見許多區域與地方組織完全不知道集體農場的生活與要求。許多人坐在自己的公事房裏，用他們的筆很自滿地塗鴉而不注意到集體農場的發展，在個別的情形中，因為脫離了集體農場，有些省黨部的委員們所得關於他們省內集體農場的消息，不是從該省內的各地方黨部而是從莫斯科的中央。同志們，這種現象是很令人痛心的，但是這是一種事實。由個人農場轉到集體農場應當幫助鞏固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然而實際上在有些地方共產黨員躺在桂冠上安眠，以集體化高大的百分的數字自豪，而讓事情自然的發展。

在計劃的管理集體農場的問題應當是促進鞏固共產黨在集體農場上的領導。但是實際上有些地方共產黨員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讓舊日的白軍軍官，及工農的敵人在集體農場上實行大破壞工作。

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第二個原因大概是如此

。

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的缺點，第三個原因是許多我們的同志過份估量集體農場，以集體農場為一種新經濟形式

，把集體農場變成了一種神像。他們以為只要集體農場存在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那末正確地管理集體農場，正確地計劃集體農場制度，以及轉變集體農場爲模範的社會主義農場等等事都可迎刃而解。他們不了解在組織構造上集體農場仍然是很微弱，需要黨極大的幫助，要黨供給有經驗的布爾塞維克幹部與日常的集體農場經理。

不僅如此，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缺點是許多同志在農業新組織形式方面過分估量了集體農場的力量與可能。這些同志不知道雖然集體農場代表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但是集體農場本身還不能避免各種危險，還不能免除各種反動份子侵入集體農場的領導機關，現在還沒有保證在某種條件之下集體農場不致被反對蘇維埃的份子利用作他們的私圖。集體農場是經濟組織的社會主義形式，恰如蘇維埃是政治組織的社會主義形式。集體農場與蘇維埃是我們革命的最大的成績。是工人階級最大的成績。但是集體農場與蘇維埃祇不過建立了組織的形式，是的，是社會主義的，然而他們不過僅是組織形式而已。○ 一切要看用什麼去充實這個形式的內容。

我們知道在有些地方工農代表的蘇維埃在某一時期曾經擁護過反革命反對革命。如一九一七年七月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派領導下的蘇維埃贊助反革命反對革命。

一九一八年末德國的工人兵士會議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幫助反革命反對革命。因此這不僅是蘇維埃組織形式的問題，雖然這種形式的本身是最大的革命成績。最主要的是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內容，和性質，到底實際上是誰領導蘇維埃——革命黨人嗎？抑或是反革命黨人？因爲這種理由所以反革命派並不時時公開反對蘇維埃，例如在克倫斯特暴動時，俄國反革命首領米爾科可夫宣言他贊成

蘇維埃，不過這種蘇維埃是不允許共產黨參加的。俄國反革命領袖米爾糾可夫的口號就是「建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蘇維埃」。反動派很知道這不是蘇維埃本身的問題，問題是在誰領導蘇維埃。

集體農場問題也是如此。在真正的革命者，布爾塞維克，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下，集體農場是組織農業的社會主義形式，能在經濟建設中產生出驚人的奇跡。但是假使集體農場在社會革命派，孟塞維克，白軍軍官，及以前但尼金，哥爾恰克等擁護者操縱之下，那麼集體農場在某一時期只不過是一切反動交易的托辭而已。

在這兒我們要牢記住集體農場這種組織形式現在沒有不僅能避免反蘇維埃份子的侵入，而且有時反而會被反革命派利用。在以農民各人經營自己的農場：他們是分散的，彼此隔離的，因此反蘇維埃份子在農民中的反革命活動不能有很多的成績。在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這種狀況完全不同了。集體農場就是農民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因此，反蘇維埃份子侵入集體農場和他們的反蘇維埃活動能有更大的成績。

我們必須認識反蘇維埃份子已經看到了這一點。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反動派努力建立集體農場性的組織來掩蓋他們的非法組織。

這也是人們知道的，一些還沒有被人揭破和撲滅反蘇維埃份子，他們自願的加入集體農場的甚至於頌揚集體農場，企圖在集體農場內建立他們反動工作的巢穴。同樣，一部分反蘇維埃份子現在宣言贊成集體農場，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在集體農場中，不能有共黨黨員。「建立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場」，這就是現在在反蘇維埃份子中所傳播的口號。因此，這不單是集體農場本

身是社會主義組織的形式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這個形式內容。即是到底是誰在領導與管理集體農場。

站在列寧主義的觀點，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在組織形式方面，是武器，並且僅是武器。在某種條件之下，這種武器可以被用來反對拮命。我們可以用這種武器來對付反動派。這種武器可以供工人階級與農民使用。在某一種條件之下，這種武器也可以供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敵人使用。這一切完全要看誰掌握着這種武器去反對誰。

受他們的階級本性的指導，這些工人與農民的敵人現在開始了解這一點。不幸得很，我們許多共產黨員還不了解這一點。正因為有些共產黨員不了解這種簡單的事體，所以一些掩飾很好的反蘇維埃份子中管理一些集體農場，組織怠工破壞行動。

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缺點的第四個原因是：許多同志不能在實際中把鬥爭的戰線用來反對富農，同志們不了解近來階級敵人的面孔已經改變了，不了解階級敵人在農業區中的策畧也改變了，因此同志們不知道改變我們的策畧以求獲得勝利。敵人了解這種已經改變了的形勢，他認識了新制度在農村中的力量和威權，因此他改變他自己，改變他的策畧，從公開反對蘇維埃農場改變為暗中的破壞活動。但是我們沒有了解這點，我們還沒有認識這種新的形勢，仍然是繼續如以前一樣去找敵人，結果在以前的地方找不到敵人。我們繼續採用簡單反對富農的策畧，體種策畧很久就不適用了。

我們在集體農場外去找敵人，以為敵人一定是有兇惡的面孔，大的牙齒，粗大的頸，手中拿着來福槍。我們根據標語上面的人去找富農。然而在表面上，這些富

農很久就絕跡了。現在農村中的富農，富農走狗，反蘇維埃份子等等大部份是「冷靜」，「可愛」，甚至「神聖的」人。要找這些人，我們不必離開集體農場。他們就是在集體農場上，當倉庫管理員，經理，記帳，書記等。他們絕不說「打倒集體農場」。他是「贊成」集體農場的。但是他們在集體農場上進行怠工和破壞工作，這種損害是集體農場的農民無論如何不能快復的。他們絕不說「打倒繳納穀物」，他們是「贊成」繳納穀物的。他們只是實行欺騙，要求集體農場籌集三倍於實際需要的金錢來養牲畜，要求集體農場建立三倍於必需的保險金，要求集體農場給每一個工人六至十磅穀物為公共飯食等等，這當然是很容易了解的，要花這樣多錢的「基金」公共食用，集體農場的經濟力當然是受危害人，繳納穀物一無所存。

要看破這樣奸巧的敵人，不受他們的欺騙，我們必須充滿革命的機警，我們必須能揭破敵人的假面具，在集體農場會員的面前，揭露敵人反革命的眞面目。在農業區的許多共產黨員具有這種能力嗎？有時共產黨員不揭破這樣的階級敵人，反然受敵人的欺騙，跟在敵人後面走。

許多同志不認識帶上新的面具的階級敵人，不能揭破敵人的欺騙詐術，這些同志自己安慰自己以為再沒有富農了，在執行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結果已經撲滅了農業區中的反蘇維埃份子，因此我們可以允許「中立」集體農場的存在，這種中立集體農場既不是布爾塞維克，也不反對蘇維埃，他們自己必定自動地轉走蘇維埃政權這方面來。

但是，同志們！這是一個大的錯誤。固然富農是被打敗了，但我們還沒有能使富農不能再作惡。假使

我們共產主義者遲疑不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希望富農自然的發展能放棄不作惡，那麼我們更不能很速的完全擊敗富農。這兒沒有「中立」的集體農場的存在，也不能存在。「中立」的集體農場是瞎人們的夢想。目前在蘇維埃農村中正進行着猛烈的階級鬥爭，這兒沒有「中立」集體農場存在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面，這集體農場或者是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或者是反蘇維埃的集體農場，假使我們不能領導這一種或其他種的農場，這就是說這些農場是被反蘇維埃的份子領導，這點是毫不容人懷疑的。

末了，我們農業區工作缺點的另一原因，是在經視了共產主義者在建立集體農場中與穀物收集中的作用和責任。共產黨員一說到穀物收集的困難時，總是把這種責任推到農民的身上，以為一切都是農民的過失。這是十分錯誤的，並且絕對不公道的。農民與這種事體沒有關係。至於責任與過失問題，這種責任完全是在共產黨員的身上，一切都是我們共產黨員的過失。

在世界上，無論在現在與過去都沒有像蘇維埃政權這樣有威權的政權。沒有像共產黨這樣有權力的強大的黨。

沒有人擾亂我們，也沒有人能擾亂我們根據集體農場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的需要進行集體農場工作。假使我們不時勝利地依據列甯主義的需要進行集體農場工作，假使我們甚至犯了一些嚴重不可原諒的錯誤（例如在穀物收集工作中），那麼這完全是我們自己來負責的。

沒有認識穀物集體農場貿易反的方面，並且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這些都是我們要負責的。許多黨部脫離了集體農場，睡在桂冠上做夢，聽事情自然發展，這些都是我們的過失。許多同志過分估量了集體農場是群眾組

織的形式，他們不了解問題不是在形式的本身而是在我們能抓住集體農場的領導，把一切反蘇維埃份子從集體農場的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這種事實是我們要負責的。他們不認識新的形勢，不明白階級敵人的新策略，這些階級敵人現在在暗中活動，這也是我們要負責的。

這兒發生了一個問題：在這兒農民怎麼辦呢？我知道許多集體農場現在在發展，能很迅速地盡他們對政府的義務，在經濟上一天比一天強大。在另一方面，我知道有些農場雖然他們的收成與上述的農場一樣而且有同樣的客觀條件，但是這些農場正在沒落與崩潰。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原因是第一種農場是在真正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第二種集體農場則為懦夫們所領導。雖然他們袋裏有黨證，他們終究是懦夫。

目前的問題是：農民與這事有什麼關你呢？這是由於較視了共產黨員的作用和責任，因此本應當找農業區工作缺點的原因，而我們沒有去找，因此不能克服這些缺點。

穀物收集困難的原因並不是在農民中去找，而是應當在我們自己隊伍中來找。因為現在是我們掌握政權，我們有政府的一切手段可以聽我們指揮利用。領導集體農場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擔負農業區工作的完全責任。

這些就是我們在農業區工作缺點的原因。

或者有人以為我所講的未免令人悲觀喪氣，對於我們農業區整個工作是不過含有一些缺點而已。自然，這不是真的。實際上，除開這些錯誤外，我們在農村工作中得了許多嚴重的，極重要的成績。在我演講開始的時候我就說過我的任務不在指出這些成績，而是指出缺點。

我們能克服這些缺點嗎？ 是的，這是沒有疑問的

- 我們在最近的將來克服這些缺點嗎？ 這是無疑問的
-

我相信機器站，曳引機站，及蘇維埃農場上的政治部是幫助我們在最短時候內克服這些缺點的最重要的手段

- (大大的鼓掌歷時很久)

應當使集體農民變成小康者

斯 達 林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場突擊隊

員大會上的演說——

集體農民同志們！我本來不想在你們的大會說話。我不想說話，因為發言的人們已經把一切的說完了，而且說得很好，很扼要。我還有發言的必要嗎。不過你們既然堅決要求，而且權力是在你們的手中（辯掌很久），我不得不服從。讓我在一些特殊問題上發表一點意見。

一 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集體農民所採取的道路是否是正確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否是正確的。

這並不是一個無聊的問題。你們是集體農場突擊隊員，自然你們不懷疑集體農場是正確的道路。因此你們會認為這個問題是多餘的。不過在全體農民中還有一些農民，他們的思想不與你們一樣。在農民中，甚至在集體農民中，還有許多人懷疑集體農場路線的正確性。這當然是不足奇怪的。因為人們在舊式的方式中生活了很多的年代，走老的道路，在富農、地主、高利貸者與投機者的面前屈服。自然我們不能說農民贊成舊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不過舊道路是一條已經走慣的道路，而且還沒有人證明出有一個新的更好的生活方法。這個情形特別是如此：因為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還是依着舊的方式生

活着。現在布爾塞維克像暴風暴雨一樣，忽然衝破這個舊的停滯的生活，高呼現在要捨棄舊的道路，實行一個新的生活，一個集體農場的生活。現在要開始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不同的生活，是新的集體生活。但這是一種什麼新的生活呢？誰能答覆？這種生活不比舊生活更壞嗎？無論如何，這是一條新道路，一條不平常的道路，一條沒有人走過，沒有人探險過的道路。繼續走舊道路不較好嗎？再等一等看才去走集體農場的道路不更好嗎？冒險碰運靠得住嗎？

目前就有一部份勞苦農民受這些懷疑迷困。

我們應當消釋這些疑惑嗎？我們應當把這些疑惑拿來公開的研究，看看這些疑惑有多少價值？自然我們應當這樣做。

因此，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不能認為是一個無聊的問頭。

讓我們看一看集體農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

有些同志相信：過渡到新的道路，集體農場的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說法：只有一部份是真實的。自然廣泛的組織集體農場是三年以前開始的。你們是知道的，過渡時間是摧毀富農，造成千百萬小農中農贊成集體農場的運動。這完全是真實的。不過要進行大模範的過渡到集體農場，必須要有某些先決條件。沒有這些先決條件，羣衆集體農場運動一般的說來是萬難想像到的。首先要有一個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已經幫助而且還繼續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場的道路。第二，要驅逐地主與資本家，沒收他們的工廠和土地，把這些工廠和土地宣佈為人民的財產。第三，要壓制富農，剝奪他們的機器和曳引機。第四，要宣佈只有團結在集體農場中的

貧農與中農可以用機器和曳引機。未後，要實行國家工業化，建立一個新的曳引機製造工業，建立新工廠，製造農業機器，供給集體農民大批的曳引機和機器。沒有這些先決條件，我們不能想到在三年以前開始大規模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道路。

因此，要走上集體農場的道路，首先必須完成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與地主，沒收他們的工廠和土地，建立新的工業。

過渡到新的集體化的道路，是從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不過在三年前，這種運動以新的力量向前進，因為只有在那時十月革命的經濟影響才完全發揮，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能順利的推進國家的工業化。

在世界史上，已經看過了許多次的革命。這些革命與十月革命不同之點在於：這些革命完全是一方面的革命，用另外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原來的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但是剝削的本身繼續存在。某一階級剝削者和壓迫者被另外一階級剝削者和壓迫者代替了，但是剝削者和壓迫者仍然存在。十月革命的目標是毀滅一切剝削，剷除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

奴隸革命廢除了奴隸所有者，消滅了奴隸制度作為對勞動者的一種剝削方式。然而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對勞動者的剝削代替了奴隸制度。用另外一羣剝削者代替原來的一羣剝削者。在奴隸制度下，「法律」允許奴隸主人殺死他們的奴隸。在農民制度下「法律」「僅僅」允許地主出賣他們的農奴。農奴革命打倒了地主，廢除了農場剝削制度，但是他却產生了資本家和地主，產生了資本家和地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一種剝削者代替了另外一種剝削者。在農場制度下，「法律」允許地主出

賣他們的農場。在資本主義下，「法律」「僅僅」允許勞動者注定要受失業和窮困的痛苦，餓死。

祇有我們的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提出不以剝削者代替剝削者，不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而是來消滅一切剝削，剷除一切剝削者，一切擁有財產的人，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或是舊的。（鼓掌很久）

這就是爲什麼十月革命是領導農民走上集體農場道路的一個先決條件，一個必須的先決條件。

農民擁護十月革命是正當的行動嗎？是的。他們這種行動是正常的。他們的行動很正當，因爲十月革命幫助他們從地主，資本家，高利貸者，富農，商人，投機者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不過這僅僅是這問題的一方面。驅逐壓迫者，驅逐地主與資主家，鎮壓富農與投機者，這都是很好的。然而這是不夠的，要完全脫離舊的道路，僅僅摧毀剝削者是不夠的。要實行這種工作，也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生命，建立一種生命使勞苦的農民能有機會改良他們的物質和文化地位，每天每年向前邁進。爲要實行這種工作，必須在鄉村中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集體農場制度。這是這個問題的第二方面。

舊制度與新的集體農場制度有什麼不同呢？

在舊制度之下，農民單獨的工作，用舊方法舊工具工作，他們爲地主，資本家，富農，和投機者而工作，他們工作反而越壞了，而使別人發財。在新的集體農場制度下，農民在集體農場上共同工作，用新的設備，曳引機，農業機器等。他們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集體農場而工作，沒有富農和投機者，他們工作爲要每天增進他們的物

質和文化地位。在舊制度下，有一個幫助有錢人壓迫勞苦農民的資產階級政府。在新的集體農場制度下，工農政府幫助工人和農民反對有錢的人。舊制度走向資本主義而新制度走向社會主義。

在你們面前擺着兩條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前進到社會主義。一條是後退到資本主義。

在人相信可以找出其他的第三條道路。有些動搖的同志不能完全相信集體農場道路的正確性，而急想找出某種未知的第三條路。他們希望我們能回到舊的道路，回到個人農業，但是不要有資本家和地主，他們希望我們能「僅僅」允許富農和其他一些小資本家是我們經濟制度的一個合法部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這不是第三條路，而是到資本主義的第二條路。回到個人農場與恢復富農是什麼意義呢？就是說恢復富農剝削制度，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把政權送給富農。我們能恢復富農，同時維持蘇維埃政府嗎？否，我們不能。恢復富農建立富農政府，取消蘇維埃政府，這就是說，將走到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必然要走到恢復地主與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

所說的第三條路實際上第二條路回到資本主義。問一問農民，他們是否願意恢復富農剝削制度，回到資本主義，取消蘇維埃政府，恢復地主資本家的政府。試問一問任何農民，你就可以曉得那一條道路是大多數勞苦農民所認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因此這兒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向上走到新的集體農場制度；或者是向後，向下走到舊的富農資本主義制度。除此以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勞苦農民很正確的捨棄資本主義道路，採取發展集

體農場的道路。

有人說集體農場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但是這條路是很艱難的。這種說法只有一部份的真理。自然我們要遇到困難。生命中的好事不會容易到來。但是主要的困難已經被我們克服了，存在你們前面的困難值不得嚴重的說明。無論如何，假使與十年或十五年以前工人們所受的困難相比較，那麼，集體農場同志們，你們現時的困難不過是兒戲而已。你們的發言人已經在這兒稱讚列寧格拉，莫斯科，卡哥夫與頓巴時的工人。他們說工人們有了很大的成績，而你們集體農民的成績很少。在我們看起來你們發言人所說的說話有一個同志的羨慕的意義。他們似乎特別注重：「假使我們集體農場民們能有列寧格勒，莫斯科，卡哥夫與頓巴時工人相似的成績，那真是多麼好呀！」這是很好的。不過你們知道列寧格勒與莫斯科的工人爲了這些成績付了多少代價？爲了要完成這些成績他們經過了什麼艱難困苦？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的一些事實。那時工人們幾個星期看不見一塊麵包，更談不上肉類和其他生活品。那時能每天發給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工人八分之一磅的黑麵包一半是混和油糕，已經算是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繼續不只是一個月或半年，而是經過了整整的兩年。但是工人們忍受着而不喪氣，因爲他們知道好日子一定會來的，他們將獲得決定的勝利。現在你們可以看到工人們是沒有錯的。試把你們的困難和痛苦與工人所受的痛苦和艱難相比，你們就可以知道你們的困難是不值得嚴重的說及。

要領導集體農場前進，要發展集體農業他應當所發展的，有什麼東西是必須的呢？

第一，集體農場應當有永久的耕地。你們有了嗎

？ 是的，你們有了，你們知道所有最好的土地都已經交給集體農場并且永久分給集體農場。因此集體農場可以自由地耕種和改良土地，無須乎顧慮到這塊土地會落到別人的手中去。

第二，集體農民必須要能用曳引機和機器。你們有了嗎？ 是的，你們有了。你們都知道我們知曳引機廠與農業機器工廠主要的是為集體農場工作，以一切近代的設備供給集體農場。

末後，政府必須以人力財力完全幫助集體農民，不能允許敵對階級的子孫搗亂集體農場。你們有這樣的一個政府嗎？ 是的，你們有。這個政府叫工農蘇維埃政府。你們能指出另外一個國家，他的政府不是幫助資本家，地主，富農，有錢人而是幫助勞苦的農民嗎？ 在世界上現在沒有也不曾有這樣的另一個國家。只有在這蘇維埃國家內，政府是幫助工人，集體農民，幫助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反對一切剝削者與富有者。（鼓掌很久）

因此，你們已經具備了一切對於發展集體農場，從舊的壓迫解放出來所必需的東西。

對於你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誠實地工作，根據你們的工作分配你們的集體農場的進款。你們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保護曳引機與機器，注意照料你們的馬，盡你們對於工農政府的責任，鞏固集體農場，驅逐一切鑽進集體農場的富農和他們的走狗。

我想你們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克服這些困難，即是誠實的工作和保護集體農場的財產，這並不是難事。特別是因為現在你們不是為富人和剝削者而工作，而是為你們自己的集體農場而工作。

你們可以看得出，集體農場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

路，是勞苦農民唯一正確的道路。

二 我們的當前任務是使一切集體農民成爲小產者。

第二個問題是：在新的道路上，在我們的集體農場的道路上我們得了什麼成績？我們希望在今後兩三年間做到什麼成績？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的東西。一個快活的社會主義生活，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不過這一切都是將來的事。

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我們將來會獲得什麼。主要的問題是現在我們已經獲得了什麼。農民已經走上了集體農場的道路，這是很好的。在跟着集體農場道路向前邁進，我們得了一些什麼具體的成績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樣：我們幫助了千百萬的貧農加入集體農場；因爲參加集體農場，使用更好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千百萬的貧農已經提高到中農的水平線；在過去挨餓的千百萬貧農現在得了安全保障；我們消滅了把農民劃分爲貧農與富農的區別，剷除了富農，幫助貧農在集體農場中成爲他們自己勞動的主人，使他們變爲中農。

在四年以前，在未發展集體農場以前的情況是怎樣呢？富農發了財，并且一天比一天向前增高。貧農失敗而窮困化，變成富農的奴隸。中農拚命想起上富農，但是他們常常失敗，跌到貧農隊伍中，使富農喜氣洋洋。

因此我們不難猜想到只有富農和一些小康者在這種競爭中佔了勝利。在鄉村中每一百家中我們可以找到四五家富農，八或十家小康農民，四十五到五十家中農，三十五家貧農。因此在這些農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是窮困，不得受富農奴隸制度的壓迫。我不想說及中農中較微弱的部份，他們佔中農半數以上，他們的地位與貧農相

差很微，他們直接依靠富農。

由於發展集體農場，我們取消了混亂和不公道，剷除了富農奴隸制度，吸收了整個貧農羣衆參加集體農場，給了他們安全保障，提高他們到中農的水平線，有權使用集體農場的土壤，享受集體農場的優待權，有權使用曳引機和農業機器。

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因爲有了集體農場，我們已經把不少於二千萬的農民從窮困，滅亡，富農奴隸剝削中拯救出來，使他們變成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們，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一成績是世界上沒有聽見過的，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獲得這種成績。

在這兒就是集體農場建設與農民採取集體農場道路的具體成績。

但是這僅僅是我們的第一步，我們在集體農場建設的道路上第一個成績。

假使以爲我們應當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這個第一次的成績，那就錯誤了。否，同志們，我們不能因獲得了這第一步的成績而就停留不向前進。爲要更向前邁進，鞏固集體農場，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我們必須取得另外一個成績。這第二步是什麼呢？第二步是提高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和以前的中農）到更高的地位。必須要使所有的集體農民成爲小康。是的，小康，同志們。
鼓掌很久）

因爲有了集體農場我們已經把貧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線。這是很好的。但是農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要再向前一步，幫助所有的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和以前的中農）升高到小康的地位。我們是能完成這種工作

的，我們要不顧一切來完成這種工作。（鼓掌很久）我們有一切的東西來達到我們的目的。現在我們還不能很好的使用機器與曳引機，耕種田地也不令人滿意。我們現在只要改良使用機器和曳引機，改良耕種土地，就可以增加我們的生產兩三倍。這樣就足以使所有的集體農民成爲集體農田的小康勞動者。

在過去小康者的地位是怎樣呢？爲要成爲一個小康的農民，必須虐待鄰人，剝削鄰人，對於他們買賤賣貴，雇用農場勞動者，很利害的剝削這些勞動者，蓄存一些資本，在能立足後就爬到富農的地位。因此在個人農場時代小康的農民在貧農和中農中引起了懷疑和仇恨。現在已經改變了。現在的情形本身完全不同。要成爲一個小康的集體農民，並不需要虐待和剝削鄰人。同時現在也不容易剝削他人，因爲現在沒有土地和私有財產，沒有佃農，現在機器與曳引機歸國家所有，現在在集體農場中有錢的人不算時髦了。過去曾經有過這種時髦，不過現在已經永遠過時了。集體農民要成爲小康的農民，祇要在農場上誠實的工作，適當地使用曳引機，機器和牲畜：好好的耕種土地，小心地照料集體農場的財產。

有時候有人說：假使我們有了社會主義，爲什麼還要勞動呢？過去我們勞動，現在我們勞動，這不是要停止勞動的時候嗎？同志們，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這是無賴遊民的哲學而不是誠實勞動者的哲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勞動。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勞動上面的。社會主義與勞動是不分離的。我們的偉大導師列甯說過：「不做工的人不能有東西吃」。這是什麼意義呢，列甯的話目的是反對什麼人呢？他反對剝削，反對那些自己不勞動，而靠他人勞動以致富的人們。還反對其

他什麼人呢？反對那些自己流浪不做事而靠他人生活的人們。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不是遊惰度日，而是要求一切的人民應當誠實的勞動，不是爲他人，爲有錢的人和剝削者而勞動，而是爲自己爲社會勞動。假使我們能誠實的勞動，爲我們自己爲我們的集體農場而勞動，那麼我們在兩三年之內就能把所有的集體農民（以前的貧農與以前的中農）提高到小康者的地位，提高到一種享有豐富的生產品過一個十分文化生活的人們的地位。

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能完全這種任務，而且要不顧一切來完成這種任務。（鼓掌很久）

三 特別批評

現在讓我說幾句批評的話。

首先是關於在農村中我們的黨員。在我們中有黨員，不過有很多是非黨員。大會中非黨員多於黨員，這是很好的，因爲我們正是要把非黨員吸收參加我們的工作。有些共產黨員用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去對付非黨員的集體農民。不過有些誇耀自己的黨員資格，脫離了非黨員。這是很壞而有害的。布爾塞維克和共產黨的力量在於他們能知道如何團結千百萬的非黨員活動份子在黨的周圍。我們布爾塞維克假使不知道如何去爭取千百萬非黨員的工農對黨的信仰心，那麼我們不能獲得我們已經得了的勝利。這需要什麼呢？這需要黨員不應當脫離非黨員，黨員不應當把自己關在小房內，不應當誇耀自己的黨員資格，而應當傾聽非黨員的意見，這樣不僅可以教育非黨員，而且可以從非黨員學得教訓。

我們不應當忘記黨員不是從天空上掉下來的。我們要記住所有的黨員以前自己也會是過非黨員。今天是非黨員，明天也許就會加入黨。這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 在我們老布爾維克中，有很多在黨內做了廿或卅年的工作。然而我們自己也曾是非黨員。假使二三十年以前，那時黨員看不起我們，不讓我們入黨，對於我們會發生什麼呢？或者我們會與黨疏遠一些年頭。不過我們老布爾塞維克到底是有相當勢力的。（鼓掌很久）

因此有時看不起非黨員的黨員，青年的黨員，應當記住這一切，要記住：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被人愛，不是由於盛氣凌人，而是由於謙遜。

現在說幾句關於集體農婦的話。同志們，集體農場中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知道你們有許多人輕視婦女，嘲笑他們。不過，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不僅因為婦女佔人口中的一半。而主要的是集體農場運動已經提拔了一些特殊的能幹的婦女到領導的地位。你們考察這個大會的成份，你們就可以知道婦女有了很大的進步。在集體農場中婦女是一個偉人的力量。看輕這種力量是一個罪過。我們的義務是推進在集體農場中的婦女，讓這種力量發揮。

確實的，在最近的過去，蘇維埃政府對於集體農婦在乳牛問題上有一些小的誤會。不過現在乳牛問題已經解決了，這些誤會也消除了。（鼓掌很久）我們進展很快，大多數的集體農民每一家人有一條乳牛。再過一二年，你們不能找出一個自己沒有乳牛的集體農民。我們布爾塞維克正在努力設法使每一個集體農民有一條牛。（鼓掌很久）

婦女自己應當記住集體農場對於婦女的力量和意義，要記住：只有在集體農場中婦女才有機會與男子平等。

沒有集體農場，就是不平等；有集體農場，就有平等的權利。讓婦女同志牢記住這句話，保護集體農場如像她

們的眼睛腫子一樣。(鼓掌很久)

幾句關於集體農場中共產主義青年男子的話。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希望。他們要代替我們老年人的地位。他們應當舉着我們的旗幟走到最後的勝利。農民中多數的老年人多半被舊的重累，舊生活的習慣和回憶所壓倒。自然他們不能與黨和蘇維埃政府整齊步伐。至於青年們就不同了。他們沒有舊的重累的壓迫，很容易接授列寧的遺訓。正是因為他們容易接授列寧的教訓，所以我們要他們負責，把那些落後的和動搖的人向前推動。對的，青年沒有足够的智識，但是智識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因此問題就是研究列寧主義。青年共產黨員同志，研究布爾塞維克主義，你們就能推動那些動搖份子跟你們一齊向前進。少空談，多工作，你們的主義一定能勝利的。

再說一說個人農民。關於他們我們在這裏說得很少。這不是說他們已經不存在了。否，不是的。現在還有個人農民，而且我們不能不管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將來的集體農民。我知道有一部分個人農民已經完全利，害了很深的投機病。或者就因為這種原因我們的集體農民不願意讓個人農民加入集體農場，有時甚而至於完全不要他們加入。這自然是正確的，不能有異議。不過還有較大部分的個人農民，他們還沒有害了很深的投機病，他們用自己誠實的勞力以謀生，這種個人農民或者不反對參加集體農場。不過一方面他自己對於集體農場道路的正确性還有動搖，另一方面由目前集體農民對於個人農民的惡感，因此妨礙了他們加入集體農場。

自然我們要了解集體農民，考察他們的觀點。在這些年頭中，他們受了個人農民許多的傷害和嘲笑。不

過在這兒傷害與嘲笑不是很重要的。一個領袖假使不能忘却傷害，而把個人的事情看得比集體農場的利益更高，這個領袖是不足道的。假使你要成爲一個領袖，你應當知道如何忘記個人農民對你的傷害，兩年以前，我收到伏爾加河一個農民寡婦的一封信。在這封信內，他怨訴他們不要他加入集體農場，要我幫助他。我詢問集體農場。他們答覆說他曾經侮辱一個集體農場會議，所以他們不能允許他參加集體農場。困難在什麼地方呢？在一個農民會議上，集體農民邀請個人農民加入集體農場，這個寡婦在答覆邀請的時候，提起他的裙子的邊緣說：『這兒，加入你們的集體農場。』（大笑）無疑地，他的行動不當並且侮辱了大會。但是在一年後，他真心悔過承認自己的錯誤，你們還能拒絕他加入集體農場嗎？我想你們不能。因此我把我的意見寫信告訴這個集體農場。他們允許了他加入集體農場。結果怎樣呢？現在呢在那兒工作不僅不落後，而且是在前線的隊伍中。（鼓掌很久）

這是一個給你們的例子，說明真正的領袖必須要知道如何忘記侮辱，假使我們事業的利益需要的時候。

這種情形也適用於一般的個人農民，我不反對有區別的讓他們加入。我是反對無區別的拒絕一切個人農民。這不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政策。集體農民不應當忘記在不久以前他們自己也是個人農民。

末了，我要簡單的說到相忍齊克集體農民的那封信。這封信已經發表了，或者你們已經讀過了。這封信是很好的。這封信表現了我們的集體農民中有一些有經驗的有根底的集體農場組織者和煽動者，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光榮。不過在這封信中有一點是錯了，而且這一點

是我們不能同意的。這一點就是柏忍齊克的同志們以為他們在集體農場的勞動是微小，甚至於無意義，以為演說的勞動是偉大，是創造。我們能同意這點嗎？否，同志們；我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見解。或者，他們犯這種錯誤是於謙遜。然而這錯誤終究是一個錯誤。把領袖們看作一歷史的唯一創造者，而看不起工人和農民，這種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決定民衆和國家的命運的人不僅是領袖，而且主要的是千百萬勞苦群衆。

工人和農民，不自吹自擂，建設工廠與作坊，礦業與鐵道，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創造生活中一切好的東西，供給全世界的衣食，這些才是新生命的真正英雄與創造者。很顯然的，柏忍齊克同志們忘記了這一點。過於看高自己的力量，誇耀自己的功績，這是不好的。但是輕視自己的力量，不認識自己微小的勞力是決定歷史命運的真正偉大的和創造的勞力，這是更壞的。

我希望柏忍齊克的同志們能同意我對於他們這封信的小小的糾正。

同志們，我們就在這兒結束了吧。

（鼓掌很久，變為熱烈大喝采。全體起立向斯達林致敬。高聲歡呼，斯達林同志萬歲！領導的集體農民萬歲！我們的領袖斯達林同志萬歲！）

斯大林與霍瓦爾德底談話

(霍瓦爾德是美國斯克里浦斯，

霍瓦爾德報業聯合會主席)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霍瓦爾德：日本最近所發生的事變，你以爲對於遠東情況將要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斯大林：現在還難說，關於這個問題材料太少，情形不十分清楚。

霍爾瓦德：倘若日本決意真要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那蘇聯將取怎樣的態度呢？

斯大林：倘若日本決意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侵犯牠底獨立，那我們就要幫助蒙古人民共和國。關於這點，李特維諾夫的代理人斯托莫尼科夫不久以前已向駐莫斯科日領事聲明過了，並曾指出，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友誼關係，毫無改變。我們一九二一年曾經幫助過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要給以同樣的幫助。

霍瓦爾德：這樣說來，日本侵佔庫倫的企圖，是否會引起蘇聯採取正面的行動呢？

斯大林：是的，會引起的。

霍瓦爾德：近幾天來，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疆一帶，日人是否有某些使蘇聯可以認爲係侵犯的行動呢？

斯大林：日人似乎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境繼續集中軍隊，可是，暫時還沒有看出有何種引起邊境衝突的新企圖。

霍瓦爾德：蘇聯顧慮德國同波蘭有反蘇聯的侵畧計劃，並顧慮他們正在準備實行軍事合作來促進這一計劃底

實現。但同時，波蘭則聲明牠不願把自己的國境讓給任何外國軍隊作為反對第三國家戰事行動的根據地。蘇聯以為德國方面的進攻到底是怎樣的呢？德國軍隊從那些陣地出發，向什麼方向行動呢？

斯大林：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當着牠要同其他國家戰爭的時候，即令不是同鄰國作戰，牠也要着手尋可以達到牠所要進攻的國家邊境的疆域。而侵略國通常總是找到這種疆域的。牠或者武力侵佔這些疆域，如一九一四年德國進侵比利時以襲擊法國一樣；或者採取「假道」的辦法。如一九一八年德國企圖經過拉特維亞進攻列甯格拉時一樣；我不知道那些疆域最能適合于德國的目的，但是我想，願意給德國假道的人們是可以找到的。

霍瓦爾德：全世界都在談論戰爭問題，倘若戰爭真正不可避免的話，那末，斯大林先生，據你的意見，戰爭什麼時候爆發呢？

斯大林：這是不能預先說定的。戰爭可以突然發生。現時戰爭是不正式宣佈的，簡直開始就是了。但在另一方面，我認為愛好和平的人們底陣地是在鞏固着。

他們可以公開的活動，他們依靠於社會輿論的威力，他們掌握有像國際聯盟一類的機關。這也正是愛好和平的人們底優點。他們的力量，是在于他們依靠人民群眾的意志，以進行其反戰爭的活動。世界上沒有那一國人民願意戰爭的。至于敵視和平的人們，他們就不能不秘密的活動，這也正是他們的弱點。但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可以決意從事戰爭，冒險以作最後之掙扎。

蘇法互協公約已由法國衆議院批准，這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事業上之一個新勝利。而這一公約對於敵視和平的人們則成為相當的障礙，

霍瓦爾德：戰爭倘然發生，那末，牠會在世界上那個地方先爆發呢？戰爭的烏烟瘴氣，在何處最爲瀰漫呢？在東方抑在西方呢？

斯大林：我以爲有兩個戰爭危險策源地。第一個策源地在遠東，在日本一帶。我是根據日本軍閥屢次聲言威脅其他國家而這樣說的。第二個策源地在德國。

很難說那一個策源地威脅最大，可是兩個都存在着，都動作着。同這兩個基本的戰爭危險策源地比較起來，意阿戰爭，不過是枝節事件。現時表現得最積極的是遠東的危險策源地。但這個危險中心，有可能移到歐洲方面。不久以前，希特勒與法報記者的談話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這次談話中，希特勒企圖講些似乎愛好和平的東西，可是他在「愛好和平」的言論當中參雜着這樣許多威脅法國和蘇聯的話，結果所謂「愛好和平」一點也沒有了。你看，就是當着希特勒想談和平，他也離不開威脅，這就是徵兆。

霍瓦爾德：據你的意見，目前戰爭危險底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斯大林：是資本主義。

霍瓦爾德：究竟是資本主義的那些現象呢？

斯大林：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掠奪現象。你可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怎樣發生的。牠是由於要重新瓜分世界而發生的。現在又是這個花樣，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認爲他們在上次重分勢力範圍、領土、原料地、市場等等方面，是受了委曲的；他們爲着自己利益想在重分一下。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就成了一種承認戰爭爲解決國際矛盾合法方法的制度。卽令不是法律上承認的話，實質上是這樣的。

霍瓦爾德：你是否認爲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有根據來顧慮蘇聯，恐怕蘇聯決以武力強迫其他民族去接受蘇聯的政治理論呢？

斯大林：像這一類的顧慮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倘若你以爲蘇聯的人我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用武力去改變周圍國家的面貌，那可就大錯了。蘇聯的人當然願意周圍國家的面貌改變，但這是周圍國家自己的事情。倘若周圍國家自己真堅如磐石，那我就不知道這些國家怎麼會覺得蘇聯人民底思想是危險的東西。

霍瓦爾德：你這種聲明是否就是說，蘇聯在某種限度內，已經放棄了牠進行世界革命的計劃與圖謀呢？

斯大林：我們向來沒有過這一類的計劃與圖謀。

霍瓦爾德：斯大林先生，我似乎覺得，世界上久已存在着另外一種的印象。

斯大林：這是出於誤會。

霍瓦爾德：悲劇的誤會嗎？

斯大林：不，善劇的，或者可以說悲喜交集的誤會。不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革命在其他國家也產生，但是只有當着這些國家的革命者，覺得可能或者須要的時候，革命方能產生。如果以爲革命可以輸出的話——這就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也就不會有革命。例如我們國家願意進行革命，於是就進行了革命，現時我們在創造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但硬說我們要在其他國家進行革命，要干預牠們內部生活，那就是無中生有，就是撰造我們向來所沒有宣傳過的主張。

霍瓦爾德：在蘇聯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時，羅斯福總統與李特維諾夫先生，關於宣傳問題，曾經交換過同樣

的公文，在李特維諾夫先生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中的第 7 條內，曾載明蘇聯政府負有以下義務：『不允許自己領土內組織或存在對整個美國或其一部份的領土或領地，志在推翻或準備推翻，或以武力改變政治社會制度之任何團體與組織，同時，在自己的領土內，要採取制止方法，以反對這類組織或團體及其代表或負責人員之活動』，我請你，斯大林先生，解釋一下，倘若履行這條義務與蘇聯願望不合，或不在蘇聯權力以內，則李特維諾夫先生何以在這信上簽名呢？

斯大林：履行你所引証的這條義務，是我們權力以內的事，我們履行了這條義務，而且以後還是要履行，依照我們的憲法，政治僑民在蘇聯有居留權，我們給他們以遁逃的權利，正如美國給予政治僑民以遁逃的權利一樣，很明顯的，李特維諾夫在該信上簽名，是以信中所載之該項義務係雙方都須履行為出發的。你，霍瓦爾德先生。現在美國有受美國公民物質上的幫助，為資本主義利益進行反蘇聯宣傳的白黨僑民，他們有時且成為恐怖團體，這是否與羅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相抵觸呢？顯然，這些僑民正是享受了在美國也有的遁逃權。至於我們方面，我們向來沒有容忍在自己領土內，有任何暗殺份子的存在，不管他的罪惡行為是反對什麼人。遁逃權的解說，在美國大概要比在我們國內更為廣泛。好吧，我們也並沒苛求於人。或許你不同意我，以為我們對於這些居留在我們領土內的政治僑民表示同情。但是，難道沒有美國公民同情宣傳擁護資本主義，反對蘇聯的白黨政治僑民嗎？那末，這裏的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問題就在於不應當幫助他們，不應當在經濟上幫助他們的活動，問題就在於兩國當局人員不應干預別國的內部生

活。我們的當局人員忠實的履行了這個義務。之些當局人員中，如有違犯義務者，請告訴給我們。

倘若要要求從美國逐出所有白黨僑民，那就要侵犯在美國和蘇聯都宣佈了的遣逃權了。這裏應當承認，在雙方提要求時是有一定的合理界限的。李特維諾夫在其致羅斯福總統的信上簽字，並不是以私人資格，而是以國家代表的資格出面的。羅斯福總統的簽字，同樣也是如此，他們二人的協定，是兩個國家的協定。無論蘇聯代表李特維諾夫或美國代表羅斯福總統，當在這個協定上簽字時，他們都是代表本國的行爲，這個國家不應而且不會去干預對方的內政。這個協定並不能抵觸兩國所宣布的遣逃權。應在這個範圍內解說警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兩個國家代表的協定。

霍瓦爾德；但是，美國代表白勞德和達爾希豈不是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號召武力推翻美國政府嗎？

斯大林；我承認，我不記得白勞德和達爾希二同志的發言，甚至不記得他們說的什麼。這類的話，也許牠們說過。但是，美國共產黨並不是蘇聯的人創立的，牠是美國人創立的。牠在美國合法存在，牠在選舉時有自己的候選人，以至有總統候選人。假如白勞德和達爾希兩同志在莫斯科只演講過一次，那末，他們在本國。美國，這類的講演已作過千百次，而且大概講得更要激烈些，便知美國共黨是可以自由宣傳他們的思想的。認為美國共產黨的活動，應由蘇聯政府負責，那是完全不正確的。

霍瓦爾德；是的，但此地所談的問題是美國共產黨在蘇聯境內活動是違犯了羅斯福——李特維諾夫的協定第四條。

斯大林：共產黨的活動是怎樣的，牠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共產黨的活動通常就在於組織工人，組織群眾會議，示威罷工等等。很明顯的，美國共產黨要在蘇聯境內進行這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我們蘇聯是沒有美國工人的。

霍瓦爾德：我是否可以把你的聲明，了解為我們相互的義務，是可以找到一種使我們兩國間良好關係保障與持久的解釋呢？

斯大林：是的，絕對可以的。

霍瓦爾德：你大概承認，共產主義社會在蘇聯還沒有建立起來。建立起來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以及德國的國社黨，都說他們也獲得類似這樣的成績。限制個人自由，以及使人民忍受其他種種貧困，以利於國家，這是否是所有上述這些國家底共同特點呢？

斯大林：「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個名稱是不適當的。許多人對於這個名詞的了解，乃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財富的一部分，有時是很大的一部分，轉入國家之手或受其監督，同時，工廠及土地方面的私有權，大多留存在私人手裏。許多人是這樣來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有時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名詞掩飾之下，爲了準備戰爭或進行戰爭起見，把一部分私人企業收爲國家辦理。我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我們蘇聯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爲工廠，土地，銀行，交通業方面的私有制，都被取消，而代之以社會公有制。我們所創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可稱爲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組織，這種組織，雖然還沒有完全建成，可是基本上的確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

這個社會底基礎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的即全體人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和奪體農莊的所有制。無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也好，無論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也好，與蘇聯的這一種社會絲毫沒有相同之處。首先是因爲工廠，土地，銀行，交通業等等方面的私有制，在上述兩個國家裏都絲毫沒有觸動，所以德國及意大利的資本主義依然完全存在。是的，你說得對，我們還沒有建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建成這種社會並不是容易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別的區別，你大概是知道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某些所有上的不平等。可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已經沒有失業現象，已經沒有剝削，已經沒有民族壓迫。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人人有勞動之義務，雖然勞動的報酬還不是依照各取所需的原則，而是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爲標準。因此，還存在着工資、而且工資是不平等的，有差別的。只有將來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勞動由社會方面所得的報酬，不是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爲標準，而是以各取所需爲原則，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可說我們建成了共產主義社會。

你說，爲了建成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起見，我們犧牲過個人的自由，忍受過貧困。你的問題裏面含着一種用意，以爲社會主義社會否認個人的自由。這是不正確的。當然，要創造任何一個新東西，就必須自己經濟一些，積蓄資財，暫時節省自己的消費，向別人借貸。如果你要建造一棟新房屋，你就要積蓄金錢，暫時節省消費，否則，房屋也許建築不起來。說到建設人類的整個新社會，那就更須如此了。我們曾不得不暫時節省某些消費，積蓄相當的資財，努力從事。我們過去正是這樣辦的，所以我們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

可是我們建成這一種社會，並不是爲要束縛個人自由，而是使每個人真正感覺到他是自由的。我們之所以建成這種社會，爲的是真正的個人自由，不是括弧裏的自由。失業的人，餓寒交迫，找不到工做，我很難設想他們有什麼『個人的自由』。只有在剝削被取消了的地方，在沒有人壓迫人的地方，在沒有失業與貧窮的地方，在人們並不擔憂明天會失掉工作、住宅、飯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這種社會裏，才可以有真正的，不是紙上的個人自由。

霍瓦爾德：你是否認爲美國的德謨克拉西與蘇維埃的制度，可以並存發展的呢？

斯大林：美國的德謨克拉西與蘇維埃的制度，可以和平並存，互相競賽。然而這一個不能發展而成爲另一個。蘇維埃制度不能轉變爲美國的德謨克拉西，反之亦然。如果我們彼此不吹毛求疵，我們可以和平並存。

霍瓦爾德：蘇聯正在起草新憲法，該憲法中，要規定新的選舉制度。既然將來在選舉中仍舊同以前一樣，只有一個政黨活動，那麼，這種新制度能夠改變蘇聯的情形到什麼程度呢？

斯大林：大概在今年年底，我們要通過我們的新憲法。制憲委員會正在進行工作並且應當很快完成此項工作。我們已經宣佈過，依照新憲法，我們將實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將來在選舉中只有一個政黨活動，這件事情，使你感覺不安。你沒有看見，在這些條件之下，會有怎樣選舉鬥爭。很明顯的，將來在選舉中提出候選名單的，不僅是共產黨，而且是各種非黨的社會團體。這種團體我們有好幾百。我們沒有彼此對立的政黨，猶之乎我們沒有彼此對立的資本家階

級與被資本家所剝削的工人階級。我們的社會，完全由城市與農村的自由的勞動者——工人，農民，智識分子所組織成。這些階層中之每一階層能夠有其特殊的利益，此種利益、經過現存的很多的社會團體而表現出來。可是既然沒有階級，既然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階層之間只是存在着某些非基本上的差別，那就社會有形成對敵政黨之發育滋長的基地。沒有幾個階級的地方，就不會有幾個政黨，因為政黨是階級的一部分。

在民族『社會主義』之下，也只存在着一個政黨。

然而這種法西斯的一黨制度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於德國依然存在着資本主義，依然有階級，有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總是要爆發出來的，其中代表敵對階級的政黨的鬥爭也是要爆發出來的，比如西班牙就是如此。意大利也只有一個法西斯黨，然而也因為上述原因，在意大利也行不通。

為甚麼我們的選舉是普選呢？因全為體公民，除少數被法庭剝奪選舉權的人以外，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為甚麼我們的舉是平等的呢？因為財產上的差別（還有部分的差別），種族與民族之不同，都不會使選民得利任何特權或者使他們受到損失。婦女也與男子平等，享受同樣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我們的選將是真正平等的。

為甚麼不記名呢？因為我們要給蘇維埃公民以完全自由來選出他們所要的人，在選他們所信任足以保証他們利益的人。

為甚麼是直接呢？因為當地地直接選舉 一切代

表機關，直至最高機關，這是我們偌大國家的勞動者利益底最好保證。

你認為不會有選舉鬥爭，可是選舉鬥爭一定會有的！而且我認為一定會有很熱烈的選舉鬥爭。我們有不少機關工作做得不好。有時某地方政權機關不知道如何去滿足城市與農村中勞動者各方面的與日具增的各種要求。你有沒有建立好的學校呢？你有沒有改善了住宅的條件呢？你是一個官僚嗎？你有沒有幫助我們，使得我們的勞動率效力更大，使得我們的生活更加文明一些呢？這將是一種標準，千萬選民得用這種標準去測量候選人，從候選名單中取消其不適當的候選人，提出最優秀的人來充當候選人。是的，選舉鬥爭將是熱烈的，牠將在許多極嚴重的問題周圍，——主要的是在實際的，對於人民有第一等意義的問題周圍發生。我們新的選舉制度，使一切機關與團體的工作，緊張起來，逼迫着他們來改善自己的工作。蘇聯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與不記名的選舉制度，將成爲人民手中的鞭子，用去鞭策工作不好的政權機關。據我的意見，我們的新的蘇維埃憲法，將是世界世上所有的憲法最中民主的憲法。